毛泽东选集

第七卷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毛泽东选集

第 七 卷

润之赤旗 主编

二零一八年 · 一月



毛泽东

第七卷说明

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著作，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理论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的伟大发展，是世界共产主义和人民民主运动的锐利武器。编辑出版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著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也是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一致企盼。

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虽得以出版，但是仅仅发行了数年就被禁止了。而收载毛泽东同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其余革命著作和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著作的第六卷、第七卷更是无从谈起。这是全中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莫大遗憾。

出尔反尔、半途而废绝不应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做事风格。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耻的事。”[1]尽管按照中共中央1981年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在晚年犯有所谓的“错误”，但是，即使真的存在这些“错误”，我们共产党人要做的，也应该是面对和分析，而绝不是严加封存、不予公开。再者，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毛泽东同志的晚年，也该到作出一个更公正决断的时候了。

为了更公正地把经得起拷问的历史交给伟大的人民，我们参考建国以来出版的各类文献集，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以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时期的群众出版物《毛泽东思想万岁》、文革时期的党内文献、报刊，网络上的《毛泽东文革指示谈话汇编》，革命友人静火同志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六、七卷等资料，选编了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编为这部《毛泽东选集》第六、七卷。本书是第七卷，收录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一九六六年一月-一九七六年六月的重要著作，包含讲话、谈话、文章、书信、批示、指示等一〇七篇。

在本卷著作中，毛泽东同志全面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继续坚持了对苏修、美帝的斗争立场，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对斗争方法、对象、政策方面作出了大量重要指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这些著作，对同志们领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无疑会起到莫大的作用。

本卷中，各篇著作一律按照第一次发表所在的文献集刊印。对于一些短篇文稿，我们按照内容进行了归类合并，方便同志们阅读。文献的标题、题解、注释，一部分按照原书，一部分由我们拟写、改写。

这部选集选编匆忙，错漏在所难免，还请同志们提出指正意见。

润之赤旗

二零一八年一月

注 释

[1]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目 录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下）

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3

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一九六六年二月）..4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6

在修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时所加的话（一九六六年三月）..9

对医务工作者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11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14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方法、对象和国内、国际形势与政策的指示汇编（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22

《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22

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22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23

各地师生都应参加文化革命运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23

批判彭真（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23

必须组织和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一九六六年）.......................................24

把美帝国主义赶回老家去（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24

畅游长江时对青年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24

对共青团中央的批评（一九六六年七月）......24
关于打人问题（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25
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25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应当坚决抵制（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25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26
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26
革命要靠自己（一九六六年）......26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26
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27
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27
驻外机关来一个革命化（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28
组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一九六六年十月）......28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28
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28
要支持群众的革命串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29
对刘少奇关于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要他检查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29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29
节约闹革命（一九六七年）......29
谈夺权（一九六七年一月）......30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九六七年一月）......31
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31
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31

革命委员会好（一九六七年）......32
关于实行大联合（一九六七年二月）......32
三·七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32
实行军管，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33
三个不够（一九六七年三月）......33
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33
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33
关于《触詟说赵太后》（一九六七年四月）......34
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马列主义（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一日）......34
大批判要慎重，要确实，要调查清楚（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35
关于国际形势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36
相信和依靠大多数（一九六七年）......36
对高干子弟参与抄家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36
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一九六七年六月）......37
必须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一九六七年）......37
对八三四一部队支工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37
意识形态方面容易出修正主义（一九六七年六月）......37
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光明就有希望（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37
教育革命一定要彻底改革（一九六七年七月）......38
要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勋章（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38
不要怕闹（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38
按照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一九六七年）......39

谈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一九六七年）......39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一九六七年七月）......39
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一九六七年八月）......39
造反派要听周总理的话（一九六七年十月）......40
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40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一九六八年）......40
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和革委会的基本经验（一九六八年）......40
谈派性（一九六八年）......41
根本区别（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41
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41
大学还是要办的（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42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一九六八年）......42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42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一九六八年）......42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43
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是国家兴旺的表现（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43
严禁逼供信（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43
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一九六八年十二月）......44
徐州两派群众组织要大联合（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44
订计划要留有充分的余地（一九六九年）......44
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一九六九年）......45
关于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一九六九年）......45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一九六九年）............................45

要认真总结经验（一九六九年）............................45

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45

对空军部队技术革新情况报告的批语（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46

关于战备疏散（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46

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二日）............................46

对罪犯都宜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一九七〇年七月）............................46

钢产量今后十年有可能上去（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46

实行野营训练（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47

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太上皇（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47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48

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48

对“二月逆流”的定性（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49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一九七二年）............................49

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一九七二年七月十日）............................49

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政府（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49

法西斯式审查方式应一律废除（一九七二年十二月）............................50

给李庆霖的信（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50

会见外宾的几段谈话（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一月）............................50

要办好工农兵干部学习班（一九七三年）............................51

青藏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觉（一九七三年十二月）............................52

以安定团结为好（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52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九七四年十一月）......52
关于释放战犯问题（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七日）......52
逐渐提高马列为好（一九七五年）......53
对文艺政策的看法（一九七五年七月）......53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53
对张天民信的批语（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54
对《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批语（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55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一段话（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55
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思潮（一九六六年三月）**......59**
学校一律实行半工半读（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60**
在修改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稿时所加的话（一九六六年四月）**......62**
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66**
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五•七指示》）......69**
在杭州同胡志明同志的谈话纪要（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71**
给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81**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85**
工作组要撤（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87**
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90**

关于宣传工作的若干指示（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92**
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92
标语、口号要大精简（一九六六年九月）......92
要谦虚，特别是对外（一九六七年六月）......92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利有害（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93
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93
不要强加于人（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93
宣传应当予以改革（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94
不应吹得太多（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94
空话不要再用（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94
“以我为核心”是错误思想（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94
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94
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一九六八年九月）......95
不要写这类语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95
不要讲这类话，我曾说过一百次（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95
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95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97**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99**
附录：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100**
在修改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时所加和改写的话（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109**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110**
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112**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116

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120

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123

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的电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25

关于陶铸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127

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128

在修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时所加的话（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130

给周总理的亲笔信（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132

要将斗争水平提高（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133

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134

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时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十八日）......142

对林彪三月二十日讲话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147

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所加的一段话（一九六七年三月）......148

在修改《<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时所加的话（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149

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150

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152

在修改《伟大的历史文件》时所加的话（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153

关于处理军民关系的几点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155

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五月）......157

会见多国外宾时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二十七日）........163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166

总要给犯错误的人以出路（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173

接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175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要点（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177

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180

“大树特树”的说法不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185

给阮友寿主席的贺电（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186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一九六八年）........188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189

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191

在修改《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时所加的话（一九六八年八月）........215

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217

注意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218

赤脚医生就是好——论医学教育革命（一九六八年九月）........219

对霍查、谢胡电贺我国二十九个省、市、区成立革委会的复电（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220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十月）........223

一个国家的武器专靠外国是很危险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日）........236

赞成越南又打又谈的方针（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七日）........238

关于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24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一九六八年）........245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九六八年）......246

在修改林彪中共九大报告稿时所加和改写的话（一九六九年四月）......247

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部讲话记录（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249

开幕词（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249

讲话（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250

讲话（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255

讲话节选（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259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261

同谢富治等的谈话（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270

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一九六九年九月）......275

在修改《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时所加的话（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275

同黎笋的谈话纪要（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一日）......276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283

现代化武器吓不倒人民（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一日）......285

同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马哈古卜谈话纪要（节录）（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四日）......286

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一日）......288

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三日）......289

我的一点意见（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291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294

对抗美援朝决策的回顾（一九七〇年十月十日）........296

对吴法宪、叶群检讨信的批注（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十五日）........298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300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319

在武昌、长沙、南昌等地的谈话（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七日-八月三十一日）..329

在杭州、上海、丰台等地的谈话（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九月十二日）........348

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谈话（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八日）........356

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节录（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364

同尼克松的谈话（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367

谈拿破仑（一九七二年七月十日、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九月十二日）374

谈国际问题（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376

启用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十四日）378

同基辛格的谈话（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十一月十二日、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一日）........380

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412

共产党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算共产党？（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九日）........413

同沙菲的谈话（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415

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问题谈话要点（一九七三年十二月）........416

同卡翁达、布迈丁谈话内容的通报（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422

同尼雷尔谈话主要内容的通报（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425

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五日）........427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一九七四年十二月）........431

关于国际问题几次谈话的要点（一九七四年）......433

越讲缓和越备战（一九七四年十二月）......435

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436

关于文史著作和历史人物的谈话（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442

关于《水浒》的评论（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444

毛主席重要指示（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445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50

同华国锋谈话时写的几句话（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六月二十五日）......451

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452

第七卷后记......453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下）

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给王任重同志的信。

任重[1]同志：

此件[2]看了，觉得很好。请送少奇[3]同志，请他酌定，是否可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于二十五年以后，那是无止境的，那时提法也不同了，大概是：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基础上再作一个二十五年的计划吧，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十五年。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我们抓的不大好。

注释

[1] 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2] 指中共省委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其中指出，要力争在五年、七年、十年内（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就是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省实现农业机械化。
[3] 少奇，即刘少奇，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二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毛远新同志[1]的谈话。

理工科还要有自己的语言，六年中先搞三年试试看，不一定急于搞二年。尖端科学搞三年，要有针对性也许行。三年不够，将来再补一点。有针对性才能少而精，有针对性才能一般和特殊相结合。六年搞成三年，这样做以后，步骤稳妥，方向对头。

新事物，干它几年，不断总结经验才行。

理工科有它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语言，要读一点书。但是也有共性，光读书不行。黄埔军校就读半年，毕业后当一年兵，出了不少人材，改成陆军大学以后（没有记下读几年），结果出来尽打败仗，做我们的俘虏。

理工科我是不懂的，医科我多少懂一点。你要听眼科大夫说话，神乎其神，但人总有一个整体。

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习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

尖端理论包括通过实践证明了的，有的基础理论中要去掉通过实践证明没有用的和不合理的部分。

讲原子物理只讲坂田模型就可以了，不必要从丹麦学派波尔[2]理论开始。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坂田[3]都用辩证法，你们为什么不用？人认识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医学讲心理学，讲神经系统那些抽象的东西，我看不对，应该先讲解剖学。数学本来是从物理模型中抽出来的，现在就不会把数学联系到物理模型来讲，反而把它进一步抽象化了。

注释

[1] 毛远新，毛泽东同志的侄子。曾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和教员。
[2] 即尼尔斯·玻尔（1885 年 10 月 7 日-1962 年 11 月 18 日），丹麦物理学家，哥本哈根大学硕士、博士，丹麦皇家科学院院士，1922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玻尔提出了玻尔模型来解释氢原子光谱，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对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3] 即坂田昌一（1911 年-1970 年），日本理论物理学家。1955 年，他提出了一种模型，认为所有参加强相互作用的强子并非个个都基本，“基础粒子”只是质子、中子和超子，其余的强子则是“复合粒子”，都可以由“基础粒子”及它们的反粒子复合出来。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少奇同志：

三月十一日信[1]收到。小计委[2]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的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作一个五、七、十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方面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但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应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过国家计划甚远者（例如超一倍以上者）或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种，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远

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局部地区的灾荒，无论那一个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再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这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至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引以为戒吧。现在虽只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3]”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又小计委何人去湖北，拟以余秋里、林乎加[4]二同志为宜。如果让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的话，各省拟以管农业书记一人，计委一人去为宜，总共大约七十人左右去那里，开一个七天至十天的现场会，是否可行，并请斟酌。

毛 泽 东

三月十二日

注释

[1] 指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信中说，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的文件和主席批语（即本书第七卷《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已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并发给包括计委、经委在内的各有关部委及华北局有关同志研究，准备意见，原拟过几天中央开一次会讨论后，将湖北省委文件转发各省市区党委研究，后来在有各在京副总理参加的中央常委会上谈了这个问题，大家意见，要小计

委就这个问题对有关各方面情况先摸一摸，提出一个方案，中央再来讨论，并要提交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加以讨论，以使各地方的努力更加符合实际。恩来同志已要小计委派人到湖北，同省委共同研究他们提出的方案,先在湖北进行实验,因此湖北省委这个文件暂缓转发各地。

[2] 小计委是一九六五年初毛泽东同志决定建立，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一个工作机构，主要任务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等。

[3] 见《论语·颜渊》。

[4] 余秋里，时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林乎加，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在修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时所加的话*

（一九六六年三月）

*这几段话是经过毛泽东同志加写和改写的。

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1]。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的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也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2]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

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3]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

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4]，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

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

注释

[1] 1966 年 2 月间，林彪、江青主持制定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1979 年 5 月这个纪要被撤销。

[2] 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3] 王明（1904 年~1974 年 3 月 27 日），原名陈绍禹，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 11 月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此期间，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扩展人民军队、在日占区扩大解放区，而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此时已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4] 丘赫拉依，即格里高里·丘赫拉依（Grigori Chukhraj ，1921—2001），苏联电影导演，苏联人民艺术家。他的处女作《第四十一》和《士兵之歌》、《晴朗的天空》被苏联电影评论界认为是 50 年代后期、60 年代初苏联创新电影的代表作。肖洛霍夫，即米哈依尔·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А Шолохов ，1905-1984），苏联著名作家，1965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获得列宁勋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当选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科学院院士、苏联作家协会理事。1965 年他的作品《静静的顿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31 年《静静的顿河》中译本作为鲁迅编辑的“现代文艺丛书”之一，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对医务工作者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看了“人工喉”、“断手再植”、“止血粉”等文章后对医务工作者的指示。

应该加强医务人员的马列主义学习，并用以指导业务工作。既然军事上证明了所谓弱者可以打败强者，没有念过书或念过很少书的可以打败黄埔毕业生、陆军大学毕业生，医务界为什么是例外？医学校也要加强马列主义课程，好多毕业生就是不懂马列主义。血吸虫病的检查与治疗应该免费。过去医务人员就是不接近群众，不相信群众。消灭钉螺的办法还不是群众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写的那首诗[1]内说：“华佗无奈小虫何”。今后要在医务界大力系统的宣传马列主义。医务人员都要下去。

注释

[1] 即毛泽东同志《七律二首•送瘟神》（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6 年版）。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

一、关于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1]

苏联“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了。苏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行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了。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2]无非是豺狼当道。（有人问：这次我们没参加，将来修正主义开会，我们发不发贺电？）发还要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

二、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我们被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区别政策是很灵的。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搞学术批判，也要保护几个，如郭老、范老（文澜）[3]，也是帝王将相派。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对自然科学这门，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对自然科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看法也不一样，唯心论和唯物论也都牵涉到自然科学问

题。范老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这些人，有的是帝王派，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林彪：这是阶级斗争。）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4]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反对唯物论。（林彪：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建设。）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现在全国二十八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林彪：报纸要抓，报纸是一件大事，它等于天天在那里代表中央下命令。）还有那个北京刊物《前线》，实际上是吴晗、邓拓、廖沫沙[5]他们的前线，有个“三家村”就是他们办的。廖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局、省委注意一下，如学术、报纸、出版文艺、电影戏剧等，各方面都要管。

尹达这篇文章[6]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尹达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7]的弟弟，他的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不要怕触及了罗尔纲[8]、翦伯赞，反正不剥夺他们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及“权威”。

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尽读古文书不行，要接触实际。学文学不要从古文学起，包括鲁迅、我的，要学写。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学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能写就行，以后以写为主，就像外文以学听、说为主一样。写等于作文，学作文就是以写为主。至于学史，到工作时再说，我们部队的人，那些将军、师长，什么尧舜皇帝都不知道，孙子兵法也没学过，不

一样打仗？《孙子兵法》没有一个人照它那样打的。（林彪：书本上那么多条条，到时候也找不到那一条，大大小小的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还是简单一些，按实际情况办事。）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半工半读，搞四清。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就像戚本禹[9]的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不要怕触动罗尔纲、翦伯赞，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赫鲁晓夫我们为他出全集呢！（林彪：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彭真：实际是他们专政，领导权在他们手里，你反对他，他就扣你工分。）**把学生、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其余的一部分人能改就好，不改就拉倒。**（彭真：搞主义不能合作。）（林彪：这是阶级斗争，他们要讲话的。）**还是尹达讲得对。尹达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朱德：打倒那些权威。）（陈伯达：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现在权威是谁？是姚文元[10]、戚本禹、尹达。谁能溶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陈伯达：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11]，不行，没等他死，他就夭折了。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这个问题很大。**

三、工业体制问题

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嘛？（彭真：中央和地方要像野战军和地方军一样。）**在南京，我和江渭清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为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武装斗争。**

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回市，扯不清。

（刘少奇：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太多，职工八十万，家属也是八十万。）现在要做普遍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

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织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周总理：要搞机械化。）光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周总理：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彭真：上海用机器支援农业，由非法变合法。）是非法，要承认合法的，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的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的，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彭真：办托拉斯，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就是工业党。）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12]，什么军区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军队还是靠地方军，以后才变成正规军的。我没有什么经验，过去三月总结，半年总结，还不都

是根据下面的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给个精神，中央没有一粒子弹，一粒粮食，出一点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这样不行。（周总理：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飞机厂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一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十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余秋里：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林：老带新，这是中国道路。）这好像抗战时期那个游击队一样。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彭真：小钢铁厂有四千个，给中央统光了。）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彭真：明年搞个办法。）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周总理：现在搞农机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那就叫八机部的陈正人[13]去当厂长嘛！

有的对农民实在挖苦，江西一担粮收税（送去）三回，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

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管死，省也不能统死。（刘少奇：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你用战争能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得出嘛？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边无权管。（陶铸：中央也无权呀！）现在准许闹独立性，向官僚主义要独立性，要像那样。学生也要闹，要鸣放学术问题。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脚。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俞平伯[14]一点学问也没有。（林彪：还是要学毛主席著作。）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林彪：

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主席思想的种子。）**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

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林彪：这些人只想专政。）**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这就是大是大非搞清楚了，《官场现形记》[15]是改良主义。总之，所谓“谴责小说”是反动的，反孙中山的，保皇的，使地主专政。他们是要修正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

把农机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注释

[1]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八日在莫斯科召开。考虑到苏共二十二大上，苏共领导围攻我们党和阿尔巴尼亚党，致使我们陷于被动；苏联共产党 1966 年 3 月的会议大肆反华；当时的苏共新领导勃列日涅夫热衷于搞“没有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且此次大会不是兄弟党国际会议，最终中国共产党决定不参加此次大会。

[2] 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 年-2016 年），古巴领导人，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三日生于古巴东方省比兰镇。一九五〇年毕业于哈瓦那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卡斯特罗领导发动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一九五五年，他流亡美国、墨西哥，一九五六年回到古巴，在马埃斯特拉山区创建起义军和根据地。一九五九年一月，他率领起义军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革命政府，出任政府总理（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一九六二年起担任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第一书记。一九六五年该党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后，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豺狼当道”典出《后汉书·张纲传》，原句为：“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意即：祸国大盗正在那儿当道呢！何必去抓小偷啊！中苏论战时，古巴保持中立，其实，卡斯特罗在内心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不满，对苏联国内的经济改革看不惯，认为是革命的蜕化，在这些问题上他和毛泽东倒是完全一致。但古巴经济严重依赖于苏联，不得不最终站到了苏联一边，卡斯特罗一九六五年三月发表演讲点名批评中共是“修正主义者”，两党关系中断，两国间也恶感日盛。毛泽东同志起初主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认为苏联才是危险的“豺狼”，而像古巴不过是“狐狸”，应该“分化瓦解、多多争取”，此后便认为古巴也变成了“豺狼”，后公开予以批判。

[3] 即郭沫若（1892 年一 1978 年），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1892 年 11 月 16 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女神》、《屈原》、《十批判书》、《甲

骨文字研究》、《中国史稿》等。范文澜，著名历史学家，时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郭沫若、范文澜同为国学名家。

[4] 吴晗是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曾编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鼓吹“老百姓应指望清官”。翦伯赞，历史学家，时任北大副校长，反对姚文元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

[5] 廖沫沙，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曾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有鬼无害论》。

[6] 尹达，原名刘火翟，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时任考古研究所所长。人民日报在一九六六年三月二日转载《红旗》一九六六年第三期他的文章《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作者自注文章作于一九六四年八月。文章指出，史学长期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历史资料经过剥削阶级史学家的加工、整理、选择、淘汰、删节和阐释，就必然注入其阶级偏见，字里行间无不充满强烈的阶级性。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研究和改写全部历史，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7] 赵毅敏，原名刘焜，一九六一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苏关系更加恶化。一九六二年意大利共产党召开党代会，为了配合苏共压制中国共产党，只邀请一位代表与会。赵毅敏受命作为中共代表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人煽起的反华合唱，赵毅敏孤身一人，据理抗争，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尊严和荣誉。

[8] 罗尔纲，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曾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忠王李秀成投降实为苦肉缓兵之计》，认为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是假投降曾国藩。

[9] 戚本禹，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了翦伯赞“超阶级”的“历史主义”观点，文章指出，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贫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一九六三年《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一文，文章根据李秀成自述，提出，李秀成“形容自己是‘骑在虎背，不得下骑’”，“做了元帅以后的李秀成并没有保持他艰苦朴素的作风”，断定李秀成是真投降，“认贼作父”，《人民日报》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做了摘要转载，毛泽东同志看了戚的文章后，专门调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写下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10] 姚文元，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指出，吴晗身为明史专家却不惜歪曲历史史实编造出一个完美形象的假海瑞，剧中的“退田”和“平冤狱”都不是史实，身为共产党员不去提倡阶级斗争，却去鼓吹“清官救民”的封建论调，把剧中的贫雇农说成只会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很明显，吴晗是用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改造了这个人物：海瑞不过是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平冤狱”

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曾经过毛泽东同志的亲笔润色，使其分析更深刻、尖锐。

[11]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Гео ргий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Маленков，1902 年 1 月 8 日 - 1988 年 1 月 14 日），苏联领导人，曾于 1953 年 3 月到 1955 年 2 月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总理）。1919 年担任红军政战官，1920 年加入苏联共产党，之后受到斯大林的信任。迫于赫鲁晓夫的压力，马林科夫先后辞去苏共中央书记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1955 年 2 月改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力部部长，党内职务仍然为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委员；1956 年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等人反对赫鲁晓夫失败，在中央全会上被打成“反党集团”，免去主席团委员职务，同时开除党籍，改任东哈萨克斯坦乌斯卡麦诺戈尔斯克水力发电厂厂长。

[12] 二十三条，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同志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3] 陈正人，时任第八机械工业部（原农业机械部）部长。

[14] 俞平伯，著名红学家，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解放前二十年代即已成名，一九二三年俞平伯出版《红楼梦辩》，考证出《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但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对于《红楼梦》，毛泽东同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评判，俞平伯用实用主义哲学进行研究，毛泽东同志和俞平伯在《红楼梦》的史料价值、性质、文学地位等方面的观点有很大分歧。

[15] 《官场现形记》是晚清文学家李伯元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最早在陈所发行的《世界繁华报》上连载，共五编 60 回，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并取得社会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它由 30 多个相对独立的官场故事联缀起来，涉及清政府中上自皇帝、下至佐杂小吏等，开创了近代小说批判现实的风气。鲁迅先生将《官场现形记》与其他三部小说并称之为谴责小说，是清朝晚期文学代表作品之一。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方法、对象和国内、国际形势与政策的指示汇编*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同志进入60年代之后，就不再有长篇的著作问世了。尤其是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言论，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以“毛主席最新指示”“毛主席最近指出”等等形式，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上，党的会议、文件上，以及群众组织传抄和汇编的文件上散在出现。这些指示篇幅普遍很短，有的只有一句话，但是内容和意义是比较重要的。为了节省版面，体现选集应有的篇幅，我们将这些有关斗争方法和内外政策的短篇指示进行汇编，成为本篇。

《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

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1]。

《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2]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康生等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3]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

各地师生都应参加文化革命运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

此件好，发各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三日

批判彭真（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康生同志的讲话。

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4]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通倒他。“西风落叶下

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赞成鲁迅的意见，书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骗你。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要不要告诉阿尔巴尼亚同志？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必须组织和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一九六六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组织、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并且依靠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

把美帝国主义赶回老家去（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接见日本、古巴、巴西和阿根廷朋友时的谈话。

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他的老家去。

畅游长江时对青年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在武汉第五次畅游长江时的谈话。

人民万岁。

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

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对共青团中央的批评（一九六六年七月）

有人讲团中央“三胡”[5]糊里糊涂。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什么糊里糊涂？团中央不但不支持学生群众运动，反而镇压学生群众运动，应严格处理。

关于打人问题（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应当坚决抵制（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修改《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时加的一段话。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的讲话。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与林彪的谈话。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

革命要靠自己（一九六六年）

革命要靠自己。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要提倡文斗，不要武斗。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几个月再说。急急忙忙做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对不得？我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

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相就照相，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同志《关于长沙、青岛、西安等地情况报告》的批示。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6]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7]，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8]，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9]，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10]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毛　泽　东

九月七日

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阳早等四位美国专家给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写的一张大字报的批语。

林彪、总理、陈毅[11]、陶铸、伯达五同志：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12]，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八日

驻外机关来一个革命化（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一位奥地利人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信的批语。

退陈毅同志：

这个批评文件[13]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九日

组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一九六六年十月）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14]，学三八作风[15]，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6]，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讨论工矿十条和农村十条时的谈话。

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要支持群众的革命串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这是很重要的事，应该大搞，没有了不起的问题，要支持群众的革命串连，要搞就大搞，不会没地方住的。

对刘少奇关于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要他检查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总理：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毛　泽　东

一月六日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

毛　泽　东

一月廿一日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17]，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

节约闹革命（一九六七年）

一

要节约闹革命。

二

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

谈夺权（一九六七年一月）

*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与周恩来同志的一段谈话；本篇二是毛泽东同志对张春桥同志来电请示夺权问题的答复。

一

毛主席问周总理：夺权怎么样？公安局是专政机关。

总理：才夺权一天多。

主席：要抓典型。

总理：市局委开了会，夺权有几种形式；干部是当权派；（一），受黑帮影响很坏，变黑帮，（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承认错误，但还有严重错误，（五）有个别一般错误（这种人为多）。

主席：前两种要划小，要孤立打击极少数，接管本身就是革命。建立新的，根据不同情况，也有不同形式：（一）全部改组（上海：张春桥、姚文元）；（二）接管后对当权派不同形式处理，边检讨边工作，监督留用（根据指示工作），（三）停职留用，（四）撤职留用，（五）撤职查办。

总理：哪种办法好，撤职一面斗争，一面留用，有了对立面，就可壮大队伍。把许多事压在身上（指革命造反派）也很被动，留用一面斗争，一面工作。科学院左派队伍壮大了，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很好。

主席：让那些当权派扫街，扫完了就休息，睡大觉，太便宜他们了，便宜事都叫他们办了。不要把自己陷入事务之中，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掌握大权监督他们。一个单位几个战斗队观点不同不奇怪。有事商量比不商量好。接管是大事情，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动。要解决接管的目的，解决什么问题，接管的方法（遇到问题怎么处理）。要有具体政策（局、科、部、科员等怎么办？）。现在夺权了，

也许还会夺走。有的单位夺过来夺过去是个锻炼，要巩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壮大。左派力量小时，夺权小，夺过去很快要夺走，左派要壮大。我支持夺权的，夺权后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

二

如果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九六七年一月）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我们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没有机关干部积极投入运动是不行的，好多重要问题靠机关干部亲自揭露。揭发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由上面派去的少数干部和下面的绝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了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我认为十三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先有后。

二、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剧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分开。

三、现在国际上帝、修、反正在利用我们文化大革命继续大搞反华活动，如苏联在镇压学生，新疆边界飞机活动多了，地面部队也在调动。凡是前线的大军区要警惕，要有所准备，如济南、南京、福州、昆明军区。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

间要稍推一下，将来一定要搞的，要顾全大局。

革命委员会好（一九六七年）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关于实行大联合（一九六七年二月）

目前斗争形势很好，成绩很大，经验很多，全国都在前进中。革命派在优势情况下，可以按系统、按部门、按单位实行大联合。要注意保守势力把革命派吃掉。不要用解散组织的办法实行大联合。

三・七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予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泽东

三月七日

实行军管，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请阅。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此事请研究酌处为盼！

毛　泽　东

三月十九日

三个不够（一九六七年三月）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报纸上有三个不够：调查得不够，揭露得不够，批判得不够。

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

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

林、周阅后办：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些事

情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关于《触詟说赵太后》（一九六七年四月）

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的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马列主义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五一”和“五一”的前两天召开的中央常委、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我们一定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不能脱离马列主义。

我们党在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蓬。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一九五二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当时，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军队住了营房，机关盖了高楼大厦。过去和群众在一起吃、穿、住，现在有些脱离群众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听我的话。刘少奇、高岗、彭德怀学习了苏联那一套。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变过来。

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作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十岁以上就行了。

我们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说青年人没有经验，上台就有经验了。过去也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现在要落实在组织上。

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

过去党团员受《修养》的影响，脱离了群众，没有独立的意见，成了驯服工具，各地不赞成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过半年或一年后再恢复。文化大革命不仅对干部，而且也是对党团员的大审查，大多数一定是好的。有的干部群众意见较大，可过二、三年以后再说工作，有些干部可以立即恢复工作。对于犯错误的人要给以改正的机会。联动要放出来，没有右派，就没有左派。搞薪金制军衔我从来就反对。

大批判要慎重，要确实，要调查清楚（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

大批判要慎重，要确实，要调查清楚。调查清楚，批判才有力量，否则就会

一风吹。引他（指刘少奇）的话不能只顾头不顾尾。批判要站得住。

“托拉斯”这个名词，不能一概驳，主要驳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些旧名词要赋予新的意义。

“驯服工具论”要批判，但也要有无产阶级纪律。服从、团结，那是有条件的。

今年形势好，布、粮还是要抓。社论要搞快一些。

批判文章文字要短。一、二千字，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说明了就行，不能超过三千字。长了没有人看，看了也记不清。

彭、罗、陆、杨可以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其他人称“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文章中提，在标题上不要提。

关于国际形势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

有人说，美苏战略中心转移，我不赞成。他们是注意远东，但中心还在欧洲。欧洲七个师的兵力，并没有减少，只是调了几万老兵到远东。

相信和依靠大多数（一九六七年）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对高干子弟参与抄家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　泽　东

五月廿八日

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一九六七年六月）

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

必须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一九六七年）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对八三四一部队支工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

1．下去后要做好宣传工作，要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厂子里女工多，要派些女同志下去，便于工作。

2．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愿意联合的，不愿意联合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头头。

3．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不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要关心群众的生活，组织个医疗组，给他们看病。

意识形态方面容易出修正主义（一九六七年六月）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钻进了无产阶级内部。

容易出现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闻记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学的。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光明就有希望（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

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搞地下斗争，而是武装斗争。

就是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是光明的，那世界就有希望，没什么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地方搞好。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

教育革命一定要彻底改革（一九六七年七月）

（大学斗批改）一种可能是彻底翻身，一种可能是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是改良，就看能否在下阶段打硬仗了。

斗批就是破，改就是立。这次教育革命一定要彻底改革，否则是改良，和过去一样，到后来是改不下去的。

要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勋章（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

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两年另八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四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

不要怕闹（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的谈话。

不要怕闹，闹得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来的，可以闹清楚。不管怎么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也是不好的。

全国大闹不可能。那里有脓包，有细菌，总要爆发的。

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第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

对武斗，这很好嘛！

（张春桥：有人讲第三派是走第三条道路的。）

哪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呀！人家要大联合，大批判，你要诱导嘛！

按照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一九六七年）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谈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一九六七年）

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一九六七年七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姚文元同志一封信的批示。

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允许有查明证据的叛徒、特务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悔改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 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一九六七年八月）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暗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这一部分进行革命。从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整体来说，它们是不占统治地位的，但是必须打倒他们，才能巩固

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造反派要听周总理的话（一九六七年十月）

造反派不听周总理的话，还叫什么造反派？矛头对准周总理，就是对准我、林彪。

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一九六八年）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和革委会的基本经验（一九六八年）

一

大办学习班。用学习班的方法斗私批修，提高认识，解决问题，狠抓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应该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就是好。应该总结经验，应该解放大批革命干部，干部只要不是三反分子、走资派、投敌叛变分子、特务分子，而是在运动中犯了路线错误认真检查，认识错误就可以三结合。在三结和中应该注意成份，但不能唯成份论，不要把坏人也结合进来。三结合要体现老、中、少，光小娃娃不行。

一般大学的革命委员会，解放军不结合进去，特殊情况下要结合，须经过市革命委员会批准。要警惕坏人，防止破坏。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应该爱护她，

尊重她，帮助她，保卫她，维护她的无产阶级权威，严防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不是三支两军工作的完成而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的无产阶级权威。

二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谈派性（一九六八年）

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根本区别（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

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样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各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像个样子了。……还是你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

解的也要执行。”

大学还是要办的（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的谈话。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一九六八年）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

姚文元[18]同志：

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毛　泽　东

九月三十日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一九六八年）

一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确立无产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统

治。

二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

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是国家兴旺的表现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军委办事组转报的一份情况简报的批语。

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

严禁逼供信（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毛　泽　东

十二月一日

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修改。

一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二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徐州两派群众组织要大联合（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

*这是毛泽东同志针对江苏徐海地区革命大联合迟迟不能实现的情况连续作出的四条指示。

一

徐州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大联合。

二

徐州已经翻了几个个了，再也不能翻个了。

三

一派不灵，两派才灵。一派掌权不行，两派联合才行。

四

讲明政策，多数人是能接受的。

订计划要留有充分的余地（一九六九年）

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

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一九六九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

关于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一九六九年）

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一九六九年）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要认真总结经验（一九六九年）

一

要认真总结经验。

二

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所有与“二月逆流”[19]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

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毛　泽　东

一月三日

对空军部队技术革新情况报告的批语（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

看了之后，很感兴趣。对每一具体技术改革说来，称为技术革新就可以了，不必再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指历史上重大技术改革，例如用蒸汽机代替手工，后来又发明电力，现在又发明原子能之类。

六月六日

关于战备疏散（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凌晨，苏军边防军六十余人，从珍宝岛北端侵入，中国边防部队自卫还击，胜利地保卫了珍宝岛。八月十三日，苏联军方经密谋在新疆铁克列提袭击我军三十余人的巡逻队，三十八名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仅一人生还。大规模流血冲突使中苏双方走到了战争边缘。这是毛泽东同志面临苏联军事威胁的严峻形势作出的重要战略指示。

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炸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去。[20]

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一九七○年四月十二日）

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对罪犯都宜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一九七○年七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关于王光美特务罪行的审查报告》的批语。

暂时还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都宜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觉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请中央一议。

钢产量今后十年有可能上去（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的一段谈话。

我们这几年一直总在一千万吨到一千八百万吨钢之间往来徘徊，徘徊了十年

左右，还是上不去。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许多人觉悟了，今后十年有可能上去。现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起来了，又要发生这个事。

实行野营训练（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总结报告上的批语。

一

林彪同志：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21]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

毛　泽　东

十一月廿四日

二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太上皇（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22]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

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六日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姚文元同志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语。

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送审稿的批语。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

只在１８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革命路线，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23]。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三月十五日九时

对“二月逆流”的定性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周恩来同志、叶剑英的一段谈话。

“二月逆流”经过时间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一九七二年）

我国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应当有大国霸权主义思想，而在国内建设中则要切实做好战备工作，要进一步挖深挖好防空掩体，加强粮食储蓄。

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

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一九七二年七月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法国外交部长莫里斯•舒曼谈话的节录。

你们欧洲现在比较乱吧?我讲乱，就是讲有六百亿美元在你们欧洲横冲直撞，又不兑现。哎哟，我看这个事也难了。美国它是一大霸哟，不过隔个大西洋。几个大国，总是闹别扭的。我们不希望你们欧洲那么乱。你们还要注意，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危险哟。

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政府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谈话的一部分。

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

美国好一点，但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二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

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

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24]总统跟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你们国家有两个党，据说民主党比较开明，共和党比较右。我说民主党不怎么样，我不赏识，不感兴趣。我对尼克松说，你竞选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

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的票啊。正如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中日复交问题呢?

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

法西斯式审查方式应一律废除（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刘建章同志家属来信的批语。

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25]，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给李庆霖的信（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李庆霖同志：

寄上３００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26]甚多，容当统筹解决。[27]

毛　泽　东

１９７３，４，２５日

会见外宾的几段谈话（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一月）

*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

总理黎清毅时谈话中说的一句话；本篇二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会见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上校时谈话中说的一句话；本篇三是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会见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时谈话中说的一句话；本篇四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七日会见塞拉勒窝内（今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和外长卢克时谈话中说的一句话；本篇五是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会见越南南方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委员、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时谈话中说的一句话。

一

毛主席说：**越南是越南人民的，不是越南反动派的，更不是帝国主义的。**

二

毛主席说，**我们都叫做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祝你们国家发展，人民幸福，整个非洲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三

毛主席对沙菲副总统说：**我们总是支持你们的。我们两国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总是要团结的。**

请你回国以后代我问候萨达特总统和你的其他同事们。

四

毛主席说：**我们也很高兴接待你们。祝贺你们非洲都发展起来，你们发展起来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非洲人民总是要起来的。**

五

毛主席说：**我们应该支持你们，尽我们的所能支持你们。我们还应该感谢你们越南南方人民，因为你们战斗了多年。**

要办好工农兵干部学习班（一九七三年）

要办好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每期三个月，一年办四期，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作。

青藏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觉（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的谈话节选。

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28]，不仅要修到拉萨，而且还要与尼泊尔接轨，通到加德满都[29]去。青藏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觉。

以安定团结为好（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

*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七四年八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八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同志指示。本篇二是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听取周恩来同志汇报时说的一句话。

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二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九七四年十一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先念同志、汪东兴同志谈话时说的一句话。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关于释放战犯问题（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30]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31]有些人有能力

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逐渐提高马列为好（一九七五年）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为盼。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对文艺政策的看法（一九七五年七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谈话的一部分。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与江青同志的谈话。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32]、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33]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

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我们怕什么?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34]，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

以前的《万水千山》[35]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

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反杜林论》出版后，柏林大学撤了杜林[36]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产阶级的东西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怕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锦州，他不打，最后两天他去了，俘虏十万人。又消灭了廖耀湘[37]。长春沈阳解放。

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对张天民信的批语（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电影《创业》的作者、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同志来信的批语。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对《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批语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

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

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38]。

毛 泽 东

十月十六日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一段话（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的一段话。

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

注释

[1]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是根据中共中央 1952 年 11 月 12 日作出的决定成立的，邓子恢任部长，廖鲁言任副部长，陈伯达、陈正人、王观澜和刘建勋亦曾任副部长，杜润生任秘书长。1955 年 7 月 31 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报告的主旨是批判邓子恢等人的“右倾”，强调加速农业合作化的发展。1962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邓子恢及其领导的中央农工部成为会议的重点批判对象。毛泽东同志认为以生产队为核算基础是调整人民公社的底线，包产到户就是单干，是对农业合作化的否定，并把包产到户提到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度；而邓子恢等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是搞资本主义，犯了反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错误。1962 年 11 月 9 日，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

[2] 吴晗，见本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4]。廖沫沙，见本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5]。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 笔名叫马南邨、邓云特，福建闽侯人，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

协会主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并主编理论刊物《前线》。

[3] 参阅本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10]。

[4] 彭真(1902 年 10 月 12 日——1997 年 4 月 26 日)，原名傅懋恭，山西省曲沃县人。时任北京市市长、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 年 5 月彭真被免职。

[5] “三胡”指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常务书记胡克实、候补书记胡启立。

[6]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7]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把毛泽东同志的批语和王效禹同志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等，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了四条具体决定。

[8]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

[9] 郭影秋，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10] 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1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外事办公室主任。

[12]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调查组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抄录的阳早等四位美国专家给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写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说，我们坚决反对政治、生活上的特殊待遇，坚决要求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容许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为此，我们要求：1．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2. 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3. 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4. 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5．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6．我们的孩子和中国人的孩子受到同样待遇和严格要求。7. 生活待遇和同级工作人员一样。 8．取消特殊化。

[13] 指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上登载的一位奥地利人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信。信中除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的行为表示赞赏外，还对中国派驻维也纳使馆有关人员的衣着和用车过于高级豪华提出批评，希望“向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与这期简报一同报送毛泽东的，还有共青团中央机关文革筹委会、临时书记处九月八日印发的《一坦桑尼亚群众来信对我外事活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提出尖锐批评》的材料，批评我驻坦使馆在外交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毛泽东的批语写在第九号简报上。

[14] 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15] 三八作风，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

[16] 三大纪律，指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指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17]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18]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19] 所谓“二月逆流”，是指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一些会议（主要是二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稍前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代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意志，同林彪一伙进行的一场大义凛然的斗争。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之后，毛泽东同志对“二月逆流”作出了正确的定性。参阅本卷第 49 页《对“二月逆流”的定性》。

[20] 经中央讨论决定的疏散安排为：毛泽东同志去武汉负责大政方针；林彪去苏州；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同志去广州；张闻天同志去肇庆；陈云、王震、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同志去石家庄；徐向前、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同志去邯郸；刘伯承同志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同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同志去信阳；何长工同志去江西峡江；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六人去湖南汉寿。

[21] 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2] 陈伯达，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七〇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被隔离审查。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陈伯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陈伯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23] 指一九七〇年八、九月间在庐山举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陈伯达等搜集整理《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使不少人上当受骗一事。

[24] 尼克松(一九一三——一九九四)，美国共和党人。一九六〇年时是美国副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一九六八年当选美国总统。他在任期内，曾于一九七一年七月派遣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改变了中美两国在外交上长期隔绝的局面。一九七二年二月首次访问中国并在上海同中国方面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使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25] 铁道部原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给毛泽东写的这封信说，刘建章一九二六年入党，今年六十二岁，不知何故于一九六八年二月被拘留审查，至今已近五年。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中央专案组通知我们家属到狱中探视，发现他体质很坏，面黄肌瘦，连说话有时也咬字不清。监狱生活条件差，每天饮水只有三杯的定量，每日“放风”也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有关政治上的大事更是不得而知。信中请求改变目前这种审查方式，允许家属经常探望，或准许刘建章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并治病。

[26] 李庆霖，当时是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在莆田县萩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的孩子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信中说，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停发后，孩子劳动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年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靠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加上又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因此生活很困难，请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信中还反映了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等情况。

[27] 中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六月十日印发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复信，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在开党委扩大会议时，可分出一天时间，宣读学习毛主席的信，对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进行讨论，准备在六月下半月，由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派人来中央汇报和统筹解决这个问题。一九七三年六、七月间，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

[28]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中国政府最初提出修建青藏铁路。青藏铁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项目四起三下：西格段 814 千米，20 世纪 50 年代准备建设，1979 年铺轨，1984 年运营；

格拉段 1142 千米（新建线 1110 千米）因存在千里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级难题而长期停建，最终克服难题而于 2001 年 6 月开工，2006 年 7 月 1 日建成通车运营。2014 年 8 月 16 日，青藏铁路延伸线拉（萨）日（喀则）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这段谈话中毛泽东同志“修到加德满都”的构想，至今没有实现。2015 年 4 月 1 日，中国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洛桑江村对到访的尼泊尔总统拉姆·巴兰·亚达夫表示，青藏铁路将从日喀则延伸 540 公里，在 2020 年延伸至两国边境的吉隆。

[29] 加德满都，简称加都，是尼泊尔首都和最大城市。

[3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文件上原文如此。这句话似指锦州等地还有一些战犯没有列入当时送审的一份特赦释放在押战犯的名单。

[31] 当时送审的一份有关释放在押战犯的报告中讲到，拟给释放的每位战犯发十五元零用钱，但不开欢送会。另有十三名罪大恶极的战犯拟继续关押，不予释放。

[32] 创造社，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团体。一九二一年在日本成立，成员多是留学日本的青年，代表人物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作的基本倾向是反帝反封建和积极浪漫主义。一九二九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其成员后来大多加入了左联。太阳社，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二七年成立，代表人物有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等。在宣传革命文学理论和革命文学的创作实践上起过积极作用。一九三〇年春全部成员加入左联。新月社，新诗团体，一九二三年成立，代表人物有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等。强调诗的艺术美，使新诗在艺术技巧上得到丰富和提高。但某些成员反对革命和革命文学。一九三三年该社停止活动。

[33] 周扬（一九〇八——一九八九），湖南益阳人。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文艺黑线代表人物”，被长期关押。毛泽东同志这次谈话后不久，周扬即被放出。

[34]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毛主席 1956 年开始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管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1957 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具体部署反右。毛主席估计全国右派数量有 5000，邓小平给地方“定指标”，抓了五十五万。超过毛主席估计一百多倍。1958 年开始，中央就开始对大多数错划“右派”摘帽。1978 年，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

[35] 《万水千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话剧团一九五五年首演的反映红军长征的十幕话剧。毛泽东同志一九六四年观看了演出，肯定当时演出本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对如何表现好红军各方面军团结战斗等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后经反复加工修改，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再次公演。

[36] 杜林，即卡尔·欧根·杜林（一八三三——一九二一），德国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曾任柏林大学讲师。他曾称要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实行“全面的变革”，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伟大导师恩格斯在一八七六至一八七八年写的《反杜林论》一书中，对杜林的理论体系作了系统的批判。一八七七年，杜林因公开指责柏林大学物理系教授赫尔姆霍茨，被取消了讲师资格。

[37] 廖耀湘（一九〇六——一九六八），湖南邵阳人。原任国民党军第九兵团中将司令。一九四八年十月底，在辽沈战役第二阶段中全军覆没后被俘。

[38] 梁漱溟，原任全国政协常委。

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思潮

（一九六六年三月）

*这是经过毛泽东同志修改的中共代表团与日共代表团联合公报草案中的一段文字。

正如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1]强调指出的，反对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一定要坚决反对并且克服我们两党自己内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最主要的是要坚决反对我们两党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潮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如若不注意，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那是十分危险的。以苏联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在反对我们的时候，不说我们是修正主义者，而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这种说法，正是指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国际革命党派和革命人民的团结，而不是别的。

注释

[1] 一九五七年宣言，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十二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一九六〇年声明，指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

学校一律实行半工半读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

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1]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2]有同志说：

“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

注释

[1] “四清”运动，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 这是晚唐诗人章碣写的七绝《焚书坑》。原诗是：“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在修改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稿时所加的话

（一九六六年四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修改。这个通知稿即后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这几段文字是经过毛泽东同志加写和改写的。

一

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1]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

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三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四

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五

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

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六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2]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

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注释

[1] 吴晗，见本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4]。

[2]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时的谈话。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亲手创立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

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

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1]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他（邓小平）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

注释

[1] 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瞿秋白，别名瞿霜，瞿爽。江苏常州人。1922 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成为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在 1927 年 11 月—1928 年 4 月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1929 年遭到王明错误批判，1931 年被撤职。 1935 年 6 月 18 日晨，在罗汉岭从容就义。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王明的错误批判做出了平反。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1930 年秋，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1930 年，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一整套“左”倾错误主张，被称为“立三路线”，曾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1930 年 9 月 24 日，中央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王明，安徽金寨县双石乡（时属安徽省六安县）码头村人，原名陈绍禹。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1931 年 1 月夺取了中央领导权，至 1934 年间，在党内推行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晚年撰书疯狂反对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 张国焘，字恺荫，又名特立，江西省萍乡县人（今萍乡市上栗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35 年 10 月妄图分裂党另立中央。1938 年 4 月投靠国民党。 张闻天，又名洛甫，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与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同志一起被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高岗，原名高崇德，字硕卿，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 年由于反刘少奇，被邓小平等人揭发，因分裂党被批判。 饶漱石，江西省抚州市临川钟岭乡人，建国前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华东军区政委兼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54 年，被邓小平等人揭发，因分裂党受到批判，1955 年被开除出党。 彭德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1959 年因给毛主席上“万言书”指出当时大跃进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被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借题发挥，大肆批判。最终毛主席不得不为了防止党的分裂，折衷地做出了免去彭国防部部长职务的决定。1965 年毛主席对彭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改革开放后，党将整彭的责任有意推给毛主席。 罗瑞卿，大将军衔，四川南充人。1965 年 1 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2 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被先后解除党政军领导职务。 彭真，见本卷第 56 页注释[4]。

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毛泽东同志这个批示，又被称为《五·七指示》。

林彪[1]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2]，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3]；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注释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2] 指中共中央军委总后勤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日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报告说，从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3] 见本卷《学校一律实行半工半读》注释[1]。

在杭州同胡志明同志的谈话纪要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

毛：自古以来，总是没有经验的人民打胜有经验的军队；没有枪的打胜有枪的；很少的人打胜很多的人。你们不也是这样？八月革命时你们有多少人？

胡[1]：党员共有五千多人，没有多少军队。

毛：你们的军队开始恐怕只有几百人，以后有千把人。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你不是在帮我们的忙吗。那时，我们工人、农民有几千万人，组织在工会、农民协会里。农民有农民自卫队，工人有纠察队。可是没有准备敌人杀人。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四个月工夫，一扫而光。跟印尼现在的情况差不多。五万党员剩下一万不到，十个人中只剩下两个。另外的四万那里去了？一批被杀了；一批投降了；一大批不干了，吓破了胆，不敢活动，离开了党。只有八、九千人继续干。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七搞八搞，搞了十年，打了一部分败仗，多数是打胜仗。军队发展到三十万，包括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但是，在十年中遇到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是瞿秋白；第二次是李立三、向忠发；第三次是王明。结果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当时，我们这些人被赶出军队。我是一次被"开除"党；三次被赶出军队。其实是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有谣言说被开除出党，成为民主人士。我是井冈山的书记、地区的特委书记，支部也不能参加了。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整我，后来又说师长可以当。就是这样，当了半年多的民主人士。后来搞清了，没有开除出党，又当起党代表，当起政治委员了。那是一九二八年。他们说，我犯的错误，第一是烧房子烧得少了；第二是杀人杀得少了；第三是话讲错了，我为什么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他们到处发通知，说我是"左"倾机会主义，什么枪杆子里还

能出政权。后头又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们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你看，怪不怪呢。

胡：天下无奇不有。

毛：你有这套经验吗？你是一帆风顺，开始就当党的领导者。

胡：你说得对，我是一帆风顺，没有遭受过反对。

毛：你有马克思保佑。你的马克思主义比我多。

胡：我不承认。

毛：为什么人家不反对你?

胡：我们是党小、国家小、军队小。党和军队的其他领导人年纪都比我小，这也是个原因。

毛：你是老资格了，也有一个坏处，你没有受过挫折，没有经验。

胡：对。

毛：所有的人都叫你“万岁”。我这点跟你不同。

胡：正因为这样，你的经验多。

毛：许多次是把我打倒。有一次是在江西，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打胜了，却说我犯了错误，一贯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丝毫的马列主义。有丝毫也好，丝毫都没有。他们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路线。说我打仗也是机会主义。他们说应该打大城市，我不打。如象说你们现在不打大城市也是右倾机会主义一样。你打，人家一攻，又得退出。现在你们这八十万敌人，能机动的不过二十万人而已；其他六十万，要守公路、机场、海港和大小城市。就在这一点

上，你们会胜利的。

胡：向你报告，现在我们在西贡周围有几个营。

毛：但不要去打西贡、岘港。其他省城也暂时不占。占了人家来恢复，又得跑出来。

胡：现在我们有一种特工部队，到市内去打美国大使馆、打飞机场的就是这种部队。我们不准备现在就去打大城市。

毛：这个好。偶然进去一下又出来好，如象打岘港那样。因为有你们的人作内应，铁丝网、壕坑等都有人破坏。搞几百人进去，突然袭击；外面打炮。几个钟头后，几百人又出来。这样好。以前我们也打过很多次。一些小城打进去了，可以收集很多资料，有敌人的报纸、图书馆；也可以扩大兵源，几天内扩大几千人。如象我们打过江西的吉安。我们有三万人，敌人只有一个旅，几千人。我们住了十天，就扩大了一、两万军队。以后，我们还打过福建的漳州。是我同林彪去的。歼灭敌人一个师，得了许多武器、弹药；还得了陈嘉庚的许多胶鞋，他是新加坡华侨大资本家，做橡胶生意的；也得了一批马列主义的书。国民党为什么会有马列主义的书呢？他们的图书馆里也有，是为了研究我们用的。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还有世界经济地理、社会发展史、德波林的历史哲学等。

毛：德波林这个人我很熟悉。斯大林批评他是孟塞维克。他不同意斯大林，也不同意列宁开创了哲学的新阶段。当他八十岁以后，赫鲁晓夫发给他勋章。这一两年才死去的。以前批评德波林的人，现在又成了修正主义者，如米定、尤金、罗森塔尔等人。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

过问。比你们的河内坏。我不能过问，刘少奇同志不能过问，周恩来同志不能过问，邓小平同志不能过问。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列宁发明的。什么是我的发明呢？明明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说的。列宁不讲辩证法的三个原则。“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抄黑格尔的，主要是恩格斯抄的，列宁就不抄。他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但要解释和发挥。他没有来得及解释和发挥。我们是遵守列宁的原则，不搞三个原则。斯大林违反了列宁的原则，搞了个四个原则，叫做“联系”、“质量互变"，“发展”、“对立统一”。我们也不听斯大林说的；我们相信列宁。我不过是遵守他的指示加以解释和发挥。按照这条规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2]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列宁虽料到会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反对派，但他的办法是不杀人。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四年，掌握政权不到八年的时间，列宁死了。在这段时间中，他主要搞理论去了。工会工作做了一点，不多。农民工作根本没有做，农民运动的纲领都没有搞。十月革命时，临时用民粹派的纲领作

为布尔塞维克的纲领。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开会时，列宁说，对这个纲领不要讨论太多。民粹派对自己的纲领是不能执行的，提出“到民间去”，也走不通。以后民粹派成了富农的代言人。

你们以前说犯了错误，土改不应该搞左了，人杀多了。我看是杀少了。你们出了《人文》、《佳品》。你们怕群众搞示威，向我们要催泪瓦斯。《人文》、《佳品》不过就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胡：现在中国的四个省正在帮助越南的七个省，如广东帮助我们的广宁省等。

毛：帮助些什么?

胡：帮助搞农业生产、水利、改良稻种、牛种，还帮助办小型发电厂、小工厂，搞改良农具等等。

毛：你们的炼钢厂搞起来了吗?

胡：已开始投入生产。敌机也已开始在附近轰炸。

毛：年产钢多少?

胡：很少，还没有轧钢设备。

毛：你们那里有煤矿、铁矿吗？铁砂从那里去的？从中国去吗?

胡：越南有煤、有铁。中国也去一点。

毛：没有钢，没有机械工业，国家就没有整套的工业。

胡：可能你还记得，是我在见你后，在你的鼓舞下，才建钢厂的。

毛：我最关心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

胡：我们太原钢厂的设备和专家都是中国的。

毛：可以从小型开始，逐步发展。有个什么十几年，就可以搞成。小型轧钢机可以从中国弄去，炼钢可以采用新的技术。我们已经开始搞用氧气炼钢。有些新技术也可以从中国弄去。初步，不要搞急了，搞多了，我们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亏，一年搞了一千七百个基本建设项目。搞了几年不行，然后缩小下来，变成七百多个。你看，减了一千个，有的已经搞成了，没有搞成的基建单位，就象癞痢头一样。那时就是贪大、贪多、贪全。可惜你没有到锦州去看看。那里搞了许多小工业。没有资金，干部、工人每人凑一点，没有钱盖房子，就搭个草棚。现在出了许多新产品。有些大工厂，很落后，比如鞍钢，有十六万工人，年产五、六百万吨钢，但它有落后的一面。

毛：第一朝是陈独秀，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共七年的时间；后来他跑了，跑到托派那里去了。第二朝是瞿秋白，他是“左”的，只搞了三，四个月。我刚才说的把我赶出政治局，有人造谣说我被开除出党，当了民主人士，也是这个时候。第三朝，李立三、向忠发[3]，搞了几个月，“左”得很，要打大城市。第四朝是王明，他的时间最长，统治了四年之久。他没有到根据地去过，但他的人马去了。五个根据地都有他派去的人；国民党统治区也有他的人；彭真就是执行王明路线的。第五朝是张闻天。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是国民党的人。

胡：过去他们参加过国民党?

毛：在第一次大革命国共合作时期，那个不算。我也参加过，是党要我们参加的。对他们，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只是一种怀疑。他们都有一个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胡：他们被国民党收买了吗?

毛：彭真被国民党抓过，怎么出来的，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他们混进党内这么久没有看出来呢？他们的错误我们发觉过，如彭真在延安办党校就犯过错误。在晋察冀时也犯过错误，现在才揭发出来，过去不知道。聂荣臻知道，他是晋察冀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也是晋察冀的。彭真到晋察冀不到两年时间，执行王明路线。这个时候的王明路线同十年内战时不同，十年内战时王明路线是“左”的，主张打大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王明路线是右的，是投降主义。后来，王明也跑了，去莫斯科，是我们送去的。他现在还用假名字写文章骂我们。此外，跑了的还有张国焘，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现在香港当美国特务。在井冈山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接替我的政委，后勤部长，也都叛了党，跑到国民党方面去了。你看，几朝都是叛变。陈独秀叛变了，瞿秋白被捕后写了自首书。向忠发（实际上是李立三路线）被捕之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相当蠢。王明被捕后也成了叛徒。他被捕了几次，怎样放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在东北，他被日本人抓过；在上海，被蒋介石抓过，然后放出来。饶漱石在新四军时被抓过，怎么放出来的不清楚。彭德怀是国民党的团长，同我们打过仗，后来投机；历来都犯路线性的错误。罗瑞卿是同彭德怀合作过的。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里通外国。

胡：留下来不是危险得很么?

毛：就是危险得很。但不到一定的机会，他们不自己暴露，我们不整他们。如彭德怀，历次犯错误，我们只是批评批评，但他记仇。抗美援朝时，他当了司令员，回国后又当了七年国防部长。他拉走了几个将军呀？将军、文官被他拉走的

不到十个人。我们党这五朝，领袖都不好，革命失败了嘛。两次大失败：一九二七年陈独秀领导时革命大失败；一九三四年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五千人，还不是失败吗？但党并没有消灭，军队还有两万五千人，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又变成了一百万人。这时，我们有了经验了。经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我们有了经验，使我们能够作出总结了。所以，要感谢这些人教育了我们。首先要感谢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第二要感谢右倾机会主义者、“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否则。单单靠马克思主义是教育不了我们的。

毛：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当知县可了不起。

胡：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

康生：无官不贪，官与贪是分不开的。

毛：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文艺界又分好多界，有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美术界、雕刻界；戏剧界又分京戏和几百种地方戏。

毛：今天，我只睡了两个小时，因为心里有事，要见你这胡伯伯。我打听你几点钟睡，知道你五点钟起床，好，我七点见你。前天我睡了八个小时，昨天睡了八个小时，今天睡两个小时够了。夏天，有时我几天不睡觉。庐山会议时，我没

有睡觉，讲了话之后，去游水，回来又讲，是整彭德怀。现在，主要是看大字报；报纸上也很热闹。大字报厉害得很，有群众性，轰轰烈烈。你可以到浙江大学去看一看嘛，晚上，化装去，戴上口罩去看一看嘛；这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的一个好办法。

胡：一九五七年时我也在中国看过大字报。

毛：没有这一次深入、广泛。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受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些人都钻到我们党内来了。这样一说，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胡：中国有的，越南也有。中国搞的，越南也要搞，虽然越南的规模要小一些。越南的情况同中国是一样的。

毛：可能都是一样。你们也有小学、中学、大学教师，这些人还不都是旧知识分子。党内的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种人都有。我们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入党的。他们没有经过什么风浪，没有经过斗争，其中好的也有，坏的也有。

胡：所以有矛盾。

毛：就是有矛盾，我同很多人有矛盾。

胡：从你谈的历史情况来看，问题真是复杂。

毛：斗争很复杂，但党并没有灭亡。

胡：听了毛主席、刘主席等同志的谈话，我吸取了一些经验，也比过去更加担忧了。

毛：一方面要担忧，一方面要乐观。党不会灭亡，天塌不下来，山上的树木照样长，水里的鱼照样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若不信，你看看嘛。难道出了赫鲁晓夫，天就会塌下来，山上的树木就不长，水里的鱼就不游，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吗？

我就不信。事物的发展不断地转向它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的接班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死后还有斯大林一代。斯大林没有料到，他死了之后，赫鲁晓夫反对他，而且反得那样不近人情。

注释

[1] 胡，即胡志明(一八九〇——一九六九)，越南共产党的缔造者，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一九四六年当选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政府总理。一九五一年后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曾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法和抗美救国战争。

[2] 爱德华・伯恩斯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领域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一战前夕，卡尔・考茨基在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会主义理论。

[3] 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在 1928 年 7 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领袖。1931 年 6 月 22 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6 月 24 日被国民政府枪杀于上海，终年 51 岁。此人缺少才能、品德败坏，是混入党内流氓无产者的典型代表。

给江青的信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毛泽东同志这封信是一篇重要的著作。这封信的历史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整个毛泽东时代，令人不得不感叹毛泽东同志的洞察力和预见力。

江青[1]：

六月廿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2]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3]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4]，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5]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6]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7]，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8]，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

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9]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10]，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11]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12]，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

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13]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１９６６年7月8日

注释

[1] 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 魏，指魏文伯，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陈，指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3] 指上海市。

[4]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接见尼泊尔王国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七月十七日，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一些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5] 指杭州市。

[6] 指毛泽东同志家乡湖南韶山的滴水洞。

[7] 指武汉市。

[8] 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又被称为“政变经”的长篇讲话。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讲话。

[9] 《后汉书·左周黄列传》中这几句话为：“‘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10] 指毛泽东同志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1] 指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2] 一九七二年五月，毛泽东同志的这封信曾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之五印发。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和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曾先后发表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
[13]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岛、澎湖列岛及其周围的大小岛屿。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的谈话。

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1]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

（几个少先队员给他爸爸贴大字报说爸爸忘了过去，没有给我们讲毛泽东思想，而是问我们在学校的分数，好的给奖品。）

大字报写得很好！

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挥出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团中央[2]应该站在学生这边，可是他站在镇压同学那边，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本反动派。

借“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

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能靠在外面。

有些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自己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有些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外办的张彦跑到外面给人扣了二十几个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

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一个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注释

[1]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大字报抨击了当时工作组和党委面对学生革命要求和革命行动一再压制，再三“加强领导”的行为。

[2]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北京市所有中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交给团中央领导，要团中央派出工作组，以便领导运动。团中央立即抽调了一千八百多名团干部，组成三百多个工作组，迅速派到了各所中学。胡耀邦兼团中央第一书记，胡克实任常务书记。胡克实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 “内外有别”：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议出八条指示：“八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污蔑人；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工作组要撤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和中央文革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开两个会，讲了一些大学革命工作，主要讲工作组要撤，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前天讲工作组不行。前市委烂了，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坏了，人民日报也不行。六月一日公布大字报[1]，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革命就得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也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翦伯赞[2]，写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依靠革命师生。少奇、小平开口闭口怕乱，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现在停课又管吃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只有依靠他们搞。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昨天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我也不行，现在无非是搞革命，一是斗坏人，一是革思想。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权威，陆平[3]有多大斗头？李达[4]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出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也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然后集中起来。

工作组搞成联络员或是叫顾问。你们讲顾问权大，那还叫联络员。工作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着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电话、打电报，限制人家上北京。要在文件上写上，可打电话，可打电报，可派人到中央，党章早就有了嘛！

（康生：工作组公开传达少奇、小平的指示，要大家绝对相信工作组，说反

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大搞排除干扰，实际上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相反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南京新华日报被包围，就不得了了，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牵涉到你头上来。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好人来了你们不见。你们不出去，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之，是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李雪峰、吴德[5]，你们不去看大字报，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北京大学三次辩论，我看不错。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叫讲就讲几句，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

你叫革命师生一点毛病都没有，搞一、二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你去就是叫围吗？广播学院、北师大打人问题，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没有死人嘛！左派挨打是锻炼，右派挨打就挨几下嘛！但这不能成为不撤工作组的理由。教科书你工作组能弄出来吗？不行，还得靠本单位的人才能改。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会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会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科书半年编不出来，我看可以去繁就简，错误的去掉，加来不及了，加要加中央社论和通知。（有人提：加主席著作）那个是方向、指南，不能当了教条，如处理广播学院打人，哪本书上有？哪个将军打仗还翻书？现在这个阶段要把方向转过来。

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如翦伯赞可被右派用，也可被左派用，是个活字典，但不能集中，像中华书局那样，可搞个训练班，活字典，只要不是民愤极大的。代表会，革命委员会都要有个对立面，常委就不能要了。

除你（指李雪峰）那个市委，人不要多，多了他们就要革命、打电话、出报表，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现在部长很多都要秘书，统统去掉。我到延安前就没有。市委机关可搞个收发，你夫人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国务院的部有的可改为科，庞大机关，历来无用。

（邓小平：没有了工作组，右派复辟怎么办？黑帮闹事怎么办？）

工作组出来后，有些是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的部长就那样可靠？有些部、报馆是谁掌握呀！有些人不想想，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要闹事，闹事就是要革命。我回北京四天后还倾向保现成的。许多工作组就是阻碍运动，如清华、北大。文件上要写上，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写大字报，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反对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呀！他还拥护党中央嘛！不打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的斗争嘛！不准打人，叫他们放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

注释

[1] 见本卷《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注释[1]。
[2] 翦伯赞，见本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4]。
[3] 陆平，原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4] 李达，原任武汉大学校长。中共一大代表，后因故脱党，一九四九年重新入党。
[5] 李雪峰，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作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间状态的一些人组成学校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事。学校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斗和改，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我们能斗能改吗？象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依靠本校、本单位，不能依靠工作组。工作组能否改成为联络员？改成顾问权力太大，或者叫观察员。工作组阻碍革命，也有不阻碍革命的。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派人。那样怕能行吗？所以西安、南京报馆被围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们这些人呀，你们不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的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又是无名小将，说不清，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有感性知识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识。南京做得比较好，没有阻挡学生到中央来。（康生插话：南京搞了三次大辩论：第一次辩论新华日报是不是革命的；第二次辩论江苏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辩论的结果江苏省委还是革命的；第三次辩论匡亚明是否戴高帽子游街。）在学校，革命的是多数，不革命的

是少数。匡亚明是不是要戴高帽子游街，辩论的结果自然就清楚了。

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到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今天要搞文件，就不去了。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倾话的。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官僚主义，去了会被学生包围，要他们包围，你和他们几个人谈话，就会被包围起来。广播学院被打一百多人。我们这个时代就有这个好处，左派挨右派打，锻炼左派。派去工作组六个月不行，一年也不行，还是那里人行。一是斗，二是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材半年改过来不行，要首先删繁就简，错误的、重复的砍掉三分之一到一半。（有人插话：砍掉三分之二，学毛主席语录。）政治教材，中央指示、报纸社论是群众的指南，不能当做教条。打人的问题，通知上没写也不行，这是方向、是指南，赶快把方针定下来，改过来。要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和左派，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有右派参加也不要紧，有用的，可以当反面教员。右派也不要集中起来。北京市委不要那么多人，人多了就要打电话，发号施令。秘书统统砍掉。我在前委的时候有个秘书叫项北，以后撤退的时候，就没有秘书了。有个收发文件的就够了。（康生插话：主席谈了四件事：一是改组北京市委，照办了。二是改组中宣部，也照办了。三是取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照办了。四是有一些部改成科，没有办。）是啊！部长管事的可以不改，称部长、司长、处长。不管事的就改，改成冶金科、煤炭科。（有人插话：北大进行四次大辩论，“六•一八”事件是否是反革命事件？有人说是，因为里边有流氓；有的说不是，工作组有错误。附中有四十多人要提出撤销工作组长张承先的职务。）有许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包括张承先在内。不要随便捕人。什么叫现行反革命？无非是杀人、放火、放毒，这些人可以捕，写反动标语的暂时不捕，树立个对立面，斗了再说。

关于宣传工作的若干指示*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宣传工作的若干批示。在这些批示中，毛泽东同志对当时在宣传战线上已然泛滥的过度个人崇拜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遏制工作。

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题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会议愤怒声讨文艺界黑线总头目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的新华社电讯稿的批示。

陶铸[1]同志阅后，退张平化[2]同志：

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毛泽东

七月廿五日

标语、口号要大精简（一九六六年九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央关于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口号的通知稿的批语。

陶铸同志：

标语、口号太多，是烦琐哲学，要大精简，各有十几条就够了，至多总共不要超过三十条。多了，原也不记得，不看作一回事了。请再议削，印出交来。

毛　泽　东

九月十日

要谦虚，特别是对外（一九六七年六月）

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

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不要失去原理。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把“光焰无际”也勾掉了。世界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际”，所以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利有害（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二八〇期上刊载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材料写的批语。

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毛　泽　东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援外飞机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写的批语。

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不要强加于人（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审阅某援外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时，删去其中“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修建××××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一段话，并写了这个批语。

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宣传应当予以改革（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答复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对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批评的请示报告上写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三月，威尔科克斯来访时提出，中国的对外英语宣传，内容很好，但所采用的语言和形式，与英语国家的群众格格不入，易引起反感。同年十一月，威尔科克斯又委托访华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转达他对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说“中国同志应很好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

此事我已说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

不应吹得太多（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在《人民日报》发表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上写的批语。这个声明涉及缅甸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空话不要再用（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时，将其中“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二十一字删掉，并写了这个批语。

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以我为核心”是错误思想（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关于请毛主席接见参加第七机械工业部一个会议的代表的请示报告时，在报告中“世界革命中心——北京”下面划了两道杠，并写了这个批语。

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写的批语。

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

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

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一九六八年九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初稿）时写的批语。

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不要写这类语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中共中央军委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关于同意核实验中使用飞机给国防科委并空军的复电稿的末尾，写有“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同志审阅时删去了这句，并写了此注。

请注意以后不要写这类语句。——毛注

不要讲这类话，我曾说过一百次（一九七○年四月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送审稿的批语。

此文写得较好，已看过，另一篇待看。用这一篇似乎就够了，可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3]，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有用的话，不至于引起反感的话，保留了几段，并未全删。以上请酌。

毛　泽　东

１９７０年四月三日

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一九七○年十二月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写的批语。

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

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注释

[1]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2] 张平化，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3]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〇年四月一日送审稿第一、二页上，删去了以下一段话："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许多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有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列宁有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在第二、三页上，删去了以下四段话："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正是由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节节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垂死挣扎，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激烈。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刚刚冒头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洞察到现代修正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一次又一次击退现代修正主义的逆流，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在第五页上，删去了以下三段话："毛泽东同志还精辟地指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国家、全民党，是一言丧邦。'""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兴邦、丧邦，就是指的社会主义之邦。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有社会主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天才地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划时代的伟大贡献。"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

在治安时代以后的北洋军阀，后来的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的。现在的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1]有何区别？中央下命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对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的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方向问题就是中心问题，是路线问题，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问题，感到危险。自已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大家起来又加以镇压。所谓方向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这类的事情就要爆发出来，明明白白就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学生，是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别让外国人知道，其实除了机密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地不让外国人看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都写在宪法里。从这次镇压学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

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我看该处理。

注释

[1] 陆平，见本卷《工作组要撤》注释[3]。 蒋南翔（1913.9.7-1988.5.3），江苏宜兴人，曾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毛泽东同志这篇大字报，表明了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方法上与刘少奇一伙的根本分歧，将斗争矛头直指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1]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2]，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注释

[1] 指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写的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2] 指《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发表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附录：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

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

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要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一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志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起重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

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

在修改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时所加和改写的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

一

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二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我们一定要百倍地提高警惕，防止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突然袭击。如果它们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七亿中国人民，就一定要打断侵略者的脊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们消灭掉。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1]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2]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3]，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文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

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

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注释

[1]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
[2] 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3]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和批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际国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措施，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调整中央领导机构。

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了李雪峰[1]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后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害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打你们"。大家就是不检讨。伍修权[2]家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已要教育人，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讲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

问刘澜涛：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刘回答：回去看看再说。主席说：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

问总理会议情况，总理说："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主席问李井泉：廖志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怎么样？李答："开始不大通，会后一般较好。"主席说：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已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 Q 正传》。

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一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问李先念：你们今天会开的怎么样？李答：“财经学院说他们要开声讨会，我要检讨，他们不让我说话。”主席讲：你明天还去检讨，不然人家说你溜了。李说：“明天我要出国。”主席讲：你先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有点精神不足。

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3]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一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陶铸插话：“大权旁落”）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倒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议就好了。

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四个人又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

遵义会议后，党内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后，项英、彭德怀搞独立王国。新四军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

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相互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好结果。

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王、李没改（周总理插话：李立三思想没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不管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

七大时，陈奇涵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人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了中央委员啦。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几个人还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固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你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

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么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五七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共产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就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

比彭、罗、陆、杨[4]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么纪念哪？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了反面（康生同志讲：八大政治报告是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学的思想，把会议开好，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会，学生就让他们闹去。我们开了十七天会，有好处。像林彪同志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讲阶级斗争熄灭了，一九三九年又搞肃反，这还不是阶级斗争。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做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

注释

[1] 李雪峰，见本卷《工作组要撤》注释[5]。

[2] 伍修权（1908 年 3 月 6 日—1997 年 11 月 9 日），祖籍湖北阳新县王英镇毛坪村武玄组，出生于湖北武汉武昌。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3] 见本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11]。

[4] “彭、罗、陆、杨”即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立案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的事件。1966 年 5 月 4 日至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对这四人的错误进行了批判。5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1979 年 2 月、6 月，1980 年 5 月、10 月分别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作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讲几句话，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就是搞一、二线。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作了改变，这是一件事。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搞，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后来处在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有些应当我抓的事情，我没有抓，所以，我也有责任，不能完全怪他们。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

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大家同意了。再嘛是过于信任别人了。这件事引起警惕，还是在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几件事，时间很短，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红卫兵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我这个

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

上次开会我是没有信心的，说过决定通过了不一定能执行，果然很多同志还是不那么理解。现在经过两个月了，有了经验，好一点了。这次会议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大家发言都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经中央同志讲话，交流经验，就比较顺了，思想就通了一些。运动只搞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

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1921—1924 年）。开始搞民主革命，谁也不知道怎么个革法，斗争怎么斗争法，以后才摸出一些经验。路也是一步一步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总结经验，搞了二十八年嘛。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嘛，所以就不能要求同志们都就那么理解。去年批判吴晗的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是个别抓，抓不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一、二、三、四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引起注意，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赶快总结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为什么两个月之后又开这个会？就是总结经验，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以后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作。中央局、省委、地委、县委召开十几天会，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以为所有都能讲清楚。有人说，“原则通了，碰到具体问题处理不好。”原来我想不通，原则问题搞通了，具体问题还不好处理？现在看来还是有点道理，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作好。上次开会回去，有些地方没有来得及很好开会，十个书记有七、八个接待红卫兵，一冲就冲乱了，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也没有准备回答问题，还以为几十分钟讲一讲，表示欢迎就可以

了。人家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被动了。这个被动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所以我对这次会议信心增强了。不知你们怎么样？如果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护现状，让一派红卫兵对立，拉另一派红卫兵保驾，就搞不好。我看会改变，情况会好转。当然不能过多地要求中央局、省、地、县广大干部全部都那么豁然贯通。不一定，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但是我相信多数讲得通的。

上面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讲历史，一件事讲历史，十七年一线二线，不统一，别人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第二件事，五个月文化大革命，火是我点起来的，时间很仓促。与廿八年民主革命和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比起来，时间是很短的，只有五个月。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不通！你们过去只搞工业、农业、交通，就是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你们外交部也一样，军委也一样。你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要打倒你们！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对李雪峰讲："没有想到我们老前辈为什么怕红卫兵？"还有伍修权。四个小孩分成四派，有的同学到他家里来，有时一来好几十个，有好处，我看跟小孩接触很有好处。大接触一百五十万，几个钟头就结束了，也是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次会议发的简报不少，我几乎全部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不好过，你们着急，我也着急，不能怪同志们，因为时间太短。有的同志说不是有心犯错误，是糊里糊涂犯了错误。可以原谅。也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

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时间太短，新的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我看十七天会议以后会好一些。

还有哪个讲？今天就完了，散会。

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同志签署的这份中共中央贺电，是由中共代表团团长、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同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祝贺你们的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以恩维尔·霍查[1]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

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2]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抔黄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战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在那些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当权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改变颜色，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英雄的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顶住了这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逆流。你们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你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你们为无产

阶级专政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们一边。国际无产阶级在我们一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们一边。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我们不怕孤立，也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一小撮反华、反阿尔巴尼亚的可怜虫，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处在新的觉醒之中。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害人虫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当然，我们前进的道路绝不会是笔直的、平坦的。请同志们相信，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一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注释

[1] 恩维尔·霍查，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2] 铁托，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南斯拉夫总统。《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发表的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以大量详实而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已经走向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由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现在横直是斗争，已成为既成事实。在美国的侵略面前，谁都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究竟是你们侵略了美国还是美国侵略了你们，谁都看得很清楚。这是了不起的斗争。原来我们大家都在摸索想搞出一条规律来。最近两年可以说基本规律你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长处、短处，自己的长处、短处，敌人有些什么办法，你们用些什么办法来对付他，都比较清楚了。我们赞成你们，支持你们。你们的经验是有世界意义的，大家都向你们学习怎么打美国人。美国看样子很凶，但实际上不是你们怕它，而是它怕你们。它不怕你们为什么要增兵呀？它就是这个计划不行了又换另一个计划。亚洲许多国家群众中蕴藏着一种反抗的革命力量，但是还没有爆发出来，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机会。现在美国打进你们那个地方，你们就有可能把革命搞起来。你们会胜利的，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表示快胜利了。可能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是吴庭艳统治南越的时候，也可能是现在，但是实际上就要胜利了。苏联人民还是帮助你们的，苏联人民是友好的，苏联许多干部也不一定是悲观失望的，有些还是看得清楚的。苏联的广大人民、广大干部不仅跟我们友好，也是跟你们友好的。我们虽然不赞成他们那个联合行动，但是分别行动嘛，各援助各的！世界上坏人总是少数，好人总是多数。比如过去法国人对你们不友好，你们应该区别法帝国主义者跟法国工人阶级。现在法国人离开了你们国家，包括戴高乐在内也反对美国。

你们把二百万公顷土地分给老百姓，这是一件大事。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当然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过去法国的拿破仑政府就曾经做过。为什么拿破仑的

军队能够打遍欧洲呢？就是有农民的支持。当然，他是资产阶级，你们是共产党，性质不同。因为共产党分土地跟资产阶级分土地性质不一样，资产阶级分土地的结果是要走向资本主义。共产党分土地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个是走向社会主义。比如我们国内把土地分给农民，跟你们北方一样组织集体经济。但是，现在还是有两种可能：一种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一种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

中国的民主革命开始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要开一个会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孙中山领导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共产党嘛， 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推翻清朝政府，也搞武装斗争，所以不要忘了孙中山。

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全世界真正革命的共产党的共同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恩维尔·霍查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你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阿尔巴尼亚已经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为具有现代工业、集体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措施，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任务和制定的宏伟纲领，为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开辟了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

阿尔巴尼亚人民正满怀信心地沿着劳动党所指引的方向，英勇地向前迈进。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人民，一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英雄的阿尔巴尼亚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强堡垒。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反对帝国

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种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让我们共同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起，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决进行到底。

祝中阿两党、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关于陶铸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

陶铸[1]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以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上，在报纸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的镜头是陶铸安排的。（有人插话：陶铸到处开空头支票，每次接见都讲，来京都想见毛主席。很好，我想主席会见你们的。今年不见明年一定见。用这个来将主席的军，搞两面手段，自己落好。）

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干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插话：陶铸非常坏，新华社去年十七周年有一张照片，有五个人：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邓小平的身子是陈毅的身子，把陈毅的头割掉，换上邓小平的头。）

在中南局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的，没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注释

[1] 陶铸，见本卷第 96 页注释[1]。

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号造了反，《解放日报》六号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转载，电台可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纸，依我说封了好，但报还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定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吴冷西，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

我们报纸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住那里吃饭，许多事宣传部、文化部都管不了，你（陈伯达）我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〇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那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要与各种人，左、中、右都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样干

净，我向来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1]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他们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岗位上让群众监督。

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青年时《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是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注释

[1] 吴冷西，原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新华社社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在修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时所加的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一

必须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克服自己头脑中和自己团体中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所有这些违背毛主席教导的、妨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都是当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这些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根据毛主席一贯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多做自我批评，而不要互相攻击。

二

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

三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四

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

五

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人民解放军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社会主义事业创立新的伟大的功劳。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

给周总理的亲笔信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 泽 东

要将斗争水平提高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斗争方式方法问题的指示。

斗争要文明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要高风格。北京街头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打倒、砸烂狗头，哪有那么多的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很难理解。搞喷气式飞机照相片，登报贴在大街上被外国记者搞走了。现在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水平太低。

八月初，也没这凶嘛，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臭，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他们将来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太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这样就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上的问题摆出来也叫斗臭了，我看不合适。主要是政治上斗臭。

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卡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巴卢库时的谈话。

毛：我这个人是不大行的，你们同志们也知道。你们看看，中国搞得这么乱，没有搞好嘛。现在天下大乱。什么时候谢胡同志到中国来的呀?

周恩来：去年五月。

毛：去年五月我就向他讲这个问题，究竟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这两条道路，两个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胜利，还是无产阶级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我也说，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一九六二年，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比如十七年来，就有和高岗、饶漱石[1]的斗争，他们一个集

团，我们把他整下去了。这是一九五三年冬到一九五四年春。然后是一九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2]这个集团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卡：受毛泽东同志指示写的。

毛：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涂，到处保卫。

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

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比如象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这些人的子弟。所以，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把罗瑞卿[3]的问题处理了，那是前年十二月；把北京市委这些人处理了，是去年五月。发动大字报运动，是去年六月一号。发动红卫兵，是去年八月。你们有人不是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4]吗？谁人去见的呀？

卡：什图拉同志。

毛：她在去年五月二十五号写了一张大字报，那个时候我在杭州，到六月一号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这一下大字报就满天飞了！

巴：大字报就发出信号。

毛：也不是我写的，是聂元梓她们七个人写的。红卫兵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两处搞起来的，他们有一篇材料给我看到了。到了八月一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就大搞起来了。八月十八号我接见了红卫兵几十万人。接着八月上旬到八月中旬就开了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候我自己才写了一张二百个中国字的大字报，说，从中央到地方某些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学生，反对无产阶级，搞白色恐怖。这才揭露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才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一个《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人民日报》是夺了两次权的，第一次是去年六月一号；第二次是最近一月份。过去我公开声明，我说，《人民日报》

我不看。当着《人民日报》总编辑也说，我不看你的报纸。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我的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宣传部、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的手里，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许多人，大概可以分这么几部分：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赞成；实际上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赞成的，分到农民手里，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党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当了干部，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甚至更高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中央委员，这么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收容下来的国民党的这些人，其中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了，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人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解放以后他们进了学校，甚至进了大学，掌了一部分权。这些人也不是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比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等等，顶多有百分之五。那么，七亿人口里面也不过是三千五百万人。他们也分散，分到各个乡村、各个

城市、各个街道。如果三千五百万人集中到一起，手里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军了。

巴：尽管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军队。

毛：他是灭亡的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三千多方人里顶多有几十万人，也分散，分到各城市、各街道、各农村、各学校、各机关。所以，大字报一出来，群众运动一出来，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吓得要死。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也搞得很乱，又是什么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毛泽东主义，我就不喜欢这个“主义”，就不喜欢这个“ism"。

周恩来：我们说就是将来也用毛泽东思想，这也是一个体系嘛。

毛：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有人建议保留一个 Teacher，我是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 Professor（教授）谈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你们都进过大学吧?

卡：一个都没有。

毛：马克思是大学生，列宁是大学生，斯大林读了中学，我也是只读了中学。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怀疑的，特别是读文科、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如果不进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险，这些人将来就是修正主义。搞文学的不能写小说，不能写诗；学哲学的不能写哲学文章，也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学政治的、学法律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没有搞出什么好的教科书。还有学经济的。修正主义分子可多了。但是，现在看来有些希望，斗得厉害。

毛：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讲。但是，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

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

毛：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一百多年。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学校原封未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陈丕显不是派去的吗？以后选举的。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么！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还不如红卫兵，他们的领导人还和他们讲过话呢。

毛：不过红卫兵也在不断的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极少数，站在我们这边，受压迫，他们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变化，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

卡：去过。

毛：“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北大的聂元梓也是少数派，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5]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

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你们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肖华[6]的标语就更多一些。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打倒肖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肖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生几个都倒了。但是，有一条真理永远是真理，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

巴：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毛：虽然有些人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一点缺点，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

巴：工作上可以犯错误，可以改呀。

毛：可以改嘛！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至于犯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错误，现在没有时间，你们如果多呆几天可以跟你们讲，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

“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我们都是斯巴达克[7]，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压迫，组织共产党。

注释

[1] 高岗、饶漱石，见本卷《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注释[1]。
[2] 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参阅本卷《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注释[1]。
[3] 罗瑞卿，见本卷《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注释[1]。
[4] 聂元梓（1921 年 4 月 5 日－），河南滑县人。1964 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5] 蒯大富，1967 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文化大革命中，蒯大富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
[6] 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谭震林，1956 年当选为党的八大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李先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 陈毅，见本卷第 56 页注释[11]。 叶剑英，1966 年 1 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5 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8 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7 年 2 月，叶剑英受林彪一伙打击，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 聂荣臻（1899 年 12 月 29 日—1992 年 05 月 14 日），字福骈，四川江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因“二月逆流”问题，聂荣臻文革初受打击。 肖华（1916 年 1 月 21 日～1985 年 8 月 12 日），又名肖以尊，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潋江镇肖屋村客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将。1967 年 1 月受冲击，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采取措施使他得以复出。1967 年 7 月再次受连续批斗，12 月受到冲击，1968 年被秘密关押。
[7] 斯巴达克，即斯巴达克斯（希腊语：Σπάρτακος；拉丁语：Spartacus），约公元前 120 年－公元前 71 年。古罗马奴隶领袖，是一名古罗马色雷斯角斗士，与高卢人克雷斯、埃诺玛依以及甘尼克斯一起领导了反抗罗马共和国统治的斯巴达克斯起义。

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时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十八日）

一

上海的工作总的方向是好的。

你上次去的时候（安亭事件时），不是只有一、两千人吗？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一百万工人了，工人组织将近一百万了，这就说明上海工人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

你们那个时候，学生不是都到码头吗？那现在这些学生是不是还在码头啊？（张、姚：当我们陪卡博同志到码头去的时候，我们还是碰到很多学生在那里。）很好！

这一场革命，我们现在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发动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

（张、姚谈到：我们一个大学生刚刚毕业，有的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要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我看当一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学校很复杂，你是在一个学校里刚刚毕业、还没有毕业，全校的情况也不大了解。

有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当然，周谷城[1]再教书恐怕不行了吧！看哪些人还行呀？

我们应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会跟

着我们走的。只要我们善于引导，他们（指小资产阶级）也会跟着我们走的。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要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单位，连副科长都不要。这种副科长都不要的人，搞不了几天的。上海市人委机关向总理勒令，要把所有的部长都取消，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这是谁搞的?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再一个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

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国王，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啊。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天王，唐高宗（即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名称，是一个词，好象校长就低得多，总

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

名称不宜改得太多。还有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是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如现在有人不喜欢那个“长”啊，都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有点象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字，王莽皇帝下诏书都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那么下诏书他就要写上，譬如咸阳是陕西一个县，改成祁西，诏书里就写上“祁酉即咸阳”，把老名称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

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主要经验是巴黎公社、苏维埃。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苏联一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主要是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咱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改名字了。

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国号问题。是否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来这个问题，紧跟着改。不但出来这个问题，如大小都要改，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问题？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入在那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那里呢？总得有个党嘛！

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党呢？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里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这是十六条所规定的。

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啊！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啊？你们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想几个办法，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仍用“人民公社”）这个办法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缺点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不是很孤立吗？现在又不可以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一登，全国都要叫。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上面的问题，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承认不承认的问题。第三个办法，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了。可以早一些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些时候吧！你们怎么样？能不能说得通啊？

二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反马列主义的，是欺人之谈，对资产阶级有利，要好好批判。现在我们的斗争方法要高明一些，不要老是“砸烂狗头”、“打倒”，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地研究一下，选几段，写文章批判。

以后不要提“打倒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还是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上海的工作总的方面是很好的，你上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二百人的吗？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万的人了。工人组织起一百万人了，这就说明上海的工人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

注释

[1] 周谷城（1898 年-1996 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60 年代初，展开了围绕周谷城美学思想展开的大论战。1961 年至 1962 年间，周谷城先后发表了三篇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文章，即《光明日报》上的《史学与美学》，《文汇报》上的《礼乐新解》，还有《新建设》上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以后针对他的美学思想展开的论战中，他又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周谷城在自己的那些文章中，表述了自己在“正确认识矛盾斗争的限度”、“正确认识矛盾斗争与矛盾统一的关系”等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尤其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周谷城表述了一个主要观点，即“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的解释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被围追堵截的又一焦点。

对林彪三月二十日讲话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指示。

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1]。

一、依靠群众。这一点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做的，靠少数领导人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那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作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很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部队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队和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了。省里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有条组织纪律性强，行动快。如沈阳军队支左、支工、支农的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在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行动很慢。

三、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很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委书记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群众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注释

[1] 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林彪这篇讲话主要讲了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的问题；主流、支流的问题；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所加的一段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

*《清宫秘史》是 1948 年的一部黑白古装剧情片。此片以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把光绪帝、改良派、帝国主义作为矛盾冲突的一方，慈禧、义和团作为矛盾的另一方，一方面美化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一方面贬低丑化义和团等中国人民的反帝革命运动。这部彻底卖国主义的影片被刘少奇颂扬为“爱国主义”，受到毛泽东同志多次严厉批判。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戚本禹同志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加写的一段话。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在修改《<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时所加的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一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1]，有陶潜的《桃花源记》[2]，有康有为的《大同书》[3]，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二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注释

[1] 《礼运》是战国时期至西汉初期儒家思想及礼仪著作选集《礼记》中的一篇，其中所讲的“大同”是指一种“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2] 陶潜，即陶渊明，东晋诗人。他的散文《桃花源记》描述了一个与世隔绝、没有祸乱的“世外桃源”。
[3] 康有为，中国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他的《大同书》将《礼运》中的“大同”说与儒家公羊学派的“三世”说结合起来，提出自己的“大同”思想，认为“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

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分区，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1]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军委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注释

[1] 指广东省军管会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给中

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和中共湖南省军区委员会五月十二日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给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广州军区的报告。广东省军管会的报告说，最近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检查，认为部队支左以来，虽然支持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受到一些革命小将一针见血的批评。对于所犯错误，觉悟迟，改进慢，有些领导干部思想不通，患得患失，不敢承担责任，修正错误。为此，常委研究了今后改进的办法。湖南省军区党委的报告说，五月十一日晚，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从广州来电话，传达了广州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使我们清醒了头脑。大家决心做到：一、从上到下统一认识，把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迅速贯彻到各级领导中去，对照军委十条命令，检查前段工作。决定立即集训在基层支左的干部，机关干部与部队干部、战士，也相应集中五至七天时间（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注，即本篇三），搞两条路线的正面教育。二、纠正错误，做好工作。三、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要从上到下统一认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必须相信和依靠他们。四、加强领导。

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

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大概乱一两年就好了，现在已经乱了一年。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

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当然，我们也靠党和解放军。党从哪里来？还不是从群众中来的。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还不是从群众中来的。没有群众，哪里有党？哪里有解放军？

你们的教员也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压迫你们，你们就不会起来革命。全世界革命的人总是多数，反革命的是极少数。不过，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控制了城市、工厂、广播、报纸，就显得它有力量，如美国就是这样，过去中国也是这样。群众起来，他们就害怕了。他们不怕我们这些人，怕中国的老百姓。所以你们要注意团结人民。帝国主义不怕你们，怕你们的人民同你们团结起来。世界上的事，无非是这一派推翻那一派，那一派推翻这一派，归根到底，还是人民推翻压迫者。

要声明一点，我不是什么世界革命领袖，中国的事还管不好，还管外国的事？中国的右派反对我，我也没办法，现在开始找到一些办法。给我的封号很多，我都不承认。

在修改《伟大的历史文件》时所加的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一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

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

二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关于处理军民关系的几点指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

现在师军区、军分区较多，这个问题不要紧，不要怕。有些地方报纸封了，我们向来不主张办那么多报纸。绝食不要紧，这是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为什么如此？是因为我们支左支错了，认错不干脆，不承认方向路线错误，扭扭捏捏。错了没关系，搞了就好了。

为什么要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还有坏人，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意志衰退。绝食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就是要去做工作，不要把人饿死，要想办法。可以送开水，水里可以放些葡萄糖。开枪的地方大体是军队，不是军队支持，也是民兵。如青海、内蒙。这次文化大革命，也是对军队的一次考验。有些地方把情况报告得很严重，如江西、两湖、河南。是不是那样严重？过去东北比较平静，如今东北局和军队各支持一派。

北京也在分裂为两派，打乱架。乱了就可以乱出个名堂来。四川、贵州最乱，主要是贺（龙）、罗（瑞卿）、李（井泉）搞的，……和稀泥，有时也是必要的。各地的问题各地自己去解决，报中央批准。中央文革最近讲得太多了，不要到处讲，讲多就不灵。现在到处在骂保皇派，保皇狗，什么四三派，四四派[1]，还有不三不四派。现在军队较紧张，“联动”[2]放了么？

大学生各地串连的一律回校闹革命。北京市的大学生要全部撤，在中学、工厂、农村的要回来。农村要采取慎重的态度，有的武装部有问题. 要采取坚决态度，要坚决支持左派。错了就改，不要扭扭捏捏，要干脆。对保守派要做思想工作，采取教育、团结、争取的方针。屁股要扭过来。如果现在不纠正这个问题，

让保守派继续发展，我们就要犯错误。要同左派站在一起，做好保守派的工作。

有些武装部很顽固，如果这样下去。要犯极大错误，要注意做好武装部的工作。

注释

[1] 1967 年 4 月 3 日晚，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和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等首长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代表。江青在讲话中指责负责北京中学军训的北京卫戍区解散中学造反派组织的做法。谢富治说：“要把'联动’搞垮，必要时把军训停下来，为支持左派服务，左派组织不能解散。”中央文革小组及谢富治等的讲话使中学里一度受挫的那部分造反派大受鼓舞，并激起了他们对军训团自军训以来就存在的不满情绪。4 月 4 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中学造反派。他们讲话的主旨还是说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造反派，但也批评了给军训团和卫戍区贴大字报的做法。当天晚上，江青在接见“红代会”代表李冬民等人时也要求把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李钟奇贴的大字报盖上。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些讲话又给中学里支持军训团的那部分造反派红卫兵以很大的鼓舞，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支持军训团没错，搞以班级为基础的大联合没错。4 月 3 日受到接见的造反派回去后，发动群众在全市铺天盖地的刷满大标语：“坚决拥护江青同志四•三讲话！”“炮打李钟奇”。4 月 4 日受到接见的造反派回去后也发动群众铺天盖地地刷大标语：“坚决拥护江青同志四、四讲话！”北京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互相对立的两派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各取所需，互相指责，并由此形成公开对峙的“四三派”和“四四派”。“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共同观点是：反对血统论，反对学生斗学生，反对“红五类”组成的“老红卫兵”、“联动”。

[2] 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由成立于 1966 年 8 月 25 日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和同时成立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东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海淀区分队（“海纠”）组成。10 月 1 日，这些红卫兵们正式成立“联动”组织，全称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 年 12 月 26 日-1967 年 1 月 11 日，“联动”六次冲击公安部，其间还喊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口号。这些人大多是干部子弟，他们为了保护他们的爹妈，鼓吹血统论，打击真正的革命派，反对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干尽了比肩法西斯的暴行。1967 年 1 月，在中央领导同志甚至包括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干预下，“联动”成员纷纷落网。由于“联动”成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所以经过说服教育后予以释放，后来他们也有零星闹事，经过新一轮的抓、关、放后，“联动”作为一个组织正式消亡。

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

我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曾经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负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否认都否认不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已有了论述。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林彪同志插话：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凡是在革命群众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未犯错误。我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倒是一个不考试的考试，谁

能紧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我总说对毛泽东思想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所以我在中央特别主持制定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因为敌人是非常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有行动。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这个通知中已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了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李井泉就不通，刘澜涛就不通。伯达同志找过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查吧。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个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地挑开了党内的矛盾。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党团干部，在批判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他们都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的工农是具体的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是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这里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算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了。"一月风暴"就是工人搞起来的，随着全国工农起来了。这是革命发展规律，民主革命

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去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军装的工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的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为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个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的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的。北京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打的比较少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看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还得改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

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的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不语）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做资产阶级

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但既然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地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国家大事，世界的大事。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从自己话里说出去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个培养问题，不能在他们犯有某种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样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待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95%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是百分之一、二，顽固定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必须作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如按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他们组成一支军队，有组织地反对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

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能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更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五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会见多国外宾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二十七日）

一 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时的谈话

美、英在地中海和中近东相当被动。可能打局部战争，帝国主义在后面，主要是以色列和阿联（今埃及）打。[1]阿拉伯世界石油的大部分，约百分之六十，被美国控制，百分之三十五受英国控制。他们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要目标是争夺石油。战争既然打起来了，就可能要打一会。如果以色列在局部战争中得胜，战争可能上升。但这牵涉到苏联。他们说英国宣布中立，我不太相信。他们可能会封锁苏伊士运河，至少在战时是这样。这对他们自己会造成一些损失，但主要是整英、法、德，因为英、法、德的石油主要是靠这条运河运输。美国也要靠这条运河，但它可以从非洲南边走。如果运河真正被封锁，叙利亚真正把油管截断，欧洲国家的工业就会受到影响。欧洲这些国家主要烧石油。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苏伊士运河的运输都没有中断过。这次战争爆发，如果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卷进去，有可能把苏伊士运河堵死。如果没有别的国家参加以色列一边，光是它一个国家的军队要占领阿联、叙利亚、约旦，是不可能的。现在，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是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同阿联联合，连老殖民地国家利比亚，以及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也都和阿联联合在一起。

中国现在起了变化。这个变化还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中。现在已经一年了，再一年差不多了。用两三年时间来完成这种变化，并不算太长。有武斗，大量的是用拳头、椅子、棍子、石头、砖头打。更大量的是口斗，利用报纸、刊物、广播、广播车、大字报、标语，还有很多小刊物。这些报纸何止几百种，我就收到

两百多种，看不完。一个学校起码有两派。去年夏天，在北京，左派是少数，去冬今春变成了多数。但是少数派还存在。一个学校是如此，一个工厂也是如此。左派在今年春天掌权以后，又分裂了，两派都自称是左派。中联部也是两派。外交部有人要打倒陈毅，可是陈毅照样当外交部长。我们这个国家真有点怪。好几个副总理都有人要打倒，一个是陈毅，一个是谭震林，一个是李先念，但是他们还是在工作。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过去的领导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机会主义的。现在包括外交部这些部门在内，都建立了群众组织来监督工作人员。

二 会见秘鲁共产党（马）学习团、厄瓜多尔共产党（马列）学习团及玻利维亚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古铁雷斯时的谈话

你们讲的内容都差不多，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和打倒各国反动派，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项任务中，包括给农民分土地，但只是没收地主的封建所有制的土地，不能动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在你们国家里，总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是与帝国主义有矛盾的。在革命的第一步，也不能触动这部分资产阶级，这样，打击面就小了。要团结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反帝这个任务不是个小任务，你们的直接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但如没有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反帝就没有力量，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你们回去后，我希望你们少讲中国的事情，最好忘掉，但不要忘了有用的东西，这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你们国家具体条件结合起来，不和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谁也没办法。不要完全搬用中国的经验，

中国经验可供你们参考。你们应创造自己的经验。例如，越南南方的战争有很多特点。完全搬用外国的经验，我们是吃过亏的。但我们不能忘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忘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成修正主义了。马列主义原则，一些人可这样解释，另一些人可那样解释。所有的机会主义都说自己是马列主义，如中国开始时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后来的“左”倾机会主义都说自己是马列主义。讲讲我们是怎样失败——胜利——又失败——又胜利的，不讲历史就讲不出道理。战争只有在战争中学，阶级斗争只有在阶级斗争中学。在马克思以前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创造了并实现了列宁主义。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基本原则，可以创造本国的经验。

注释

[1] 1967 年 6 月 6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悍然对阿联、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略。”“我们坚决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坚决支持他们反对美、以侵略的正义战争。”6 月 7 日，北京举行 30 万人示威游行，拥护中国政府声明。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

*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九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视察这些地区时的谈话要点。本篇二、三是中央首长传达的毛主席视察期间其他重要指示。

一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

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1]，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

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

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

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二

在讨论训练干部的问题时，主席讲：现在红卫兵都当权了，不训练也很难办，可以开训练班，这个事情跟红卫兵讲一讲。他们还很年轻，容易犯错误，他们犯错误像列宁说的，上帝还是会原谅的，我们犯错误就不行了。训练可以人少一些，深谈一下，一次不行两次，可以多谈几次，要用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告诉他们犯了错误怎么办。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

主席对红卫兵很关心。你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几个负责人在一起多谈谈，不要急于一次谈成，不要动不动就说你没诚意，帽子很多。主席跟我们讲：如果在七大，不用整风方法把大多数团结起来，革命就会受损失。告诉那样争名争地位的人，在七大选举，有的人争中央委员，有的人反对王明当委员，但主席提名叫他当。

主席说：不当中央委员不见得是坏人，当中央委员的不见得都是好人。王明就是坏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八大时很人多不同意王明当中央委员，

主席仍提名。和那些反对你，但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一道参加工作也没有什么坏处。主席讲：革委会也可以叫几个保守派进来嘛。

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思想斗争，把人关起来不是办法。有些人应该让他们活动，他们总是要走到自己的反面的。斗争会要允许斗争对象讲话，允许人家答辩，不要不让讲话。

主席总是讲：让人家讲话嘛。有的造反派讲，我们是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所说的那样做的。

主席跟我讲过：那是对付地主阶级，现在对干部，同对付地主阶级不一样，对干部应允许答辩，允许他们讲话，包括陈丕显，曹荻秋。

主席在上海看过电视斗争陈、曹大会，没戴高帽子，没挂牌子，比较文明，主席很满意。

主席还说了，为什么不允许他们讲完呢？人家还没说几句就喊“打倒”，允许人家把话讲完，然后再反驳，真理是在我们手里嘛！

你们提口号要留有余地。动不动就发勒令，“否则就采取革命行动”，例如对付刘、邓。如果他不出中南海怎么办？你们自己毫无余地。

过去我们曾对美国发出一次通牒，没有通过主席，后来主席就批评说：发通牒干什么？不照办怎么办？

最难的是教育革命。

主席在去年七月份就讲学校斗批改要靠同学自己搞。

最近主席要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拿出一些典型经验来。

三

有的头头私心杂念重，根本不顾国家利益，争核心、争名称、名位、名次，不是按照路线比较正确。上海交大“反到底”兵团就是这样争，

主席问我和姚文元：这个大学不是一月风暴不错吗？现在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呢？劝他们不要争了，核心有啥好争的？核心总是在斗争中形成的。

四

提“军内一小撮”是不对的，要去掉它。

五

不能不教而诛，诛就是杀，诛就是杀人。不能不教而处罚人，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嘛！

我看还应该从教育人手，坏人总是少数。

我对现在的右派不那样看死，有坏人是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有的把认识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一提到立场问题就上了纲，一辈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场问题就不能变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立场是能变的，对极少数坏人是不能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教育要包括左、中、右。

我还是倾向于多保一些人，能挽救的还是挽救，只要我们争取了多数，极少数人顽固下去也可以嘛，我们给他饭吃算了。

如果能改，能多争取几个人也好嘛！

开训练班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训比不训好，时间顶多二个月，久了不行。过去黄埔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训练。林彪同志只住了五个月的黄埔嘛。有些军事学校，学的时间越长，学得越糊涂。

要保护，不要使人下不了台，要使人有机会改正错误。

六

文化大革命要触及灵魂。凡是爱整人的人，整来整去，最后都要整到自已头上来，“喷气式”是王光美[2]搞的，王光美是资本家的姑娘。

现在全国到处搞武斗，这翻不了天，让那些人跳出来好嘛。

注释

[1] 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期间，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的这条王明路线，无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在政治、军事以及城市和农村工作中实行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和策略；为了强制推行这条错误路线，在组织上以我为核心，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宗派主义手段，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王明路线使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都遭受十分严重的损失。
博古，即秦邦宪，在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间，担任中共中央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职务，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被撤消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职务。一九三七年先后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三八年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一九四一年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张闻天，即洛甫，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期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军事路线，为会议的成功召开作出了贡献。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他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2] 王光美，刘少奇之妻。

总要给犯错误的人以出路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等同志的谈话。

前一次王力[1]他们解决“百万雄师”，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对“百万雄师”不要整得那么狠，坏的还是少数，广大群众是好的。对独立师也不要去整，干部、战士都是受蒙蔽的。总要给犯错误的人以出路，包括陈再道[2]。不知谁批准的搞“喷气式”、挂牌、戴高帽，红卫兵还引用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那时是对土豪劣绅的。

十八年来没有训练过人武部、军分区、省军区和大军区的干部，责任在我，我是军委的主席嘛。为什么不训练？不出问题还想不起要训练这些干部的问题。小县训练三四百人，中县训练六七百人，大县训练八九百、千把人。时间不要好久，两个月，以后一年训练一次。不但要训练武的，还要训练文的，不仅军队干部要训练，党政干部和红卫兵的头头也要训练。如果红卫兵头头不训练，将来就可能犯错误。

干部要精不要多。干部不要靠从外边来，就在本地找嘛。我不相信原来的军区就没有好人，有错误至少是三七开嘛。人就是要在斗争中锻炼出来，你们这些人不就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吗？湖北省总要找些革命干部，没有省长有部长，没有部长有局长，没有局长有科长。

文化大革命，大概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四个多月。湖北省再搞两个多月差不多了。

全国的问题怎样解决，九大什么时候开，怎么选代表，你们议一下。要开，

我看明年秋季九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开。代表嘛，工、农、兵、学、商都选。左派为主，要有中间派，也要有右派，但不是反革命，没有他们的代表不行。革委会要不要？是不是恢复党政军？邓小平恐怕要保。第一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可不可以选他当中央委员？你们讨论一下，九大谁可当选中央委员，邓小平是一个标兵。张体学行不行？贺龙还行不行？九大的问题，你们研究研究。

现在，要强调一下，下面的干部要多请示报告。我们的答复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比你不报告、各行其是、搞独立王国要好。你报告了，错了是我们的，你们是第二位了。

现在，搞了什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搞那么多官衔干什么？我姓毛，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就行了。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

注释

[1] 王力（1921 年-1996 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曾任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一九六七年八月，由于“抓军内一小撮”问题，他被隔离审查。

[2] 陈再道，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中，因 1967 年 7 月 20 日的“反革命事件”受冲击。1972 年 5 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 年 8 月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接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

努马：我看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人民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

主席：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

努马：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

主席：有那么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教育。

努马：你们的干部很谦虚。

主席：非谦虚不可，否则群众斗他们。

努马：你们的干部与我们的干部有很大的区别。

主席：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官大了，薪水多了，坐小汽车了。大官还得有人做，大官没人做还得了！薪水多一点，房子好一点，坐汽车也可以，但不要摆架子，和工农群众平等相待。不要动不动就训人，骂人。有的大队书记，薪水不多，房子不好，没坐小汽车，官也不大，就是官架子不小。运动一开始，结果把他们吓了一跳。

努马：外国讲中国很乱，我们怎么没看到?

主席：乱一点，你们可以到处走走，乱了以后就不乱了。不闹够就不行。这时候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再乱一年。

努马：什么叫越乱越好呢?

主席：不乱胜负不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除安徽省外都好。到中国得一条经验。湖南煤矿动刀动枪了。生产几万吨下降到几吨，现在已产二

万吨。

努马：这样的矛盾，怎么解决得这么好呢?

主席：后台揪出来了，群众打够了，这时中央讲几句话就行了。有些人吹中国怎么好，不要听那一套，非洲人架子小，所以我们希望你们来。欧洲、亚洲就不行。

努马：我们也开始反官架子。

主席：我不建议你们也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建军四十周年，建国十八年，打了二十二年，拥有打了几十年仗的解放军，所以搞文化大革命。

努马：我们不搞文化大革命，但我们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世界意义。

主席：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改变国家部分机构，包括军队。恩克鲁玛[1]那次来，没有料到推翻他政权的就是他的军队。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去。

努马：我们家里还有人，但我尽量早点回去。

注释

[1] 恩克鲁玛，即弗朗西斯·恩威亚·克瓦米·恩克鲁玛（Francis Nwia Kwame Nkrumah）（1909 年 9 月 21 日—1972 年 4 月 27 日）加纳国父，黑非洲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外交家、国务活动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和非洲社会主义尝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泛非主义、泛非运动和非洲统一主要倡导者，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深受非洲人民尊敬。1957 年领导加纳成为黑非洲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1952 年 3 月 21 日—1957 年 3 月 6 日任黄金海岸总理；1957 年 3 月 6 日—1960 年 7 月 1 日任加纳总理；1960 年 7 月 1 日—1966 年 2 月 24 日任第一任加纳总统。执政期间坚持发展民族经济、支持非洲统一运动，并且施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各项政策，受到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动派的敌视。1966 年 2 月 24 日，恩克鲁玛在访问越南后顺道访华。当天，加纳国内发生了军警头目约瑟夫·亚瑟·安克拉和阿克瓦斯·阿曼卡瓦·阿弗里法推翻恩克鲁玛政府的军事政变。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要点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

*这是“两报一刊”编辑部纪念十月革命 50 周年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一系列重要论断的集中概括。

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促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团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份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份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台，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

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谈话。

今天还是谈九大和整党问题。

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可否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

各地对整党问题，有些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

不少地方的意见还没有反映上来，因为那里还乱着。

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

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

过去，一是听话（做驯服工具），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一个支部书记说了就算，什么事情都不同大家研究，不商量，不向大家征求意见。支部作决议是要征求党员意见的，一次不够，再征求，要让党员讲意见，征求一次不够再征求。但是过去有很多地方不是这样，是个死党，一塘死水。

过去青年人入团可困难啦，比入党更困难。党团组织被一些人把持着。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支部书记就象个皇帝。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书记[1]就是这样，他把持全大队的党、政、财大权，搞贪污，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只有沙石峪是这样？我就不信。

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遇事不先征求人

家意见，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陈老总[2]就喜欢拿自己多少年的经验包括反对我的经验，去训人。

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有些人二三十岁，年岁不大，暮气却很大，到处住休养所，小病大养，无病也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一冲，病没有了，坐喷气式飞机，反而治好了他的病。现在到医院去的很少了，起了很大的变化。才不要都听医生的话，我多少年没量血压了，前几天发烧三十八度五，医生要听心脏，我不让听，吃两片药就好了。当然，有的人是真有病，如心脏病，要治。

我把李大夫放下去支工，可有点意思。他们到北京针织厂。去的时候我就交代了几条，一是先做调查研究，当群众的小学生；二是不轻易表态；三是推动工人群众在革命原则基础上实行大联合。跑到一个地方就哇剌、哇剌干什么？那个厂有两派，斗得很厉害，开始两派都说他们搞阴谋，但他们顶住了，一直做调查研究。后来我说了几句话，就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救了他们，否则，人家要赶他们走。现在两派联合起来了。那个厂一个派一千二百多人，一派八百多人。八百人的一派说一千二百人的那派保得厉害。两派争位置，结果人多的一派采取高姿态，问题反而解决了，一派六个，一派七个，无派的出二人，共十五个人组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还有一些人去化工厂，这个厂比较复杂、知识分子多，去的人被围攻。人家出了一条标语，我们去的人乱加评论，讲错了话，结果被人家抓住了。

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张本[3]这个人，谁知道她历史有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搞出了很多问题，当然一次搞不干净，但搞出了不少。

我赞成康生同志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表观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很宽了。

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

怎样整党，你们拟出几条办法，也是征询意见性质，十一月能够发下去，十二月再发一指示。

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说要恢复组织生活，他们又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这样的人都不要，就太多了，但要做检讨。有的人，不想当党员，就算了嘛。接受新党员，要经过群众议一下。

党纲要修改。我在看联共党史，他们建党，建了几次。也不要象联共的党纲，写得太长。从政治经济学、商品二重性一直到剩余价值，写得很长，烦琐得很。我们党纲不要写得太长，长了看的人就很少。党纲写成一本书，工人怎么看？农民怎么看？横直是废话，会一散，就完了。我们的党纲，就是党章上开头的那个总纲。

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组织纪律性要有条件，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做陈独秀、瞿秋白的驯服工具就是不行。八七会议我们反陈独秀时，就没有做陈独秀的驯服工具。

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不行。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就讲了三个前提。如果你是革命的，政治路线正确，人家自然就会服从。打了胜仗以后，战士都高兴，对领导上不讲闲话，打了败仗，闲话就多。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最好，打锦州的时候，那么多苹果一个没动，这纪律就是建立在为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解放军战士也有个别犯纪律的，不是绝对的。

现在报上都讲好的，内部情况报导困难多，才不要相信。我就不相信天下都黑了。

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经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4]，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5]，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两件事：

关于九大，第一批反映材料综合一下，通报下去。

关于整党，整个什么样的党，老党员怎样一分为二，新党员入党，恢复组织生活又不要恢复老样子，这些问题怎么办，搞几条办法出来。

废除级别问题，也要谈一谈。

注释

[1] 沙石峪位于中国河北省遵化市东南部，张贵顺，一九一四年生于遵化娘娘庄，后落户到沙石峪。一九四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沙石峪村党支部书记近二十年，领导沙石峪人民取得了很大的建设成就。可他逐渐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胜利使他冲昏了头脑，一九六六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整个沙石峪只有他的两个孩子上大学。此外，他还有很多特权、腐化的行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被解除了书记职务。

[2] 陈老总，指陈毅。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前委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由“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解决当时存在的“是否取消军委”争论，毛泽东明确反对取消军委，会上，陈毅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后在实践中认识到错误，向

党中央汇报工作后，当年十月份，三次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担任前委书记。

[3] 张本，原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主任。《科研批判》一九六八年四、五期合刊发表国家科委齐向红《同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场殊死搏斗——彻底清算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张本的滔天罪行》，历数张本的反革命罪状。

[4] 十条，指前十条。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5] 后十条，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大树特树”的说法不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庆祝毛泽东同志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问题向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报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写的批语。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湖南的集会[1]应另择日期。

（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2]。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七日

注释

[1] 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庆祝毛泽东同志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问题向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报周恩来同志的请示报告上说：“为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省革筹小组经研究，同意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举行隆重庆祝活动”。

[2] 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这个请示报告上说：“关于大会名称，有两种意见。（1）大会名称为毛主席塑像落成及韶山铁路通车典礼大会。（2）大会名称为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大会。会上举行塑像落成及通车典礼。我们考虑，为了尊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不祝寿的教导，认为第一种意见为好。”

给阮友寿主席的贺电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阮友寿[1]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时候，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战斗中的越南南方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你们打得好！你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世界上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打得走投无路，狼狈不堪，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向你们致敬。

你们的胜利又一次表明，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越南人民在伟大领袖胡志明[2]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抗美救国战争，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的日子不长了。但是，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他们必然要采取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种种手段，来挽救自己的灭亡。而革命人民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也必然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革命人民的前进。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深信，越南人民坚持持久战争，一定能够把美国侵略者从越南赶出去。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我们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休戚与共的兄弟。兄弟的越南南方人民和全体越南人民可以相信，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

后方。在我们两国人民坚强的战斗团结面前，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毛 泽 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注释

[1] 阮友寿，当时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2]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一九六八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1]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

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我在一九六三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2]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

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注释

[1] 马丁·路德·金，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非暴力主义者。曾获一九六四年诺贝尔和平奖。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遭种族主义分子枪杀，由此触发美国一百多个城市的黑人抗暴斗争。

[2] 即《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见本书第六卷（润之赤旗版）。

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一

毛泽东：（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1]走进接见会场，毛主席站起来同他们一一握手）都是一些年轻人！

江青：好久不见了。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泽东：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有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蒯大富怎么没来，是出不来，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恐怕是不肯来。

韩爱晶：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泽东：蒯大富要抓黑手[2]，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大学武斗怎么解决？你们去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工人学生这么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搞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北大）井冈山”？[3]

聂元梓：我们在门口摆开水供给……

温玉成、黄作珍：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是与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

毛泽东：你们没跟他们打？

聂元梓：互相打了。

毛泽东：北大抓黑手，这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富治：不到三万人。

毛泽东：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得多数学生的赞成。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个括弧，新北大（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布）。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你们学校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公社”，老佛爷（聂元梓的外号）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那几个反对谢富治的跑了。

谢富治：他的二把手聂树人[4]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泽东：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那是他们挑拨关系。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

生硬一些。

毛泽东：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过来，到我这里来。

林彪：来嘛！

谢富治：去！去！（王大宾坐到毛身旁）

毛泽东：坐下，坐下。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他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黑帮，画了像。“新北大公社”搞了几十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么点黑帮。就是关键在于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现在不搞斗、批、改，就搞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有时三百人，有时候一百五十人，哪像林彪、黄永胜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是三万多。

林彪：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泽东：天下大事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梳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在学校里读了十几年书，大家都同意你下放，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代替你呢?

谭厚兰：都安排好了。

毛泽东：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的反对派“井冈山”）、“四·一四”（蒯大富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反对派“四·一四”组织）、“兵团”（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井冈山公社”的反对派“造反兵团”）就会对我们

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5]，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你抓他干什么？把他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会说没有言论自由了嘛。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办法，按着辩证法，不要住在一个城里，就一分为二，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北大）“井冈山”搬到南方，一个南，一个北，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清理自己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老巢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人家说了，不是有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明明知道是他也不要说了。不过你以后要注意一点，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

江青：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没有。

毛泽东：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那个娘家就是不好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姐姐不好是姐姐嘛，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有人报告找不到蒯大富）蒯大富是不愿来，还是来不了？

谢富治：广播了，点名中说中央文革要找，请蒯大富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江青：是他不肯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我估计有人控制他。

姚文元：有可能。

毛泽东：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人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没有。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与保守派干了一架，是伯达同志派人救了我们，以后我们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不要打架。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韩爱晶：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文元：我才不信呢? 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康生：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泽东：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韩爱晶：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边比较复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数极少了，武斗这批人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泽东：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北师大“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6]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7]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你（指韩爱晶）、蒯大富都有份。

韩爱晶：我也参加了。

江青：那是韩爱晶去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泽东：你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年青人就是要作些好事，也会作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文革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总理在三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七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讲了话，可是下

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两方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啥，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败家子。

毛泽东：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神通，调起兵来也只有那么两三百，你的兵跑那里去了？还得依靠工人、复员军人作主力，没有那个你还不行，林彪同志兵多，给你几千几万，可把“（北大）井冈山”通通消灭嘛。这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泽东：一分为二，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两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空的，中南海地方很大，可容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聂元梓来，或者侯汉清来。你们不是叫“杀牛宰猴炖羊肉”嘛？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人都是聂的反对派北大“井冈山”负责人）。这三个人我只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年青人嘛！还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指《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杨克明还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这么打起来？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不行再延长一年、二年、三年。我说，如果不行，要多长时候给多长时候，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两年、四年、八年的，你还不是在哪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个办法，谭厚兰不是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

呢？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七二一指示”）是留有余地的，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都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我不是哲学家。

毛泽东：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泽东：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上海的胡万春[8]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周恩来：还有高玉宝[9]，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就僵化了。

毛泽东：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泽东：你不要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

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我读中学读了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没有中学文凭，就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泽东：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第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第四期起加长了。

毛泽东：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不那么多，实际学习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几天就一目了然，百闻不如一见。

毛泽东：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是看过的。

二

毛泽东：我为啥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今天找你们来谈这事，使你们有准备啊！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搞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天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找蒯大富也不算数，一定要让中央直接表态。除了开始管一下，后来事多，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谢富治来管嘛。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当官僚了。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昨天我开车子，我说去看看大字报，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

啊？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毛泽东：群众就是不要打内战。

林彪：你们脱离了工农兵。

毛泽东：有人讲，广西布告[10]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11]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泽东：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三

（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蒯大富进来就大哭。毛站起来上前握手，江青笑了。）

蒯大富（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12]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韩爱晶（流泪）：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泽东（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嗯嗯地哭。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毛泽东（对黄作珍）：你叫黄作珍，那里人？

黄作珍：江西宁都人。

毛泽东：老表嘛，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同志讲话也不算数，市革委会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姚文元：伸出红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都紧跟。

毛泽东：四个办法，是哪四种？

姚文元：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要打大打。

毛泽东：一是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几个月？

周恩来：去年开始。

毛泽东：第四再大打，打它一万人。工人撤出来，把枪还给你们大打，像四川一样。

江青：败家子。

毛泽东：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再不听的，个别的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反革命嘛！

江青：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你们也不想一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说关心

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做做工作。

毛泽东：他们忙啊！

周恩来：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泽东：不要分派了。

江青：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13]，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泽东：不要搞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泽东：教育革命搞不上去，我们也搞不上去，何况你们。这是旧制度害了你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的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是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现在我们来管这些事情，我看不公道，打一点内战无关紧要嘛，所以四条中有一条要打就大打。

姚文元：我倾向有些学校斗批散，斗批走。

毛泽东：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历史，写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教授，北大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

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泽东：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在北大图书馆读了半年。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大学不要办得那么死，这个大学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现在是搞武斗。

毛泽东：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对武斗要作全面分析，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不要大学生啦，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的有时还听我们一些，有的听，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们也搞不清。

毛泽东：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去干涉，无产阶级去干涉。

（聂元梓要求派解放军去北大）

毛泽东：你要合你胃口的，一定要六十三军，别的你又不要。三十八军可以不可以？如果“（北大）井冈山”三十八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六十三军。你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

江青：聂元梓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你们欢迎三十八军行不行？

毛泽东：去一半三十八军，一半六十三军。三十八军不像你们讲得那么坏，根子在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会就比较好，郑维山[14]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的炮位一直是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么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的。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

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是坏，把将军们都吓坏了。他找你（指谭厚兰）的麻烦没有?

谭厚兰：没有，同学对他有意见。

毛泽东：过去是有历史原因，有点历史，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六六年上半年比较好，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搞革命风暴是对的。现在脑子膨胀了，自以为了不得，想要统一天下。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

毛泽东：二十几岁嘛，不能轻视年青人。周瑜出身起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江青：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泽东：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全闹浮肿病。

陈伯达：你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对中央意见没有好好考虑、思索，凭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第一，要走到危险道路上去。

毛泽东：第一条是我官僚主义，一次未见你们。人家不要抓黑手，我还不会找你们哩。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彪：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泽东：不要说承认错误。

陈伯达：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泽东：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主席早就讲，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蒯大富，我们对你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的，你说你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确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要赶上去，你们没有看到运动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

毛泽东：谭厚兰那里对立面只有二百多人，一年还不能压服。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了，怎么能征服呢？曹操用武力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要用武力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失了街亭，司马懿要征服诸葛亮也不成，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郃只剩了个马。

林彪：打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多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开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主观上要革命，但客观上行动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你们脱离群众。

毛泽东：工农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比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清华二万人，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人。

林彪：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泽东：他们也是上了老虎的背，想下也没个好办法下。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当官作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富治：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

康生：清华的枪是北航给的，支持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爱晶：没那回事，根本没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里去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支不少。

谢富治：就都是你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都不接受，你毫无自我批评。

陈伯达：是否把他的枪给收回来?

韩爱晶：主席，我有一个要求，给我派一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是很爱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很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与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了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都清楚了。

陈伯达：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你比我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毛泽东：不要老是批评。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多中心。都是中心就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

江青：韩爱晶，我批评了你好几次，你就一直没给很好表个态。

毛泽东：不要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

江青：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毛泽东：年青人听不得批评，他的性格有点像我年青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

江青：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蒯报告，“（清华）井冈山”总部陈育延是女同学，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陈育延是个女孩子，要保护。

蒯大富：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泽东：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你毫无办法。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家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工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拒绝，打死打伤工人。正像北大一样，我们倾向聂元梓一样，偏向你们五大领袖，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清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四·一四”思想不对嘛，“（北大）井冈山”、“红旗飘”中坏人多一些，聂元梓一派好人多一些。

聂元梓：王、关、戚[15]插了一手。

毛泽东：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搞串连，我也禁止不了。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认为“（清华）井冈山”要垮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你的老佛爷的“（北大）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革命的井冈山！

江青：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泽东：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周恩来：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人呢?

蒯大富：有。

毛泽东：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周恩来：韩爱晶，你能帮他想点办法。

毛泽东：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吴德：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毛泽东：“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清华）井冈山”很蠢，很被动。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

江青：“四·一四”是骂我的。

毛泽东：他们抬尸游行，他们搞砸电缆。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知道，为什么他们欢迎? 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四·一四”的负责人）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还是不行的。

毛泽东：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 “（清华）井冈山”二人，“四·一四”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大富：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泽东：还是要联合，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清华）井冈山”两个。“四·一四”是右倾的。

江青：现在你们五个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

毛泽东：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斗批走，这就是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当然打内战是几个月。第四把工人撤出来，把枪都还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

谭爱晶：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泽东：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但大学没有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鸡飞狗跳的。

江青：改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泽东：学问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搂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

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读那些厚本本，几十种。而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书都成了参考资料，辅助材料，他们老师的书才是正式教材。

毛泽东：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哩！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谢富治同志，把他们（学生）统统都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清华）井冈山”反而在外面，这样不好，“（清华）井冈山”统统到人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韩爱晶：主席，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几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中国打起内战来，你也说是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剧混战的局面，怎么办？

毛泽东：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什么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16]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17]，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的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

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恩来：我的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送到卫戍区去了。

毛泽东：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嘛。

毛泽东：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韩爱晶过去就是提过这个问题，有林彪同志这个毛主席的好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我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泽东：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姚文元：这个问题，主席已经讲过了。

周恩来：林彪同志主席著作学得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著作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泽东：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 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 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江青：韩爱晶给我写几次信，讲这个问题，韩爱晶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一是脱离工农，二是脱离实际。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泽东：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我们有几种死法，一是炸弹炸死，二是病死，被细菌钻死，三是被火车、飞机砸死，四是我又爱游泳，被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是寿终正寝，还是细菌么！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18]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韩爱晶：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泽东：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前进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韩爱晶（握着主席手）：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毛泽东（走了又返回来对中央领导）：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注释

[1] 接见红代会五大领袖，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在人大会堂湖南厅，毛泽东接见了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五大领袖”，指清华的蒯大富、北大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历时五个多小时。陪同接见的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副主任吴德。

[2] 一九六八年夏季，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全面夺权的任务基本完成，北京几所大学的两派武斗却战火不断。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北京数万名工人组成了“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首都各大专院校；然而进驻遇到阻力。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当数千名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北清大学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制止武斗时，在北清大学遭到了顽强的武装抵抗。特别是在北清东校，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用长矛枪支和手榴弹袭击了工宣队，死五人，伤数百人，他们在高音喇叭里呼喊的口号是：“打倒镇压学生运动的黑后台！”“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

[3] 北大当时有两个相互对立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一个是指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另一个是“井冈山兵团”，负责人是牛辉林、侯汉清、杨克明。

[4] 北京地质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东方红公社”负责人是王大宾、聂树人等。

[5] 周泉缨，清华大学当时有两个相互对立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蒯大富、鲍长康领导的“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另一个就是沈如槐等领导的“四・一四”组织，简称“四派”，周泉缨是“四派”的理论家，曾写出《“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大字报。井岗山兵团的天安门纵队在清华《井岗山》报上发表《谁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和他拼命——评〈四一四思潮必胜〉》。

[6] “省无联”正确全称是“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是其简称，只是个省会组织，不是全省组织，它只是部分群众造反组织的一个派系联席会议式的松散集合，而其对参入者并无任何约束力。

[7]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在蒯大富、韩爱晶的支持和参与下，北师大谭厚兰的反对派“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头头们趁开大会之机，搞突然袭击，把谭厚兰反剪双手押上了主席台，批斗了谭厚兰，并宣布夺权。这就是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北师大革委会事件，又称“九・七事件”。事后，蒯大富、韩爱晶等人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并被迫向谭厚兰道了歉。

[8] 胡万春，一九二九年生于上海一个贫苦工人家庭。从小失学，十三岁当童工，十七岁进上海钢铁厂当工人。建国后，曾先后担任过工厂工会委员、副主席，党宣传部长，上海市第三、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和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等。一九五二年开始创

作，一九五五年发表短篇小说《青春》，描述青年男女的新型恋爱关系。一九五六年写了自传体小说《骨肉》，描述旧社会一个工人家庭家破人亡，骨肉分离的悲惨遭遇，受到好评，并在一九五七年世界青年联欢节举办的国际文艺竞赛中获荣誉奖状。在当时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他的作品洋溢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9] 高玉宝，一九二七年生于辽宁瓦房店。八岁上小学一个月，九岁当童工，十五岁当劳工，十七岁学木匠，一九四七年参加解放军，一九五四年他才上学读书，一九六二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任文艺干事，师职创作员，辽宁省民间文学协会理事，深阳军区创作室名誉主任，短篇小说《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曾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著有长篇小说《高玉宝》，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长篇小说《高玉宝》在国内用七种民族文字出版，并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用十五种外文翻译出版，仅汉文出版的就达四百五十多万册，并被改编为二十四种连环画，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战士作家”。

[10] 广西布告，即“七・三”布告，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布告。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11] 陕西布告，即“七・二四”布告，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布告。主要是严厉制止日益蔓延的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和大规模武斗。

[12] 杨余傅，杨，指杨成武，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指余立金，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傅，指傅崇碧，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北京军区等单位团以上干部一万多人。林彪代表中央宣布重要决定，“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13] “天派”“地派”，文革时有名的红卫兵的组织是北京“天派”和“地派”。与其他一些有两大派对立组织的地区的情况不同，它的所谓“派”，并不存在一个实在的、具体的常设组织，严格说来，它只是一个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组织不很紧密的联合体。“天派”和“地派”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所完成的，它是在一系列派性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北京高校“天派”和“地派”的说法逐渐开始流行。所谓“天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主要领导人为韩爱晶。是和天有关的，所以称为“天派”；所谓“地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就取它的“地”字，称为“地派”，天地相对，用“天派”、“地派”来称呼北京对立的两大派很形象，也很通俗，于是很快就流行开了。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是“天派”的，对立派“北大井冈山”是“地派”的；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是“天派”的，对立派沈如槐“四・一四兵团”是“地派”的；北师大谭厚兰的“井冈山公社”是“地派”的，对立派王

颂平的“造反兵团”是“天派”的。“五大领袖中”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是“天派”的，谭厚兰、王大宾是“地派”的。

[14] 郑维山，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15] 王、关、戚，指的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一九六六年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曾为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成为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受林彪委托兼管《解放军报》，而戚本禹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系统造反派发表讲话（即著名的“王八七讲话”），一些极左分子受到王力讲话的蛊惑，一度夺取了外交大权。八月二十二日，在外交部造反派的策划组织下，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导致了文革期间最严重的外交事件。另外，王力、关锋在当年当期的《红旗》杂志上，组织发表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与“有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十二日，毛泽东看后写了“大毒草”三个字！批示：“还我长城！”，二十四日，毛泽东在王力“八七”讲话稿上写上了：“大大大毒草”，二十六日，毛泽东指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一月，对戚本禹也做了同样处理。

[16] 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早期负责人，其女朋友是叶剑英之女叶向真，曾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组织人将彭真从家中抓走批斗，把彭德怀从成都抓到北京，六七年初，朱成昭当副局长的父亲在上海也被打成了黑帮，思想开始保皇，反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二月四日，公开炮打中央文革，由王大宾接任“东方红公社”的一把手。一九六七年七月，朱成昭和叶向真准备偷渡香港，被周总理派人抓回，八月二十日，朱成昭和叶向真被公安部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名正式逮捕。

[17] “保爹保妈”，文革中的红卫兵分为“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老红卫兵”活跃在文革初期，即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七年初，不到半年时间，以“红五类”子弟（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学生）为基本队伍，以高干军干子女为头目的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如北京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由原北京东城、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等组成，简称“联动”），宣扬“血统论”，公开声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的目标就是保住自己父母的权力，保省委保市委，充当了文革期间首批保守派。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中，“造反派红卫兵”登上历史舞台，其组织构成已不注重家庭成份，其领导层也大多是平民子弟，开始“造”省委市委及学校党委的“反”，击败并瓦解了“老红卫兵”，并讥讽“老红卫兵”是“保爹保妈”。

[18] 抢救刘少奇，指一九六八年七月中旬，刘少奇病危，经过十多天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四名医生是指陶桓乐、黄宛、董长城、顾英奇，两名护士指李留壮和马小先。

在修改《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时所加的话

（一九六八年八月）

一

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二

这个“独立王国”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三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四

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

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准备发表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

此件[1]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送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调查报告，现在本刊发表。我们请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予以注意，对你们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给以调查，陆续送给中央，我们将择要予以发表。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同时，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要加以鼓励，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对于这种人，也要从教育入手，以期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八年九月　日

注释

[1]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送审的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

注意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所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

红旗杂志编者按：

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赤脚医生就是好

——论医学教育革命

（一九六八年九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批示。

一

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1]

二

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2]

三

“赤脚医生”就是好。

注释

[1] 调查报告中写道：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有一名从城市里来的医专毕业生，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编写了大量的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了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广泛的“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他们自学的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在这段文字后面，毛泽东同志加写了这段话。

[2] 调查报告中写道：另一位医专毕业生，“死读书五年，一副近视眼镜从三百度升到了六百二十五度。参加工作四年了，但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在这段文字后面，毛泽东同志加写了这句话。

对霍查、谢胡电贺我国二十九个省、市、区成立革委会的复电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我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你们热情洋溢的贺电，这是对正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中国人民的巨大鼓舞和巨大支持。我们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最大的敬意。

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正在开展一场具有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意义的革命化运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今年，恩维尔·霍查同志提出的教育革命和工人阶级监督，丰富了这个运动的内容，推动了这个运动的发展。我们最热烈地祝贺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取得越来越辉煌的胜利。这一胜利使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发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前几天，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庄严地宣布退出华沙条约[1]的决定和法令。这是对苏修叛徒集团的又一沉重打击，是对东欧各国人民反对苏修叛徒集团斗争的巨大鼓舞。

华沙条约早已成为赫鲁晓夫[2]修正主义集团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控制和掠夺东欧各国人民的工具，早已成为苏修叛徒集团用来同美帝国主义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３]作交易、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工具。最近，苏修叛徒集团纠集波兰、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修正主义伙伴，公然利用华沙条约的名义，武装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这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彻底暴露了这个条约的侵略性和反动性。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集团，对侵略者采取了卖国投降的政策，可耻地背叛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其杰出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对苏修叛徒集团利用华沙条约从事的种种罪恶活动，久已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十分钦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在这一斗争中所表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度原则性。

我们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退出华沙条约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东欧各国人民反对苏修控制的华沙条约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西欧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以及其他侵略性条约组织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受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奴役和威胁的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阿两国人民在革命的暴风雨中建立起来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友谊，是经受得住严峻考验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得更加坚强的七亿中国人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将始终如一地站在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一边。如果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及其走狗胆敢动阿尔巴尼亚一根毫毛，等着他们的只能是彻底的、可耻的、无可挽回的失败。

亲爱的同志们，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

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让我们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在反对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和紧随美帝、苏修的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携手前进吧！

伟大的、牢不可破的中阿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于北京

注释

[1] 华沙条约，指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八国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在华沙签订的条约，同年六月四日起生效，有效期二十年。条约宣称将致力于“国际和平和安全”，并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条约生效时，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以华沙条约组织名义，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同年九月，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2]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3] 北大西洋公约，指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丹麦、加拿大、冰岛、意大利、葡萄牙十二国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在华盛顿签订的条约，同年八月二十四日起生效。希腊、土耳其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后来相继加入。一九四九年八月，根据公约规定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权力机构为部长理事会，最高军事机构为防务计划委员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设有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大西洋盟军最高司令部等，还设有核防御军务委员会和核计划小组等辅助机构。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十月）

开幕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

会议大概开七天到十天，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形势问题：一个国内，一个国际。国内要总结上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两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两种意见，一是不错，基本上是正确的；二是也有人说，不见得。十一中全会时我就说过，我在十月工作会议上，也打过招呼：不要认为会议通过了都能执行，在会上举手是一回事，真正闹意见是另外一回事。后来证明还是不理解，有的人出了问题。

有一位同志叫张鼎丞[1]也没有发现有叛徒、特务、反革命问题，为什么没有来开会？是什么原因？邓老[2]你是很熟悉的。（周恩来：大连会议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徐海东他们四个人，徐海东同高岗抱头痛哭，说中央亏待了他，没有他在陕北打胜仗，中央就站不住脚，这正是公布高岗当付主席的时候，他同高岗联盟有勾搭，值得审查。）

山东谭启龙[3]，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错误。山东不谅解他，现在还不能解决问题。山东要揪他回去斗，我们不让。（周恩来：揪回去了，现在在济南。）山东的同志要作说服工作。

湖北张体学[4]，是好同志犯了错误。回湖北检讨得好，群众就谅解了。群众都欢迎他。他还要检讨，群众说不要再检讨了。

王任重[5]是内奸，国民党。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

湖南王延春[6]，这个人不行了。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

就是发现他在七军开小差那回事。（张云逸：他在红七军当政委时，情况紧张了，他藉口到中央去汇报工作，在崇义地方开了小差，叶季壮同志死前也揭发过此事。）主要问题还是到北京后搞独立王国，他不服气，他说他不揽权，实际上他是刘少奇那个司令部里摇鹅毛扇子的。但是有时我还找他说几句话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是打敌人的。又没有查出来他历史上投敌叛变自首这一类问题。这个人一个是错误不小，一个是自己写了个自传检讨[7]，可以给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开除党籍，最好还是找点工作。一说工作，许多同志摇头。很大的工作也很难作了，我说给点室内整理材料之类的工作还可以吧！

江华这个人，我是保过他的，许世友同志，你也是保过他的。霍世廉揭出他的问题，看样子不能保了，你还保吗？（许世友：主席说不能保，就不保了。）

有些事我看我们工作没做好。比如徐海问题，那里一个南京，一个济南，不怪两个军区，就是我们没作工作。现在办学习班，就好转了嘛。军队内部分成两派，野战军也分成两派。有几千人跑到南京，几千人跑到济南。要把人叫回来。（许世友：我有错误，没听主席的话。）

军队是可以讲清楚的。军队两派也好，三派也好，抓紧了就好解决。比如广西吧，也是两派。野战军地方军有两派。工作做好了，军队也就合作了。军队统一了，什么“4．22"也好，“联指”也好，军队问题解决了，群众问题很好解决。

我们出布告“7．3"、“7．24"布告。这是一个发明。过去也搞过十条、八条，也不在群众中宣传，群众也不知道。你不宣传，群众也不懂得。你怪谁呀?也不办训练班，办训练班是从内蒙古开始的。内蒙两派那么对立，来北京办训练班，一个月就解决了问题。

同志们经验很多。可以设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还是不要搞?

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议议。比如浙江问题，“红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也是一个工作问题。

徐海的“支派”，北跑济南，南跑南京上海，踢派搞一党政权。徐州一个“支派”一个“踢派”，还是军队不一致，两边都是共产党，共产党与共产党打架。可以作工作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福建问题很大。韩先楚[8]你那里不是天下大乱吗？（韩先楚：现在形势很好。）看到了。你们的报告很好。工作一做，还不是解决了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怎么不能解决呢?

中央各部门，地方有二十九个单位，地方是徐州、保定、重庆，还有些问题，还得解决一下。

四川可打得厉害，双方都是几万人，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谁叫你搞“二月逆流”，一抓就是十万人？中国人多得很，四川也不少。你抓错放了就是了。你说问题不得解决吗？不是都放了吗？（张国华：还剩五百人，都是坏人。）你放了九万九千五百嘛，还不是自己搞错了，放了就是了。

要总结经验。过去南征北战，解放战争好打。秋风扫落叶，一扫三年半扫完了。那时候敌人是比较清楚的。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困难多，仗不好打。文化革命总比过去快一点。过去打了 22 年，从 1927 年到 1949 年，文化革命只打了两年半。

问题就是有思想错误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下搞不清楚。只好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比如辽宁省三大派[9]，打了八个月，天下大乱。不是解决了吗?还是能够清楚的。

自己要多负担些责任，使下面轻一点。主要是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内

部也夹一些敌人，是少数，是做好工作的问题。

比如，浙江省的“红暴”派，说来北京观礼的人数少，自己跑来21人。“省联总”要把他们抓起来，用绳子捆回去。清华工宣队做了工作，这次工作做好了，双方做了自我批评，不争了。（周恩来：看了放焰火，都高兴地回去了。）浙江两派也是工作问题，不是别的。

你们把九大的问题先谈谈，在尾巴上另外再谈谈这方面问题。还有一个多中心论的问题。这是从总参谋部杨成武那里开始的，搞了一个“大树特树”，其实就是树他。

后来，北京学校都分成两派，都有武装，谁的话也不听。一个学校只能有一派，有两派的就多了一个。还不是多中心？工厂也分成两派，北京有例子，很多。

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一百二十万工人，掌握了局势。北京八十万工人，现在才掌握了形势，办法就是工人开进学校去。那里知识分子成堆。要掺砂子。他们是粘土板结了，不透气，不长庄稼。

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9．16"炮轰聂荣臻。这个机关里谁办的？七机部也难办，听说有十万人，就有七万人是大学生。国防科委“9．16"他们炮轰你，还是很客气的。还得开工人宣传队进去。有些地方，就用这个办法，开宣传队进去。

就讲这么一点。国际问题，以后有时间再讲。（向林彪）你讲一讲。

（林彪：主席讲得很多，总理讲得很多，我没有什么讲的。）

肖克[10]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回家成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

哪个是李德生[11]？你们安徽的事件办得不错，你们整芜湖整的不错嘛！

（李德生：是主席批的“七・三”布告起了作用，是舆论造得好。）

就是要造舆论。好像一个发明，搞了几十年，不懂得造舆论。搞了几十年，就是造舆论嘛。不然那里能搞起八路军、新四军？没有群众，哪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群众，没有军队，谁收你这个党？

现在到处分派，有“8．15"、“反到底”、“支派”、“踢派”。清华有“井冈山”、“4．14"；七机部有“9．15"、“9．16"。到处都有这些事情，我们开始也没有想到。南京三派，后来又冒出一个“红总”，势力那么大。

十一中全会讲，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他们就要武斗，不要文斗。一个学校两派斗，各有武器，一个工厂两派斗，两个中心，一个部也是两派斗。

基本群众还是工农兵，兵也是工农。然后才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缺点是容易动摇，主要是没有和工农兵结合。

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可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两年不办，天塌不下来。以后重新搞，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

军事院校，谁知道办了一百一十个，“1．1．1"。其中确实有“妖”。只怪我们自己，办那么多干什么呀？又没人管，叶剑英你不是管吗？搞四清不行，还是统统开进工人，开进解放军去。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到底呢？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厂不整，你们看，不搞文化大革命怎么得了？比如北京一个木材厂，有那么千把人，是两个资本家合起来的。有的厂三朝元老，有的四朝元老。还有新华印刷厂，北洋军阀时期它给印票子，日本来了给日本人印报纸传单。国民党接管的，共产党来了也吃得开，它都吃得开，有一部分三开、四开干部，其中有的是隐藏的反革命。我们的人也不得力，思想状态、精神状况也不好。隐藏的反革命不清理一下，工厂究竟是谁的呀?

按说农村要好一些，也有问题。没有搞好的公社、大队，要好好抓一下。靠人民解放军、省地县革命委员会。有一个省组织了一百万人的宣传队，解放军只有几万，百分之九十是贫下中农。就是广东。江西也不错。江西是个中等省，两千二百万人，有的地方人太多，省级机关就七千人，至少要减六千人，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还是下放农村为主，工厂不能容纳好些人。

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大家有什么意见？有意见就发表。我没有什么话说了，林总都讲了，同志们讲了很多。这次会议我看开得可以，开得很好嘛。是否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不了解，经过十八天比以前了解了。过去高级干部也不清楚，我们没有透风。过去各省来解决问题，也没有工夫来讲这些事情。在这次会上有犯错误的同志说明问题，同志们质问他答复。质问再答复，比较清楚了。这件事要说小嘛，也不算小，要说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嘛，总是要讲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付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党的生活也是允许的，是公开讲的。两个大闹就是公开讲的嘛。有些细节，过去我也不太清楚。如来往多少次，有过什么交往，不要过分注意这

些，不要把党内生活引到细微末节。不注意大问题就不好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你说天就塌下来？！地球就不转了？！照样转，还能不转吗？！我倒是佩服邓老，一直顶住。要是我，就不理，结果你还是搞出一篇自我批评。他早就有自我批评了，比如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有自我批评了，有些老同志将来是否可以要工作，打倒的谭启龙、江渭清[12]，过几年以后，大家气消了，也可以做点工作嘛。不作主要工作，还有些同志，身强力壮，将来总得给点事做吧！邓华[13]来了吧？（邓站起来）好久不见了。在四川几年没有人说他不好，不晓得红卫兵又把他关起来了，你这个人跟彭德怀犯了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在北京的有黄克诚、谭政[14]。犯错误的人，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给他时间，直至多少年。因为群众还要看他的表现嘛。

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要稳、准、狠嘛？稳，有右的，稳就不稳了。狠就可以搞得很“左”，就搞过了火。重点就是“准”字。否则，不准，稳也稳不了，狠也狠不起来。要调查研究，要注重证据，不要搞挂黑牌子、喷气式，不要打人。我在 1927 年写了湖南一篇文章，对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其实几十年都不搞了。红卫兵就按那个办法逐步升级，挂黑牌子，搞喷气式，还有各种各样的。对特务、汉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调查研究，注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戴高帽子、搞喷气式那一套。这样结果并不好。在北京有杜聿明、王耀武[15]嘛。过去对敌人俘虏也不搞这一套。有些死不悔改的人，你整他，他也不悔改。冯友兰[16]你不叫他搞唯心主义一套，我看也难。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水每月只给 24 元，最多的给 40 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用处不多

了。还有吴晗，可能还有某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一问他们。在坐的范老[17]，也是搞帝王将相，郭老[18]也算一个吧。那时没有别的书看嘛，都是二十四史之类的。要反帝王将相，还要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不然人家问你答不出来。我可不是劝你们在坐的人去搞帝王将相。你们还是按总理讲的，按那几个文件去搞。我也不赞成青年学生去搞。少数人去搞。比如范老，你不搞，帝王将相不就绝种了？不是要再出帝王将相，而是历史要人去研究。

清理阶级队伍，对这些人你们要注意，有好的，中间的，极右的三种。我说的对右的，应当如何对待他们。世界上总有左中右。没有右，你左从哪里来呀?没有那么绝。统统是左派，我不赞成。哪有的事？那样纯也不见得。我们的党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看比较纯了。从来没有这样搞过。但太纯了也不太好。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参加就是缺点。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各地把他们选作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派嘛。你对九大代表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不那么符合,可以协商嘛。有少数人参加有好处。

现在情况同两年前十一中全会时不同了，很大的不同了。运动还没有完，就是九大开过了，运动也不见得马上就完。因为这涉及到每个工厂、每个学校、机关。我今天就讲这么一点。

（在别人讲了几句之后又讲：）

注意政策，注意稳准狠中的准字。总还有一些不那么准的，狠过了头的，也有太稳了狠不起来的。

比如上海同志讲，还存在有“老大难”的问题。几百万人的城市，不平衡状态哪里都存在，不平衡是自然现象，北京也是。

对学术权威不要搞得过分。

对老同志犯错误的，条件不那么符合，用协商的方法，选他们当“九大”的代表。一个代表大会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基本部分能反映工农兵意见就好了。你们谁有话，谁就讲。滕代远[19]搞湖南农民运动，你当什么县的委员长，叶得会就是在你手里杀掉的嘛。这个人是前清的翰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我看杀掉不那么妥当。你们各省都有，我总想找个机会给同志们讲讲，就这一次讲吧。

对大知识分子，要给他们出路。翦伯赞、冯友兰是放毒的，我们对他们就是批。批是要批的，也是一批二保，给他们碗饭吃，叫他们受工农兵再教育。

这些人我们是保的。对这些人不要过分，会议上讲一讲。个别讲不行，报纸写社论也不行。一写他们就过关的。不批不行，批还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校长不一定当了，官不能作了，教授的头衔还得有，好领薪水。广东有个杨国荣、赵吉安这两位是尊孔夫子的。拥护孔子的，在坐的还有郭老。我看范老你基本上也是尊孔的。你那个书上还有孔子的像。冯友兰也是拥护孔夫子的。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向孔夫子。不赞成说孔夫子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是代表奴隶主的。我同郭老在这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我不赞成。范老把孔子也作为新兴阶级的代表。这是古董，我劝同志们不要研究这一套。

人家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不赞成。天津有个杨柳桥[20]说老子是唯心论者，我就注意了这个人，调查一下什么人。原来是个大右派。上海周谷城、刘大杰，刘著一部中国文学史，周写了中国通史。谈家祯是搞遗传学的，你们斗得很厉害吧？这个人是搞摩尔根学派，改了可以用，不改也可以。资产阶级的遗传学家，全国也没有几个。苏步青，复旦大学教授，数学家，对这些资产阶级学者也不要太过分了，我讲的就是这一点。

清理阶级队伍，注意调查研究，注意准字。对老同志，一批二保三看。保就

是帮助，看就是观察他的表现。我看改也可以，不改也可以。不能强迫人家改。地球照样转，胡弦不能拉得太紧了。对学术权威要注意，交给学生七斗八斗他就没命了。薪水扣了之后，有的只给 20 元，多的 40 元，他一家老小要吃饭嘛。我们无产阶级对旧社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还得养一批。

至于民主党派，有人提议不要，为什么不要？不如要一些好。因为问题决定不在民主党派，而在共产党里边。民主党派就是有问题也是第二位的。共产党不出刘邓陶之类，民主党派要造反也造不起来。与其要他秘密地搞，不如让他公开地搞。对政协、民主党派现在还没有取消。至于是否要，这次还来不及讨论。这次有人提不要，考虑一下，下次会议再议。要不要，你们考虑考虑。我们派出作工作的人，也不太好。比如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少数人研究帝王将相，为了反帝王将相，要搞一点。比如科学院、大学里等。关于大学开社会科学学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政治经济学、哲学、文学之类，这些东西十八、九年还没有解决，没有什么好结果。读四、五年大学，搞社会科学的不懂得马列主义，不懂阶级斗争，还不如劳动锻炼几年。先搞阶级斗争，再回去搞两年。大学还有两、三年，不是五年吗？已经两年了，再搞两三年就走光了。我相当赞成斗、批、走。总要走吧。这批大学生都到工农兵中去，这是帮助他们的方法。他们没做工，也没有种地，大学两年不招生让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

上海的同志有什么意见？还有北京的？

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看。上海工总司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会。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这次会，有年青的同志参加很好。但太少了，还有尉风英（尉站起来后问了年龄。）哪一位是刘殿英呀？（刘站起来）你多大年纪，（刘答：32 岁）你好象是个军人，他还是青年嘛，年轻的是你们三位代表了，还有

年轻的没有？（周恩来：还有青海的达洛 38 岁，藏族）你会讲汉语吗？（达洛站起来答："会"），你是真藏族还是假藏族？（达洛答：真藏族）

新疆，我讲过你们那里团结起来，你们那里还有些问题。哪个是龙书金？（龙站起来）你还是我的老乡咧。还有王恩茂。你有些作法很笨，到飞机场搞欢迎那一套干嘛呀？结果搞的一派赞成，一派反对。总有人给你出主意，摇鹅毛扇子的。

还有陈永贵（陈立即站起来），你那个打扮还是农民的本色，大寨也有灾难，每天一万人参观，不影响粮食生产吗？（陈答：很好，对我们是个促进）

冼恒汉，广西佬吧？你认识韦国清吗？（冼答：不认识）你们都是红七军的吧，怎么不认识？（冼答：都是兵）不要老死不相往来。

不要认为四方面军出了一个张国焘，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谁说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在坐开会的就有很多四方面军的嘛，没有那回事。

不要以为中央出了个陈独秀，就没有好人了，陕西出了个高岗就没有好人了。共产党出了个陈独秀，认识他的人不少，总理认识吧？（周恩来：康老也认识。）将来写党史没有陈独秀的名字不好。开始是他，后来不好，他整个思想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党出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李立三、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等人，就说我们党不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我看不能这样说。坏人是有的，开始不是以坏人面貌出现的。

有这么多叛变的，井冈山矮了一截吗？没有。我前几年去过，还是那个老样子，还是那么高。

这次又清出了刘邓陶、彭罗陆杨这些人。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应该说，邓小平同刘少奇有区别。事实上也有点区别。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我们这些人一举手还不容易！你们要开除，将来开除好了。我是有保留的。至于怕

他造反，我看不要怕。他造不起来。邓小平的特点是太脱离群众了。我这个思想可能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给他讲几句好话。不过邓是摇鹅毛扇子的，真正决策的还是刘少奇。八大时搞招降纳叛，七大时审查代表，是刘少奇、彭真他们搞的。他们在延安召开了一个白区工作会议。

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21]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有贺龙、刘震、王尚荣[22]、许光达这些人。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

注释

[1] 张鼎丞，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2] 邓老，邓子恢，与张鼎丞曾长期在华中、华野共事，相互熟悉。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银行工作。
[3] 谭启龙，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4] 张体学，时任湖北省省长。
[5] 王任重，原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6] 王延春，曾任湖南省委常务书记及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
[7] 邓小平的自传检讨，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邓小平写了一封检讨书《我的自述》，转给中央及毛主席。
[8] 韩先楚，时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福建省成立革命委员会。
[9] 辽宁三大派，当时辽宁分为三派，“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后经过联合，辽宁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成功成立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陈锡联。
[10] 肖克，即萧克，上将，长征中萧克支持张国焘的分裂主张，萧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支持创办了反毛非毛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杂志《炎黄春秋》。
[11] 李德生，时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八日安徽成立革命委员会。
[12] 谭启龙，一九七〇年复出后历任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一九七二年四月起历任浙江省委书记〔主持工作〕、省革委会副主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江渭清，一九七四年底复出，中央派江渭清到江西工作，历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政委、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
[13] 邓华，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上，邓华因彭德怀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六零年转业到地方，任四川省副省长，主管农业机械工作。
[14] 黄克诚，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上，黄克诚与彭德怀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被解除军委总参谋长职务，一九六五年，黄克诚任山西省任副省长，分管农业。谭政，

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六〇年九、十月间召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定性为“在总政结成反党宗派集团”，一九六一年一月后，被撤销了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任福建省副省长，一九七五年八月复出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15] 杜聿明，著名国民党高级将领，一九四九年一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一九五九年被特赦，其女婿为美籍华裔诺贝尔得主杨振宁博士。王耀武，著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军事才能突出，在济南战役中被俘，一九五九年被特赦。两人都被粟裕将军所俘。

[16]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一九一二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一九一五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一九一九年赴美留学，一九二四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一九四六年赴美任客座教授。一九四八年末至一九四九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一九五二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17] 范老指范文澜。

[18] 郭老指郭沫若。

[19] 滕代远（1904—1974），湖南省怀化市麻阳县人，1924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 年任中央军委参谋长。1942 年任八路军参谋长并参与北方局工作。是中共第七至十届中央委员。长期主持铁道部门工作。他是中国工农红军早期创始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者之一，还是新中国人民铁路事业的奠基人。

[20] 杨柳桥，男，汉族，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河北省人，1908 年 5 月出生，现从事文科类其他专业。自 30 年代起即从事先秦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周易》、《老子》的研究有较深造诣，在某些观点的评价上有所突破。50 年代初期，中外哲学界普遍认为老子是唯物主义的，1955 年《哲学研究》发表了杨的文章，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的，

[21] 成钧（1911 年 6 月 19 日-1988 年 8 月 6 日），原名成本鑫，湖北石首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文化大革命期间入狱 5 年，1973 年 5 月得以平反恢复原职。 许光达（1908.11.19 ~ 1969.06.03），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萝卜冲人。1925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春入黄埔军校第 5 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光达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廖汉生（1911 年 11 月 14 日—2006 年 10 月 05 日），土家族，湖南省桑植县人。1929 年参加革命，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批判达 5 年，1972 年因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亲自批示，得以重获自由。

[22] 刘震（1915 年 3 月 3 日—1992 年 8 月 20 日），原名刘幼安。湖北省孝感孝昌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奠基人之一。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央军委委员，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 王尚荣（1915—2000），湖北省石首县人。1956 年 7 月至 1966 年 8 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1966 年 8 月起被关押达 8 年。

一个国家的武器专靠外国是很危险的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一

一个是钢铁，一个是机械，一个是军事工业。原料不够的，还要有些进口，但主要是靠自己。有了钢铁，就可以搞机械工业；有了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就可以搞军工厂。一个国家的武器专靠外国是很危险的。

二

自己搞，有个十年八年，最多十几年，就可以有个初步基础。要树立自力更生的思想。什么都靠外国顾问，什么都要进口，我看不是个办法。我们的国家吃过这个亏。蒋介石那个时代，他是什么都不搞，一切靠外国。那个时候，包括清朝末年，几十年只搞到年产几万吨钢。所以他丧失人心。他跟日本人打仗也好，跟我们打也好，主要靠美国。过去是靠英国，后来靠美国。他现在呆在台湾，有时也骂美国，但实际上离了美国，他一天也不能活。

三

我们现在比蒋介石统治的时候有些进步，但是和别的工业国比较，还差得很，在许多方面还不行，更不要说工业产值按人口比例与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美国、加拿大和苏联等比了。有些方面有所前进，有些方面我们还要赶路。如果发生战争，那也没有办法，只好打了再说。

四

希望你们几十年后，不仅政治上，而且经济上、军事上都不靠外国，不靠任何外国，靠自己，我是说基本上靠自己。要是十几年做不到，更长一些时间也可

以。

有帝国主义存在，总要出乱子的。你们的外长来的时候，我对他说，你是搞外交的，什么叫全面彻底裁军，有这么一回事没有啊？事实相反，叫全面彻底扩军，全面彻底裁军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情。

赞成越南又打又谈的方针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时谈话的主要部分。

因为最近没有什么仗打，所以你们想同美国谈判。可以谈，要把它谈走也困难。美国也想同你们谈判，因为它的处境相当困难。它要顾及三个地区的问题，一个是美洲——美国，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亚洲。但是它把重兵放在亚洲搞这么几年，已经不平衡了，在欧洲投资的美国资本家在这方面就不满意。同时美国在历史上历来是让别国打，打到半路它再参加。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先打朝鲜战争，然后打越南战争，它一国当头，别的国家很少参加。不管它叫什么特种战争，还是局部战争，对美国来说都是全力以赴的。现在它对别国顾不上，例如它在欧洲的军队就哇哇叫，说人少了，有经验的战士和指挥员给抽走了，好的装备也抽走了。不论是它在日本、朝鲜还是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军队，还不是照样抽吗？它自己国家不是说有两亿人口吗？但是它经不起打，只出几十万兵，兵力有限。

你们打了十几年之后，就不要单看自己的困难了，要看到敌人的困难。日本在一九四五年投降到现在已有二十三年了，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曾经有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你们：日本、法国、美国。但是，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而且还得到了发展。

帝国主义当然要打。它打的目的，一是为了灭火。你们那个地方起火，它要灭火。二是为了军火资本。为了灭火，就要制造灭火机械，就可以赚钱。美国每年在你们那里要消耗三百亿美元以上。

美国的规律是不愿意打长。他们的战争大概都是四年左右。你们那里，火灭

不下去，反而烧得更大了。他们资本家分成派别，这个集团得利多，那个集团得利少，分赃不匀，内部就要闹乱子。这些矛盾都可以利用。赚钱较少的垄断资本家不愿意坚持打下去。从两派的竞选演说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来。特别是，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如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到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

一九六六年，我在杭州同胡志明[1]主席谈话，那时美国对北越已经又打起来了，但还没有恢复轰炸。我说美国大概打到今年就差不多了，因为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不管哪个总统上台都有这个问题：它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现在退出?我看继续打下去它的困难会增多。整个欧洲的国家都没有参加打，这同朝鲜战争时的情况不同。日本大概不会参加打，它经济上帮一点儿忙是可能的，制造军火它是赚钱的。我看美国人过去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太大了。现在美国又是过去的做法，把兵力过于分散了。这不只是我们这样说，就是尼克松[2]也这样说。它不但在美洲、欧洲把兵力分得这么散，就是在亚洲也是把兵力分散的。我原来不相信它会打北越，后来它轰炸北越，这话不灵了。现在它不轰炸了，这话又灵了。也许它又要恢复轰炸，我的话就又不灵了。但总有一天要灵的，它又要停止轰炸。所以你们做几种打算，我看是好的。

总而言之，这么多年来，美国的陆军是没有进攻北越的，它也没有封锁海防，也没有轰炸河内市区。它是留了一手的。它有个时候说是要“穷追”，可是你们的飞机从我们国内飞来飞去，它也不“穷追”。所以它那是说的空话。你们的飞机在我们的机场来往，它根本不提。又例如，中国有那么多人在你们那里工作，它是知道的，但它一个字也不提，好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至于我们在你们那里

的现在没有用的那部分人，可以撤回来，你们讨论过没有？如果它再来，我们再出去嘛!你们考虑一下，哪些可以留，哪些不要留，对你们有用的就留，现在没有用的就撤，等到将来又有用了再去。这和你们的飞机利用中国的飞机场一样，需要利用时就利用，现在不需要了就不利用。大体就是这样。

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约翰逊[3]曾公开说，甚至条约有时也不算数。但是事物总是有个规则的。例如你们的谈判，难道要谈一百年吗？我们的总理[4]说，尼克松再谈两年不解决问题，他下一届再当总统就困难了。

还有一点，是南越傀儡政府非常害怕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美国有人说，真正有效的，在南越人中有影响的，不是西贡政府，而是解放阵线。这话不是在美国的国会里讲的，而是记者报道的，但谁说的又不讲名字，只说是所谓美国官方人士。这话就提出这么个问题，在南越谁是真正有威信的政府？是阮文绍[5]还是阮友寿[6]？所以，名义上美国吹阮文绍怎么了不起，并说他不去巴黎参加谈判，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美国知道没有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参加谈判，就不能解决问题。

注释

[1]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2] 尼克松，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当选美国总统。
[3] 约翰逊，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九年任美国总统。
[4] 这里指周恩来。
[5] 阮文绍，当时任南越政权“总统”。
[6] 阮友寿，当时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关于战争与革命的问题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时谈话的一部分。

一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帝国主义究竟怎么办？就是说，它要不要打世界大战？或者暂时不打，过一阵打。你接触你们国家及欧洲国家，有这种感觉没有？

希尔（以下简称希）：我看它们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它们现在面临极大的困难，看来它们一时不会打，至少它们现在还没有这么一个力量发动这场世界规模的战争。大多数人是有这种看法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由于它们已失去判断的能力，有发生很大冲突的危险性。但是总的来看，它们暂时还发动不了这场大战。

毛：要打仗，美国、苏联这两个大国可以打，其次是日本、西德、意大利这些战败国。至于英国和法国，它们不大想打。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戴高乐[1]的军事预算还减了一点。

毛：就是日本和西德，现在也看不出它们想打仗。西德想吞并东德，统一德国，日本想收回冲绳。其实日本还没有独立。

周：美国在军事上控制它们，在那里有那么多军事基地。

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好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有些不同。不晓得这些看法对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脱离不了战胜国，不但在财政方面和投资方面，而且在国际政治和军事方面也脱离不了战胜国。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特勒搞几年后就起来了。

周：他不承认凡尔赛条约。

毛：他不承认凡尔赛条约。当时这些国家的工人、知识分子、学生还听政府的话。德国那么大的一个共产党一下就垮了。

周：意大利的共产党垮得更早。

毛：社会民主党也完了。希特勒成立了国社党[2]、冲锋队。

这个美国，按照过去两次世界大战的规律，它都是要别的国家先打，打了两年后才动手，才参战。现在美国在朝鲜、越南都首当其冲，在欧洲还有二十万兵，主要是在西德。美国在南越有五十万兵，在南朝鲜有两个师共七万多人，在日本、台湾、菲律宾、泰国也有。它的兵力已经很分散了。它的两只手都伸了出来，一个是在欧洲，一个是在亚洲，打些小仗。当然垄断资本家还是有它的打算的。

周：可以赚钱。

毛：长期不打仗，垄断资本家就不高兴，包括澳大利亚的垄断资本家在内，也希望出点兵，但兵却不很多。

二

毛：这样看，它们正在准备扩大战争，不论美国、苏联还是其他的国家。从这些情况来看，似乎是要打仗了。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把握，所以想请教你。也不强加于你很快回答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可以观察这个问题？在一年之内，我们再会面的时候，再来谈这个问题。但是，人民的觉悟也要估计到。

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在南越的美国军队很高兴，还欢呼，这说明他们的士气不那么很高。

日本从一九四五年投降到现在已经二十三年了。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战争从未停止过。按照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它就是离不开战争。

世界上有两个大国，它们不但有常规武器，而且有原子弹。这个东西不大好碰，

它们自已也知道。赫鲁晓夫[3]的理论是核战争打起来就会毁灭地球，没有胜利者。美国也这么说。这两个大国是核国家。我们这个国家，还可以说是无核国家，这么少一点核武器不算数，要打只能是用常规武器。因为我们既不是美国的参谋长，也不是苏联的参谋长，搞不清楚它们究竟要干什么，只能从一些表现来看问题。这两个国家的人口相等，真正要打大仗还会感到人力不足。现在打个中等规模的仗，比如今天在越南打的仗，美国都感到人力困难，特别是飞行员。

三

毛：从你们国家到香港要多少时间?

希：飞行要十多个小时。从澳大利亚到香港有四千五百英里，大概七千多公里。

毛：这个世界我看要统一。又是英里，又是海里，又是公里，又那么多语言，但语言一下统一不容易，只要世界统一了就好办了。这个地球总 有一天要统一的。

过去的蒙古、西方的罗马、亚历山大、拿破仑、大英帝国，现在的美国跟苏联，都想统一世界。希特勒也想统一世界，日本人想统一太平洋，都没有得逞。这种可能我看还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强迫世界各国人民接受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统一方式。第二种，世界各国人民起来革命，然后联合起来，我看会统一得了的。由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来统一世界恐怕也不容易。打一场世界原子战争，把世界人口消灭得差不多了，然后由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来统一世界? 但是这两个国家人口少，一分散就不够用了。它们也怕打原子战争。它们倒不怕消灭别国人口，怕消灭本国的人口。第二中间地带那些国家，英国、法国、西德、日本、意大利，恐怕也不愿意打。最后恐怕还是得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由各国人民革命，然后自由联合。什么美元、英镑、澳元、法郎、马克、卢布，都统一起来，还搞这些

差别干啥呀?

越南战争跟朝鲜战争有个不同之处，整个欧洲没有参加，朝鲜战争英国、法国、土耳其、比利时都参加了。

我只出这么个题目。我也考虑一下，是不是请你也考虑一下这个世界问题，战争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发生战争后引起革命呢，还是革命能制止战争？总而言之，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

注释

[1] 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统。
[2] 国社党，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
[3] 赫鲁晓夫，曾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六八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一九六八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在修改林彪中共九大报告稿时所加和改写的话

（一九六九年四月）

一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北京大学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1]，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迅速布满全国。接着，一批批红卫兵起来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二

三年来，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没有能够得逞，就是因为人民拥护了军队，军队保护了人民的缘故。

三

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

四

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五

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

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注释

[1] 指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写的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部讲话记录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于 1969 年 4 月 1 日下午 5 时正式开幕的，一直开到 4 月 23 日下午结束。接着召开九届一中全会，同日结束。

一 开幕词（四月一日）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今天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议事日程主要包括三项：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第二项，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项，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现在选举主席团。要不要读？你们都知道了嘛。主席团这么多人，一百七十六名，行不行呀？一共一百七十六人。你们手上都有，赞不赞成？赞成的举手。多数吧？通过了。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

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没有意见，通过。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

我希望，我们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四十八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1]，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2]，湖北的代表陈潭秋[3]，湖南的代表何叔衡[4]，上海的代表李汉俊[5]，都是牺牲了。叛变的，

当了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6]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7]，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8]、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9]。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10]，恩来同志、伯承同志[11]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12]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13]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呀，什么彭真、薄一波[14]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 四月十一日的讲话

李雪峰同志，北京有人攻你了吧？北京攻得厉害呀，多少次检查也不放，检讨一下就行了。为什么检讨那么多？到天津又有人攻，是山西发动的，他是山西人啊。（总理：给刘格平打了个招呼，是张日清他们搞的。）（张春桥：是刘芝兰、陈叔中搞的。）

找同志们来，想商量一些事。这个会是开小会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想开一次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党章。但还不发表，文字修改交秘书处。政治报告增加几段:一个是民主党派、一个是统一战线。共分八段，每段加个题目。今天是十一号，明后天讨论两头，十四号开大会。

此外，我看到北京市的一个简报说，清理阶级队伍有一个倾向，就是扩大化。这个问题在碰头会上谈过好几次了，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找出来，要搞这一些人。有些地方搞得好，有些地方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中央提出要搞，一搞他们就扩大化了，历史上也有不少这种事。比如延安整风，开始时是为了召开“七大”，事先把问题搞清楚。搞清楚了，不在大会上批评那些犯错误的人，我讲: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结果是团结起来了，是胜利了嘛。

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我说是难免的，既与他决裂（指第一次国共合作），于是“左”起来。四中全会康老是有研究的。王明反李立三，说：三中全会搞得还不够，不是反他们的“左”，是反他们的右。

一次比一次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厉害，把红军搞得差不多了，就舒服了。抗日时，王明回国又右了，他们说：光中央苏区就有五十万红军，不是打日本，不是依靠群众，是依靠国民党。我们说主要是抗日，民族矛盾加深了，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总有一个主要矛盾，结果掩盖了另一个矛盾，发生了皖南事变。

一个事件有一个主要倾向，掩盖了另一个倾向。如打日本，“民族统一战线”掩盖了独立自主，掩盖了阶级矛盾。后来批判王明，现在还有人说整风不应该那么整，整错了。我说:将来还会有人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还在世，既

然合作，就放到合作上去了。他们和我们口号也一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独立自主不能说没有，不然就不能发展那么大。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主要是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东东边是海陆丰，西边是广宁，广西是东兰。

到后来，一天天地突出出来了，到蒋介石杀人前夜，也没有想到搞根据地这个问题呀。蒋介石杀人，把掩盖的一面就突出出来了，我们就拿枪同国民党干起来了，而刘少奇就在武汉交枪，别处也有。有的打了一仗打败了。上海“四·一二”事变，那时不知道到乡村去，到乡村也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因为那时城市杀人，既然打起来就一齐打倒，农不在其列。民族资产阶级不分什么资本家、工商业、小资本家都打倒，所谓民主革命是一句空话。我们说民族资本家不搞合作，内战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为什么“左”呢？不是说要打吗？所以表现形式总是“左”。到了抗日第二次合作，就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掩盖了独立自主、搞根据地、扩大红军、发动群众，直到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以后，开头国民党请我去谈判，没有结果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董老、总理你们去了。写了协议，应该算数嘛！我在重庆时，有人在延安搞了个“和平民主新阶段”。（董老：我们在重庆不知道。）（曾思玉：晋察冀是聂荣臻传达的。）东北没传达。（林副主席：我们在东北没传达，发了个电报给中央。这个电报就是说现在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而是内战期间。是同刘少奇对抗，反对刘少奇的。）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为把蒋介石打败了嘛！我们进城以后，那个时候把刘少奇、邓小平团结起来了。除邓小平没有发现历史问题以外，薄一波、安子文等都和国民党有一些关系。也有一些人是跟着走的，不一定是叛

徒、特务。例如山东的谭启龙，算这类。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就开始了，但我们没有宣布，土改以后才逐步宣布。土地改革彻底吗？不那么彻底。有的是和平土改。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消灭它。（张春桥：利用、限制、改造。）

几年内，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已经指出了，但是没有经常讲，广大干部不知道，所以这一次又来了个二次革命，叫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开始的，叫不叫大革命？以后让历史学家去做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名称叫什么都可以。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对上层建筑，机关、学校、工厂，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恐怕还要一个时期，认真抓一下。当个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容易。（姚文元：主席是全国革命委员会主任。）我也算一个主任。我这个主任也管不了那么多。比如北京，还不是谢富治、温玉成去管。与过去不同的是可以插手了。（谢富治：主要是靠主席抓的。）（林副主席：主要抓了典型。）（张春桥：陶铸抓了生产，不叫抓革命。）

工厂、农村，六六年十月、十二月发了两个文件，现在还是要搞。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也搞了嘛。可是要谨慎啊。要注意，有些专案组的材料不一定准确。南口专案组，八个人搞一个党委书记，搞专案的人总想多搞几个。过去我们行军，没事捉虱子，总想多捉几个，专案组好像捉虱子，要超出一点好说话。我这个人没搞专案，就可以说，搞了的人就不好说话。一个大学捉了九百多人，怎么得了？人关起来了，捉有捉的理由，放更要有个理由。我看不止一个上海，其他地方都有。至于关在牛棚里的人更不少，恐怕各地都有。上海关的人干什么？（春桥同志：在扫地。）苏联人讲我们整知识分子，秦始皇杀了四百几十个人，我们还没有杀一个吧，是关牛棚。

（康老：苏联红星报上登了彭真坐喷气式的照片。）喷气式不要搞。我说罪魁祸首还是我；我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了，说：我在一九二七年文章上说了，地主戴高帽子游乡，既然给地主可以戴，为什么不可以给彭真戴？我们几十年没有搞了，这次红卫兵就翻出来了，坐喷气式。“三反”“五反”时天津就搞过。我们不主张戴高帽子这一套。抓人还是大部不抓，抓了怎么办？还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嘛！

现在扩大化了，许多同志要注意。想想我们党的历史，总是在主要倾向掩盖之下，忽略了另外一种倾向。我讲的就是这点。完了。

报告通过了，也不要公布，文字修改，交秘书处；会后再公布。

我们行军拉屎挖坑，也有自己挖坑的。（总理：我们犯错误，就没想到挖坑。）（许世友：到营房以后，就不挖了。）营房把我军与工农隔离了，不是好事情。当然，不搞一点也不好，老百姓也讨厌，但专门搞个营房总不好。什么是三支两军呀？人家看不懂。（林副主席：要写全称。）如“三民主义”我还记得，“五权宪法”我就背不下来了。（总理：还有三反、五反。）（张春桥：五反也记不得了。）

公报十四日基本通过，下一步搞选举。这个比例范围，人选还是过去的办法，小组提议。但是，我提议几位老同志，就是你们讲的几个老“机会主义”，都选进去。我的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见。王明、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七大”时不选他们，也是作了工作才选进去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时是同我合作的，以后也是好事作得多嘛！王明回国以后，他们没有站在王明方面，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这次能不能把张闻天、王稼祥选进去，再考虑一下。几位老帅，李先念、李富春要选。（许世友：应当选。）

王明他们（江青：王明不同。）**有几个反动派有什么要紧！**（许世友：他们反了几十年，选进去了，他们还是要反，怎么办？）**我们就永远准备他反。**

（许世友：主席下命令就选。）**那不就成命令主义了。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嘛！朱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要选进去。**（董老：几个老帅选进去是可能的，张闻天、王稼祥要选进去有困难。）

（康老：王明说他们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哪一年传播过？一不做工人运动，二不做农民运动，三不会打仗。张闻天、王稼祥还做过。**

张国华同志，现在没有人反你了吧！还有人打倒你吗？原来要打倒你这个土皇帝的，西藏叫他土皇帝，也来了嘛！所以不要认为反对过你的人都不好。

武斗，全国都斗不过四川，至于清华、北大，不算数。它那里双方都有一万多人，有电台指挥，真枪真炮。（张国华：有几百部电台。）**从什么地方搞的？**（张国华：有学校的，有搞来的。）**我们过去搞演习是假的，这次真枪真炮，我看是个训练。**

三　四月十三日的讲话

讲四个问题，还有一个文件。一次党的大会上，我作过一次报告，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国内矛盾降为次要矛盾，讲完后，讲民族统一战线。发给刘少奇、彭真等，不赞成。我说蒋介石抗日了，过去他们不抗日，不发动群众。

这个《论政策》有吗？总结我们过去几十年翻来覆去犯的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定斗争；一切斗争，否定联合。那是一种倾向。既与国民党联合，还与他们批评作斗争。

总工会刘少奇所谓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和蒋介石、汪精卫。当买办资产阶级也不是一下子当的，也是逐步当起来的。他们被群众吓坏了。党内也有被吓坏

的。有个华北代表团的曾义，他们怕吓着蒋介石，就不敢提民主的口号。南昌暴动以后，城市蹲不住了，往乡下跑，这就是过去被国共合作掩盖着的一个矛盾，从中山舰事件就有。这些情况就很值得注意。

一个时期有一股风，这股风是正确的，如合作等，但它掩盖着另一股风，不提独立自主、发动群众了。第二次合作就不同了，民族斗争掩盖了阶级斗争，此后总有暗潮。如现在，反修又引起反苏。中国过去几十年，对外国人不分好坏都反对。直到共产党成立，才懂得把外国人分为两种，其中有劳动人民。老同志搞了几十年，总懂得点吧！王洪文同志，你就没有经过几个时期。（王洪文：很多事情我就不懂。）

所以等到南昌暴动，“八·七”清算陈独秀，有时也有右的，但主要是“左”的。我说的是江西 AB 团，他提出几个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要把我捉起来杀掉。彭德怀聪明，马上发表声明，说是敌人挑拨。现在内务部的曾山，当时是江西苏维埃主席，不赞成这个口号，所以他也被打倒。恐怕各根据地都有一点。我就不相信，军队就那么平安无事，那么太平吗？太平只能太平一个时候。

政策方面，瞿秋白、李立三都没有搞几天，主要是王明。瞿秋白、李立三这两个人都不是苏联赏识的，现在苏联吹瞿秋白了，还有李大钊等。我看党内最危险的有三次，一次是陈独秀，第二次王明，第三次刘少奇。其他是局部的，如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彭德怀。

高、饶也是带全党性的。张国焘是局部的，在军队自搞一套，他不看方针正确与否，只看势力大小。他看四方面军大，一方面军小，那时三万，他看不上眼。罗章龙是湖南人，我相当熟的。不晓得他怎么搞的，在上海另立中央。中央坏，

你在中央搞嘛！一次张国焘，一次罗章龙。罗章龙没有军队，群众也不多，没有搞几天嘛。第三次大会，他是反国共合作的，蔡和森都到了，他没到，刘元震当他的代表。

独立自主，偏偏不搞军队，军队里也派了代表，实际上这个权在军阀手里。土地革命时，犯“左”的错误是有原因的。但是，中国的富农不发达，雇、贫、中农也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后头“六大”就提出：按人口平分，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好办法。我很欣赏这句话。但“六大”也未解决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份的问题，未解决乡村包围城市、重点在乡村的问题。

我说，把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犯错误的人，也属于二十八个半，但在苏区吃过苦的人选上。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要选作中委也难，其实他们与朱德、陈毅差不多，就是没让进。

许世友说，朱德、陈毅，他们反了几十年，其中也有不反的。红军“七大”后，他们领导开了八次代表大会，总想夺军权，当前委书记才满意。夺了军权又不会指挥，他心里也不踏实。要到中央去请示，可见是要夺军权了。第二次是项英，他又不指挥，又不想打。搬到苏区就搞五次反“围剿”那套，总是听洋人的。这样军队又遭遇不少灾难。只有王明，他没到过任何一个根据地，以前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没有搞过，又没有打过仗，横直说二十八个半，吃得开，成了一股风。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右派。

许多人如黄永胜，我就不认识。到北京才认识你。认识一个人，要谈一次话，不谈不晓得他的历史。这是那个时期了。以后就抗日时期了，又一个浪潮，民族矛盾把阶级矛盾掩盖了，一个大时期，一九三八年、三九年到四一年初，项英还未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了，得到许多教训。华北朱怀冰、张荫梧，华东韩德勤，

山东李仙洲，河北石友三，还有鹿钟麟，这些人教育了我们，我说，单是马克思不行，还要受帝国主义、国民党教育。然后就决裂了。

农民进城抓地主，工商业许多是地主办的，这就破坏了中小城市。那些小市镇要注意保护，不然对工农都不利。所以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呀！不能不利用它、限制它。五六年敲锣打鼓，搞公私合营，以后分歧比较大了。《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下去，有计划地把牛鬼蛇神都放出来了，什么都在报上放。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放毒，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

所有的材料我都看了，都不如四川张国华那里。双方几万人，穿上群众衣服，实际上是退伍军人，改换衣服指挥，这些都没啥大事。好像很不得了。这些矛盾过去没有暴露过，这次暴露出来，我看是好事。这些同志我看是可以讲清楚的，转过来了由他们自己讲，是怎么想把你消灭的。

我看将来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群众谅解就是了，有些人抓住不放，比如杨勇。当然他也有错误。至于肖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是有问题的，不在其内。杨、余、傅，杨、余大一些，不过傅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这三个人都不讲真话，所以这场斗争，不是讲落实政策吗？在全国恐怕还要一个时期，不过不要搞宽了，搞一个、两个，搞三分之一就了不起了。一个学校一下就团结起来不行，有三分之一教授、学生就了不起了，经过一个时期就三分之二嘛！剩下的他就站不住脚了。但所有军队宣传队、工人宣传队都不能压。工人阶级叫“领导一切”不是叫“压倒一切”嘛！有几个学生，说过几句怪话，现在冲也不敢冲了。反一下有啥要紧呀？

现在又有一股浪潮，又掩盖了一个什么东西，我现在还看不清。还有个江西，

也搞“二月逆流”，湖北一带，还有江西九江三省交界。跟我们搞根据地一样，哪个地方闹得厉害，那个地方就好一些。（张国华：重庆就好一些。）工人可以控制局面吗？（张国华：基本上可以，他们现在在偏僻的边界上。）

闹了几十年革命，我讲的还不是你们的经验。大革命破裂，“七大”团结胜利。进城后对资产阶级还是利用他，但是包括一个问题:有些干部搞不清楚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定息。结果他要进工会，还搞到李先念那里，我说不行，拿定息是可以，进工会是不行的，这讲的是资本家。你抓几个工厂试试看，实质上没有解决，形“左”实“右”。例如木材厂，李先念蹲点的、修配厂，徐向前蹲点的，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当然有共产党员，但是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管工人阶级。我看实质上还没有解决，只能说大部分，不讲全部。大部分学校、机关有些是走资派，有些知识分子成堆，这些可以改造。过去是用群众改造他们。

四 四月二十三日的讲话节选

请各位同志注意，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

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有的在地、县、社、队、工厂，如长期脱离生产就与我们一样，叫机关工作人员了，要叫他们不要脱产。他们只了解那个单位，不了解全国，犹如我们不了解他们一样。他们在本地方很活跃，但一到中央，到处记者采访，作报告，半年、一年就差不多垮台了。要认真负责，我党历史上有过，“六大”以来农民没有过，军队中有。

现在是大苏维埃，工农兵嘛。如黄永胜，算农民算工人呢？听说打张辉瓒你当团长了。我也不认识你，听说你认识我。如到场镇，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晓得谁到哪里了。还有很多没有选上。如刚才说的华北张日清，之所以提名，因为

是政委。河北一个也没有。一个没有提，就因为张日清与刘格平打仗，一是现在仗打得不清楚，恐怕各地区都会有，至于会不会变呢？一种是变好，一种是变得不好，那有啥办法呢？再一个，新选进的，我就担心他们脱产，脱离群众。

陈毅写了上十次，到了上海又犯了。世界上有这些同志，你有啥办法呢？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检讨甚多。我看就差不多了，看以后的行动，他们也要看我们的。如在延安整风，提出治病救人，人家不信，也有理由。“七大”一选就相信了，但你尽管选他，王明、李立三都坏了，我看地球照样转。苏联不会写文章，还不如王明呢，他说我们革命委员会搞军事化。王明写的，《共产党人》登的，登了三期。如果那时不选他，他还反得快一些。“八·七”会议没选陈独秀，也没有请他到会。

只有李维汉，大革命时期搞农民运动、痞子运动，他是右的。但是四中全会就很“左”了。一个他，一个瞿秋白，长征的时候，不带他走，他是组织部长，书记处负责。至于瞿秋白是书生，“左”掩盖了右的实质。实质是本质，形“左”实右，“左”的形式，右的本质。

我看共产党就比国民党和其他党好。我们选举，起码不用花钱买选票，不要活动费，没有到会的也可以选。“六大”我就没有到莫斯科，也选上了。王明统治四年，太“左”，不适合当时情况。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了，由于政策适合当时的情况。资产阶级搞什么议会选举。我认识一个人，为了当税务局长，只当三个月，花了很多钱买选票。当了以后就拼命地刮皮，要不他就蚀本了。我们共产党是灭不了的。我们有政治纲领，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所以我们共产党不能埋头搞选举，更重要的是要准备牺牲的。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要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我们有许多根据地，活着的不多

了，抗战以来，人多了。

在会议过程中，有些代表团提了意见，我是赞成的。黑龙江的工作做得不错。我们这个名单没有刘少奇一伙，王明说他是精华，而我们是糟粕。还有两句，邓小平和刘少奇要有区别。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也有些好事，如苏联的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他打仗也不怎么样，可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古、谢，王明是反对的。差不多了吧？还要选个政治局，又要个常委，中央委员还没选出来嘛。我想还是由下而上的办法比较好。只提一个数目，不提名单。这又要时间，还是想几个问题，你们想一想政治局怎么组成？常委怎么组成？群众路线方法比较好。

五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八千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什么特务机构。这个里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要了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的；有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检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并且老工人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候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

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

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15]跟王效禹[16]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17]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一个“红总”[18]，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

不了那么多。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北京经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叫谢富治[19]。后头他采取的方针是这样：凡见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都说你们无事。而拥护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罗。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20]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

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的，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21]，杨、余、傅[22]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

差不多了，那就散会！

注释

[1] 董老，指董必武，一九二一年七月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中共九大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2] 王尽美、邓恩铭，一九二一年七月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山东的中共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王尽美一九二五年八日因病逝世。邓恩铭一九二八年底被捕，一九三一年四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3] 陈潭秋，一九二一年七月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一九三九年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一九四二年九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逮捕，一九四三年九月被秘密杀害。

[4] 何叔衡，一九二一年七月以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在转赴上海途中被敌人包围，突围时壮烈牺牲.

[5] 李汉俊，一九二一年七月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自动脱党。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蒋介石的背叛行为进行了愤怒声讨。七月在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掩护了大批共产党员。十二月被桂系军阀杀害于汉口.

[6] 陈公博，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行政院院长、代主席等职。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逃往日本，后被押解回国。一九四六年四月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六月被处决。周佛海，一九二一年七月以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等职。一九四五年九月被国民党军统局软禁，一九四六年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下特赦令，改为无期徒刑。一九四八年二月病死狱中。张国焘，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危害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刘仁静，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后参加托派。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党。建国后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从事翻译工作。一九八七年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同年八月因车祸去世。

[7] 李达，一九二一年七月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随后脱离党组织。此后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坚持宣传马列主义，并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一九四九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治协委员。同年十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冲击，于一九六六年八月逝世。一九八〇年被彻底平反。

[8]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有三十多人。

[9]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日在武汉举行，出席代表八十多人。

[10]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各地代表共一百四十二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八十四人。

[11] 恩来，即周恩来。伯承，即刘伯承，出席中共九大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12] 瞿秋白，一九二七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〇年九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

倾教条主义宗派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一九三四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在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李立三，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一九六七年六月逝世。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为他平反。王明，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在中共七大上，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做工作，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六年一月去苏联后，长期进行反对中共中央的活动。一九七四年病死在莫斯科。

[13] 张闻天，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十月参加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参加遵义会议，支持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作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负总责。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六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一九七六年七月逝世。一九七九年八月，中共中央为他举行追悼会，平反恢复名誉。王稼祥，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八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后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后任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冲击。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一九七四年一月逝世。

[14] 彭真，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顺直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二九年被捕。一九三五年刑满出狱。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八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建国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被关进监狱。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薄一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后在顺直省委指导兵运工作。后被捕入狱，在狱中任中共支部书记。一九三六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履行简单手续集体出狱，后到山西主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一九四五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建国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他得到平反。

[15] 杨得志，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

[16] 王效禹，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一九七〇年六月被免职。

[17] 许世友，当时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可令员。

[18] “八・二七”、“红总”，是当时南京的两个群众造反组织。

[19] 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

[20] 皮定钧，当时任福建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21] 王，指王力，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对他隔离审查。关，指关锋，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对他隔离审查。戚，指戚本禹，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一九六八年一月中共中央决定对他隔离审查。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22] 杨，指杨成武，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指余立金，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傅，指傅崇碧，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九六八年三月，杨、余、傅被撤销了他们在军队的职务。一九七四年七月，经毛泽东同志批准，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

同谢富治等的谈话

（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

第一、历史问题：

在一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后，只讲合作，就不讲独立自主。讲国共合作，就不讲和国民党作斗争。有一个倾向问题。有时讲倾向，有时讲潮流。有时讲思潮，有时讲浪潮。在一个倾向下就蒙蔽许多人。只想到合作，没想到分裂。破裂了，一九二七年又来了一个倾向：只要工人农民，不要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其他党派就不行了。

教条主义主张，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小党派比国民党还坏。这就是还有欺骗性，不承认有第三势力。在这种势力下，又产生了“左”，其中也有右。这是十年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又来了一个高潮。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为八路军，戴国民党的帽子。很多人不理解，想不通。其实我们是独立的。以后王明回来了，带来了国防路线，形“左”实右。（有人插话：当时主席提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时彭德怀很坏，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很感兴趣，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在太行实行了土改，三起三落。）后来，马歇尔来了。搞三人小组，说什么和平。实际上他们是帮国民党、蒋介石的。我们就准备打。我们准备一段时间，其中的就是准备打。皖南事件，有人认为是主流，实际不是主流，主流是抗日。八年抗战我们没上当，有困难，也有斗争。全国胜利以后，请程潜到北京谈判，他怕把他整垮。我去接他，出他意料之外。我到北京只接过这样一个人。

一个时期总要有一个倾向，要掩盖另一个倾向，分裂中掩盖着联合，联合中

掩盖着分裂。

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是赎买政策。没收资产阶级不会敲锣打鼓。赎买政策列宁早就提出来了，列宁逝世得早，在苏联没有实行。

第二、落实政策。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事情都上纲很高。北京有个工厂，有八个人的专案组，说他们的厂长是狗特务。经过群众审查，这个厂长是好人。有些专案组我就不太相信。北大一万多人，抓了几百人。宣传队进驻以前，不交待任务，进驻以后，没总结经验，不找他汇报。北大三进三出，这样，对军队也不好嘛！63 军就不要走了。这主要是领导不下去，层层听汇报，刘兴是 63 军政治部付主任，七个月来还没听他们汇报过一次。我原以为远的不好抓，没近的地方工作好做。但也不一定了，蒯大富下放以后，表现不错嘛！

现在不是讲对准刘邓一小撮吗？北大是否抓一小撮？抓千分之一、千分之二、千分之三就可以了，其余的都放走。教授、讲师、付教授手无寸铁，造不起反来，造反再抓嘛。

十六条第七个问题，我就只加了一句：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予依法处理外，其他一个不抓，一个不杀，一个不关。有些专案组不分青红皂白，关人容易，放人难，就是怕人家说右倾。四二年延安整风时，不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么！周兴抓了很多人，不是都放了吗？但是很被动。重大特务案件，也是大部不抓，抓一两个就行了。右派分子不要随便戴帽子，帽子在我们手里，他要造反再戴嘛！戴帽子不是右派一个人的问题，是一家人的问题。为什么把他们推到敌人那里去呢？外调的太多了，收获不大。你关的人太多了，统统放出来，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过一两年也

会好的嘛！聂元梓改了，就不错了嘛！

二月逆流几个干将，我就恨不起来。不是这几个嘛！其他地方也有的。有个别跳，他们是公开搞的，不是阴谋。他们反对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我和林彪同志。九大不要写上了，不象杨成武搞两面派。他们还是一肚子气呢。

每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来资产阶级是否要搞反复呢？要一个工厂、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学校，一个公社、一个公社，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搞。搞的时候目标要小，要集中，要具体，抓典型。当然有个过程，关人才不是好办法呢。我们历来不赞成。军队有禁闭，现在还有没有？（答：没有了。）不见得。北京部队还有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讲讲自己，如实行对犯错误的人分配适当的工作。对延安整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少数人翻案，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来是否有人翻案呢？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总是反对我们的。资产阶级人数虽少，但他们的能量很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分子。

第三、准备打仗。

要准备打仗，东北、西北、华北都要准备。准备好了，不打也没有坏处嘛！要准备敌人飞机轰炸我们的原子反应堆。日本投降时，是他们没有根据地，国小。二是政府投降了。我们的领导都被他们打完了，但是我们下面的人还要打。

苏修兵很穷，纪律不好。苏军进东北时，纪律坏透了。苏修兵一年只发一套衣服，还要人家拿钱。他们一是要东西，二是要女人，三要面子。珍宝岛，他们炮打进我们后方七公里，我们不反击，给他面子。打进七十、七百、七千公里，到郑州才好呢。我们就有办法了。割韭菜，但不是拔韭菜。打起来，我们发动，他们也发动，但他们不会发动。红卫兵很勇敢，很听话，凡是过去学校打得厉害

的，这些学校红卫兵就听话。这次分配工作，军队不要，工厂不要，地方也不要。到军队开始不会出早操，睡不起嘛！后来比谁都起得早。开始他们不肯背背包，训练一个时期体力也有了。

加强地方武装，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一个团。平时搞生产、搞训练，打起来编到野战军。义务兵打起仗来就来不及了。

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一九六九年九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国庆二十周年口号送审稿上加的一句口号。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在修改《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时所加的话

（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

一

但是历史是有曲折的。正如恩格斯逝世以后产生了伯恩施坦—考茨基[1]的修正主义一样，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又产生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2]的修正主义。

在赫鲁晓夫掌权十一年之后，修正主义内部发生分裂，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他又经历了五年多的时间，现在在苏联正是由这样一个人主持"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

二

老沙皇的"斯拉夫帝国"早已成为泡影，沙皇统治本身，在一九一七年，早被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革命消灭了，老沙皇的统治完蛋了。在今天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新沙皇妄图重新建立一个更大的称霸全世界的大帝国，也只能是一场迷梦。

注释

[1] 伯恩斯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他公开篡改马克思主义。一八九六年以后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修正"。一九〇二年起多次任国会议员。考茨基，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第二国际理论家。早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转向改良主义。长期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主编，多次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二国际的大会，成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从一九一〇年起公开转向中派主义。一九一七年参与创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和中派组成的临时政府中任外交部副部长和社会化委员会主席。
[2]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同黎笋的谈话纪要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一日）

毛泽东：我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你的?

黎笋[1]：1964 年。我们看到毛主席身体健康，感到很高兴。目前，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形势比较复杂，也存在一些困难。

毛泽东：困难哪一国都有，苏联也有，美国也有。

黎笋：我们很需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我们中央和政治局知道毛主席给我们的工作提意见的话，一定会非常高兴。

毛泽东：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你们是越做越好。

黎笋：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做工作。我们所以能把工作做好，也是按照毛主席以前对我们讲到的三点去做：第一，不怕，不怕敌人；第二，要各个击破；第三，要长期地打。

毛泽东：对，是持久战。你们要准备打持久战，但是如果打短一些不是更好吗?

究竟谁怕谁呢？是你们越南人、柬埔寨人以及东南亚人怕美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怕你们呢？这是个问题，值得考虑，值得研究。还是大国怕小国，风吹草动他都惊慌失措。1964 年北部湾事件[2]你们是整了他一下，但也不是有意想打美国海军。实际上，你们并不是真的打他（美国海军军舰），但他们自己紧张起来了，说越南的鱼雷艇来了，开炮就打。后来美国人自己也讲不出来究竟是真的(越南人的鱼雷攻击)还是假的。美国各地的新闻记者肯定那是假的，是场虚惊。既然打起来了，那就只好打了。对军火商是有利的。(从那时起)美国的总统

每天晚上睡觉很少。尼克松自己讲，他的主要的精力是对付越南。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人，西哈努克亲王[3]，他也不好惹，你惹他，他就要跳出来骂娘。我们有些大使馆，我看要整顿一下。我们中国一些大使馆有大国沙文主义，尽是把人家的缺点看得多，不顾大局。(中国)驻越南的上任大使是谁?

周恩来：朱其文。

毛泽东：朱其文跟你们搞得很僵。事实上朱其文是个国民党，他要跑到外国去。我们不知道他是国民党，你们跟国民党打交道，他为什么不捣你们的乱呀?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看到（他发回的）那些电报是不高兴的。

黎笋：我们越南人民心中牢记着毛主席的恩情。在九年的抗法战争中，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我们为什么能坚持打持久战，尤其是在南方坚持长期抗战？我们为什敢于长期打下去？这主要因为我们依靠了毛主席的著作。

毛泽东：不一定。

黎笋：当然这是事实。我们还要善于在越南的实际环境中运用。

毛泽东：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创造。怎么能说你们没有创造，没有经验呢？吴庭艳一杀 16 万，我是听的报告，不晓得准不准确，但我知道杀死了十几万人就是了。

黎笋：是的，16 万人被杀害了，而且许多人被投入监狱。

毛泽东：我看这就好了。你来杀我，我不可以杀你呀?

黎笋：正是这样。单是在 1969 年我们就打死打伤敌人 61 万人，其中 23 万是美国人。

毛泽东：美国人的人力分配不够，因为他们在全世界铺的太广了。所以，当

他们的人被杀死时，他们的心都碎了。死个几万人，对他是一件大事。你们越南人，不论北越、南越，我看死人是要死的。

黎笋：我们现在的打法死伤很少。不然，我们就不能长期坚持下去。

毛泽东：是啊。恐怕老挝困难一点。老挝族在中国有没有啊?

周恩来：有一些。

毛泽东：他们住在哪儿?

周恩来：在云南省，同老挝交界的地方。

毛泽东：在西双版纳吗?

黄永胜：西双版纳也有一些。

周恩来：我们的壮族跟他们非常相像。

毛泽东：将来老挝决胜的时候，可以到广西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壮族人很能打。过去军阀白崇禧和李宗仁就是靠壮族人。壮族人现在有多少？8 百万?

周恩来：现在多了，有 1 千多万人了。

毛泽东：这是韦国清[4]那一族，他自己不承认。我曾问过他，他是哪一族的？是少数民族吧？他说他是汉族。后来他才承认他是壮族人。

周恩来：太平天国的战士都很善战，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就是壮族人。

毛泽东：太平天国也有一部分军队是广西的。

黎笋：越南的侬族也很能打仗，他们和广西的壮族人都属于同一个民族。

毛泽东：东南亚是一个马蜂窝。东南亚的人民一天天在觉醒。有些和平主义者认为无非是公鸡好斗。哪有那么多公鸡呀！现在母鸡也好斗了嘛！

黎笋：不斗就没有出路。

毛泽东：是啊，不斗不行了。你逼得人家没有路走了嘛，欺负人嘛！

黎笋：柬埔寨人和老挝人本来都信佛教，不好斗。现在他们也好斗起来了。

毛泽东：就是呀，你也不要说信佛教的人就不好斗，中国也是信佛教的，辛亥革命打了 17 年，后来是内部两派打，这样教育了人民。然后是北伐战争，然后就有红军了，然后日本人侵略中国，日本人投降以后就是蒋介石同我们打，打了不到四年，他就不干了，跑到台湾去了。他现在在联合国里说他代表整个中国。他跟我们几个人的关系可密切了。我跟蒋介石算是见过几次面，国民党在广州开中央全会的时候见过。我是一个国民党，是个跨党分子，我又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又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那个时候，我们几个人都参加了，我们的总理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的代理党代表。林彪同志就不用说了，他是蒋介石的学生，他在黄埔读了 9 个月。在中国，老一辈的人没有跟他打过交道的很少。

林彪：我也是一个跨党分子。

毛泽东：国民党的党部甚至都是我们帮他组织的。没有共产党的帮助，国民党就不可能北伐。那时，在北方，在黄河一带地区，他国民党连党都没有，党部都没有。他是靠共产党帮他组织。

……

黎笋：最近，尼克松宣称说，在过去 190 年里美国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意思是他这次也不愿意被越南打败。

毛泽东：没有被打败过？

黎笋：实际上他被打败好几次了。在中国，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抗法战争中，他 给法国人开支百分之八十的军费，结果他仍然被打败了。

毛泽东：就是呀！你刚才讲的第一点是不要怕帝国主义。究竟谁真怕谁？小国，部分小民族存在这个问题。他慢慢试，试几年就理解了。

……(毛回忆并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毛泽东：……那时我还告诉你，如果美国人不到中国边境来，你们不请我们去，我们是不出兵的。

黎笋：我们也这样想。当我们还有能力打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大后方”更稳固一些。在我们越南人民打美国人的时候，中国是我们的“大后方”。因此，我们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命令，即使我们的飞机受到攻击，也不要到中国机场降落。

毛泽东：可以嘛，我们不怕。如果美国空军要来打越南空军的“庇护所”，就让他来嘛。

黎笋：虽然我们下了这样的命令，但我们仍然需要依靠你们的支持。那时，你们派来的几个师在越南同样打美国飞机。

毛泽东：就是嘛。美国人就是怕打，他们没勇气。你们可以谈判，我不是说你们不能谈判，但是你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打上。两次日内瓦会议是谁破坏的？你们和我们都是老老实实遵守(会议协议)，但是他们不干嘛！不干更好。

因此，甚至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他发表公开讲话时，也不得不说只要召开国际会议，就必须同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商量。他们现在的领导人好多我不熟悉，不认识。柯西金我认识，并且同他谈过话。西方报纸总是造他们的谣，说他们的领导层怎样不和。我也闹不清楚。听说老百姓对柯西金这位领导人比较感兴趣。

黎笋：我们也听说了。

毛泽东：你们也听说了？我看斯大林又活起来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倾向是革命，包括整个世界。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

大家都不敢下手。主要是两个大国，现在都说三大国，中国不算。中国的原子武器还刚开始研究，还在研究阶段，这有什么可怕呀？中国人多，因此他们怕中国。但是我们也怕，因为人多要吃饭，要穿衣，那个问题可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也研究节制生育，使人口少一点。

……

黎笋：我们能够继续我们的战斗，是因为毛主席讲了，7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美国害怕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侵略人家，我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你去几十万海、陆、空军欺负越南人民，中国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哪个法律上有这条规定？

黎笋：美国人说他可以动员1千2百万军队，可是他只能派50万军队到越南，如果越过了这个界限，他们就害怕了。

周恩来：中国人多他也怕。

毛泽东：人多还有一个不怕，打就打。横竖我跟你没有关系。你占了我的台湾，我没有占领你的长岛[5]。

注释

[1] 黎笋（一九○七年四月七日—一九八六年七月十日），时任越共第一书记。在胡志明逝世后，黎笋取得了北越的领导权并随后统一了越南。毛泽东同志逝世后，黎笋一改本篇谈话中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国毕恭毕敬的态度，转而走向亲苏反华的道路。一九七九年越军入侵我国，导致了我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2] 北部湾事件，也作东京湾事件，一九六四年七月底，美国军舰协同西贡海军执行“34A”行动计划，对越南北方进行海上袭击。八月一日，美第七舰队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为收集情报，侵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海，次日与越南海军交火，击沉越南鱼雷艇。美国政府迅即发表声明，宣称美海军遭到挑衅。四日，美国宣称美军舰只再次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击，即所谓“北部湾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于五日出动空军轰炸越南北方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七日，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在东南亚使用武装力量。这一事

件是美国在侵越战争中推行逐步升级战略，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的重要标志。二〇〇五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表报告，承认一九六四年八月四日当夜越南人民军当夜对美军“沒有攻击”。北部湾事件是美国为入侵越南捏造的。

[3] 西哈努克，柬埔寨国王，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开辟的通过柬埔寨到达南越的运输线，日夜抢运军援物资。越南抵抗部队并深入柬境内十余公里，从那里出发，频繁袭击南越军队和美军。美国对西哈努克亲王坚持和平、中立政策，反对美军入侵越南的态度深为不满，不断指使南越当局对柬埔寨实施战争威胁，向西哈努克施加压力，最终于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乘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之机，策动柬政府中的右翼势力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建立了以朗诺为首的政权。政变后，他长期寓居北京，一直受到元首待遇，并于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三日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并任主席，发表了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领导民族解放斗争，五月在北京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任阵线主席和国家元首。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金边解放后回国，担任民柬国家元首。

[4] 韦国清，壮族，开国上将，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5] 长岛〔Long Island〕是一位于北美洲大西洋岸的岛屿，行政上属于美国纽约州的一部份。长岛长一百九十公里，宽约二十到三十公里，它从纽约港伸入北大西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1]，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2]，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3]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

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注释

[1]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原柬埔寨王国首相兼国防大臣、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朗诺和副首相施里玛达在美国的策动下，乘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国外的时机发动政变，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立郑兴为柬埔寨国家元首。从而使柬埔寨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亲美派朗诺—施里玛达—郑兴集团手中。

[2]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在中国、老挝和越南边境地区举行，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国四方领导人各自率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扩大对越南和老挝的侵略战争，在柬埔寨发动政变，重申四方领导人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严正立场，号召印度支那人民团结起来，捍卫民族权利，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使印度支那成为真正符合三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愿望的独立和平地区。

[3]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现代化武器吓不倒人民

（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埃米尔·波德纳拉希率领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国务委员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小国只要能反击，大国就怕，小国如果不反击，它就不怕你。你看越南、柬埔寨、老挝嘛，他们也没有坦克，也没有飞机，他们就是用轻武器打，能够打下飞机来。

过去，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出现坦克，那个时候吓得不得了。现在不同了，什么坦克、什么空军这一套，吓不倒人民。我们现在在准备。如果敌人把我们的空军搞光的话，我们就是靠步兵。如果你占领我们中国一半，我们还有一半。如果你占领我们中国的交通要道、大城市，我们还有乡村、中等城市、小城市。第一条，我们没有打你嘛，而是你打我们嘛。第二条，这很能锻炼我们的人民，二十年没有打仗了。你打我就打。我所讲的打是打防御战。我们现在到处修地洞，到处修地道。

同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马哈古卜谈话纪要（节录）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马哈古卜部长说，在英国还没有完全从苏丹撤走前，美国又进来了。但是由于人民的团结和斗争，英国的星辰已经落下去了，美国的星辰也要落下去。

毛主席对苏丹朋友的这个讲话表示赞赏。毛主席说，这个世界上怕英国人、怕美国人的很多，这几年慢慢地都不大怕了，并敢于说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些话。你们苏丹人民了不起啊！

毛主席说，对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统治者是要分开来看待的。我对美国人民是寄予希望的，就是美国的工人以及其他穷苦的人。他们总有一天要站在你们和我们这个战线的。

毛主席说，美国独立时，只有三百多万人口。那时英国有近两千万人口，是全盛时代，可是打了败仗。打了八年啊。

还不就是一些比你们现在还要差的武器。你们苏丹有一千四百多万人口。

马哈古卜部长说，人民已经起来，毛主席的教导在全世界已经传播开了。人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理解了毛主席的话，懂得真理应当属于自己，所以人民一定会起来。

毛主席说，中国的经验可以作参考，要结合各国自己的经验。我们也是找外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经验，譬如巴黎公社的经验，十月革命的经验，等等。

毛主席说，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

可以进口外国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

员。但是要自己搞。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

马哈古卜部长感谢中国向苏丹提供友好援助，特别是在谈判中贯穿的友好精神。

毛主席说，物质援助，要到了手，见了效，那才算数。不到手，工厂没有建立起来，那不能算数。你们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没有培养出来，中国人不撤走，也还不能算数。那末，什么叫帝国主义呢？它就是不帮助人家建设的，它赖着不肯走，那没有办法，只好革命了。

毛主席说，非洲可沸腾起来了，闹起来了，大闹起来了！

半个多世纪了，五十多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培养了反对它的人，另外培养一批走狗拥护它自己。

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世界人民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这个美帝国主义专门团结那些各国人民认为是不好的人。它喜欢那类人作朋友，我们就喜欢我们这类人。

在讲到帝国主义对非洲民族主义国家施展阴谋活动时，毛主席说，帝国主义是要对非洲各国人民的领袖和著名政治家进行暗害阴谋活动的，要提高警惕。

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和赞比亚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英联邦像是个俱乐部，中国过去也是这个俱乐部的。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顾不了了，把中国让给了美国。所以，日本投降之后，美国帮助蒋介石打我们。而我们这些人就被叫做共产党“匪徒”，跟普通的土匪不同，是共产党“匪徒”。这样，我们就没有资格进那个联合国。哪有“匪徒”能够进联合国的?我们也想了一想，我们这个国家也算个联合国嘛! 我不到你那个联合国去也可以嘛!我们这些人，帝国主义都是不高兴的。无论是你们的两位总统也好， 还是我们这些人也好，都不大中它们的意。那有什么办法呢?你们到北京来也没有通知英国、美国吧?

实际上现在世界上帝国主义的日子不大好过。它们怕第三世界，既怕你们这些人，也怕我们这些人。要破除迷信，不要迷信那个什么帝国主义。当然，我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都要反对，也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不可以学习，而是说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的迷信，对它们那套欺骗，要破除。要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这种迷信不容易，它在一些人中根深蒂固。你看，帝国主义多了不起，它们有那么多原子弹、氢弹，飞机到处飞，海军到处跑，到处占领别人的国家，比如美国出兵柬埔寨。但它们那个办法是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做法。英国不是到处占领吗?现在它比较乖乖的了。

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法国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现在这个世界上不大安宁。你热爱独立是一件事，别人总要干扰你又是一件事。上回我就跟你们讲过，世界上就有那么少数几个国家,喜欢干涉别国的独立。你们说希特勒[1]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法国独立了，中国也解放了。但现在世界还是不安宁啊!当然，现在没有人侵犯你们法国；除了台湾以外，也还没有人侵犯中国。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要准备打仗，不是自己打出去，而是当别国打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消灭它。现在已不是几十年前那样，谁人都可以在中国头上拉屎拉尿。

我劝你们除了搞“马其诺防线”[2]之类以外， 搞原子弹以外，还要准备搞什么民防那一套。你晓得世界怎么变化?我们又不是那几个大国的参谋长。你们也是受别国的气的。

欧洲现在的形势，不仅你们，就是英国，要想打一场战争看来是困难的。所谓同盟国，现在也难说。它们在有一些问题上谈得来，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谈不来。我们之间谈就比较容易，跟美、苏它们谈就比较困难。你们法国没有占领我们中国什么地方，我们中国也没有占领法国的科西嘉岛。

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

注释

[1] 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首领。一九一九年参加德国工人党(次年改

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后成为该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2] 马其诺防线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为防备德国进攻，在东北部边境构筑的防御阵地体系。以其主要设计者、当时的陆军部长马其诺的名字命名。一九四○年五月，德国军队从比利时绕过这条防线攻入法境，使防线失去作用。

我的一点意见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大量哲学著述中的封笔之作。这部著作，主要批判的是以“天才论”为集中表现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一九七〇年8月23日—9月6日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在林彪及其反党同伙的支持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匆忙搜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竭力鼓吹“天才论”，在设立国家主席和“三个副词”问题上，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的方式，企图分裂党。毛泽东同志这篇著作，就写在陈伯达搜编的语录上。这篇著作揭露了陈伯达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却根本不懂马克思的反动本质，并且在适当的程度上，不点名地警示了林彪及其同伙。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1]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

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2]，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

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3]。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4]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5]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6]，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7]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8]，肯定帮不了他多少

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9]我同林彪[10]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已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　泽　东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注释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林彪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七〇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被隔离审查。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陈伯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2] 指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今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写的序言中评价该书的一句话："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3] 陈伯达摘录的这五条分别是：1．"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对马克思对于各个作家的评论的评价）2．"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3．"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4．"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列宁《预言》中对恩格斯谈未来世界大战一段话的评价）5．"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

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列宁《怎么办？》）

[4] 三次庐山会议，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在庐山先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十六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5] 彭德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定为所谓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

[6] 指《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共七十条，简称工业七十条。

[7] 指唐代诗人李白。

[8] 指陈伯达摘录的毛泽东《实践论》中的一段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9] 在毛泽东同志手稿中，这后面还加括号写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八〉条，如获至宝。”中共中央转发《我的一点意见》时，删去了引号中的这句话。陈伯达摘录的林彪八条讲话分别是：1．“毛主席个人天赋很高。他理解力很强，记性很强。他理解力很强，无论读书的理解力，或对事物的理解力，从现象看本质的能力，都很强。他的头脑是非常清楚的，天资很高。”（一九五九年九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2．“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3．“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4．“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责任感，最现实的革命精神。”（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接见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时的讲话）5．“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关于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讲话）6．“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关于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讲话）7．“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8．“不能离开中心。中心就是太阳，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旋转，一切工作围绕太阳转。毛主席就是太阳。毛泽东思想就是太阳。”（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九日接见总政治部副部长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10]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

在讲到高级干部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毛主席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1]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时，毛主席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

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在讲到党内外团结问题时，毛主席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

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

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

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注释

[1] 指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今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写的序言。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搜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引用了恩格斯写的这个序言中的一句话：“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对抗美援朝决策的回顾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时谈话的一部分。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当初你们的军队退到北边，这个损失也相当大，剩下的力量不很多。那个时候，我好像记得跟你们说过，你们现在更强了，比过去强。

金日成（以下简称金）：是这样讲的。

毛：那时候，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最后还是决定了。你不帮助，怎么办啊？不仅你们没有发言权，我们也没有发言权了。

过去我曾经同跟着你们军队到过南朝鲜的中国新闻记者谈过话。我问他，究竟美国的炮火和空军杀伤力哪个大？据他说，主要杀伤力还不是空军，还是陆军。我说这样就好办了，因为我们没有空军，有的只是陆军。

再有呢，那无非是进去了又被美国人赶了出来。那我总进去跟你打过一回了吧。被你们赶出来回到鸭绿江以西，那以后你美国人占领了鸭绿江以东，他总是不放心，我们总还可以进去嘛。以后我们两家合起来，组织游击队，再可以钻进去占领鸭绿江以东嘛。你如果按兵不动，以后就没有理由了。

可惜那时候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军就好了。这就是那第一批。那些人有百分之二十的战士、干部是积极的、愿意打的。这是根据他们当地的调查。动员了以后，他们作了一个调查，说有百分之二十的战士、干部是愿意打的，有百分之二十是不愿意打的。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那是在开始的时候。

毛：除了这百分之四十，还有百分之六十，是打可以，不打也可以，随大流。我说这就可以了嘛。因为有百分之六十可以随大流，可以赞成打，再加上百分之二十愿意打，这不是百分之八十了吗？就可以打了嘛。又把国际主义跟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你如果不提“保家卫国”，他也不赞成啊。他说，只为了朝鲜人，不为中国人还行啊？所以我说，是为了保家卫国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卫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保，那个地方去卫。

金：是的。当时提出这个口号很好，很正确。

毛：你不去支持朝鲜人民保卫朝鲜，还能保自己的家，卫自己的国？这样战士就能理解了，加上头一仗又打胜了。

所以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1]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说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所以亚洲人同美国人打，可以说是有了一些经验的。至于苏联那时候不想打仗，也是有理由的。他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损失太大，单是壮丁就两千万。恐怕不单是壮丁，因为妇女不包括在壮丁之内。

注释

[1] 莫洛托夫，一九五〇年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对吴法宪、叶群检讨信的批注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十五日）

一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办事组[1]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2]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什么伟大谦虚[3]，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这句话[4]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

二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

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

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注释

[1] 指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当时由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
[2] 李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3]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曾问他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没有。毛泽东同志在其中的“伟大谦虚”四个字下面划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4]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他在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七日晚上看到陈伯达的发言稿上“造谣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毛泽东同志在这句话下面划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毛泽东同志与斯诺的这次谈话，基本回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年来的国内形势，分析了几种不同的个人崇拜，同时首次完全坦露了对刘少奇采取批判的动机。

斯[1]：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主席：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主席：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 July 和八月 August 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2]。

斯：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主席：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3]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斯：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

毛主席：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

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斯：每个州里面还起码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

毛主席：可讨嫌了！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4]，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5]，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

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

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6]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你说，我的政策正确，五年之前就决定不出兵，所以尼克松不打中国。我说不是。我们在朝鲜出了一百万兵，名曰志愿军。麦克阿瑟[7]打定主意要轰炸满洲，就是东北，结果杜鲁门[8]就把他撤了。这个麦克阿瑟后头又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也有不变的，比如我们两个就不变。

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

究社会。

斯：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

毛主席：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

斯：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主席：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还是很不错，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较。

毛主席：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

斯：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主席：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主席：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主席：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啰，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

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

文化普及。

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9]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

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三十五年啊！

那时落后得很，只有八千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汇合。汇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才闹了两万五千人。我说是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比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10]路线被批判了。

斯：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

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

毛主席：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主席：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

斯：一九七二年。

毛主席：一九七二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11]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12]，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13]。尼克松当过副总统[14]，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

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三亿人，都在那里造反。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

斯：我同意主席说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一个美国要保持权利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十五亿，再加上印尼、日本等，亚洲的人口恐怕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它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了。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在生产能力方面能够赶上日本，那末中国同日本加起来，其生产能力会远远地超过美国和欧洲。

毛主席：这个要看政策。你们美国的华盛顿[15]一百九十多年前革命的时候，只有三百万人口，但能够打败拥有近三千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嗵！嗵！嗵！从一七七五年起，打了一年以后，到一七七六年才开了一个十三个州的会议，

才正式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16]兵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财政困难得很，发票子，但是打败了英国人。

你看我们呢？我们，你那时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据地都丢了的嘛，只有三万人不到，一块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方。噢，还不到呢，因为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占领呢。蒋介石可厉害了。以后马歇尔[17]帮助他，就是杜鲁门时代。

你看中国人那个时候，稀稀拉拉，只有两万多兵，保安为根据地。这次你又去看了，那时候只有二百户人家。

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

斯：你想到了。

毛主席：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引了这段话，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

斯：我过去报道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加以引用。

毛主席：就是要宣传这个。没有蒋介石，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

斯：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18]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

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主席：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

斯：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主席：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毛主席：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19]不好，勃兰特[20]也不算怎么好。

斯：我记得你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主席：就是啊。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斯：我想向你简单地介绍我的经历，作为背景材料，可能你会感兴趣。……[21]我的经历在我的这一代人中间可以说是典型的，即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毛主席：但是你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后头还是蒋介石帮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当然，还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个[22]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共产党组成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代表，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这十二个人中间，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23]一个，毛泽东一个。

斯：我认为，你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很重要的。

毛主席：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

那个讲堂上讲课的方法我不赞成。你先生写了讲义，发给学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课堂上问先生。学生往往是调皮得很。如果学生出一百个题目，先生能答出五十个就很不错了。剩下那五十个题目怎么办呢？就说：我不懂，跟你们一样。然后大家研究，你们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说："下课！"你看，多好啊！我讲课就是这样，不许记笔记。如果想睡觉就打瞌睡，想跑就退席。这个打瞌睡实在好。与其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又听不进去，不如保养精神。

毛主席：你这个记者才不怎么样呢！何必当个记者呢？

写个什么书，出个什么名呢？你那本《西行漫记》是出名的。还有一本什么人写的书可以和你那个《西行漫记》相比的，是一个海员写的，他那时候在广州上了岸，看到了日本人的侵略。他可能没有到解放区去，叫作什么 Belden（贝尔登[24]）。

斯：噢，对了，我知道那个人，他现在还在。

毛主席：那个拉提摩尔[25]怎么样了？

斯：他现在也还在，他原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在麦卡锡[26]时期及以后的时期受到了迫害，现在住在英国。

斯：前两年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27]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

他们就没有能够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它。

毛主席：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28]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29]阻挠?

毛主席；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第二个是现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来也是湖南省的一个书记；第三个是甘肃省的第二把手胡继宗。

斯：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主席：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30]。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主席：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31]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32]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是新版吗?

毛主席：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

斯：那末，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主席：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33]搞出来了。

斯：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主席：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就是《炮打司令部》[34]那张大字报吗?

毛主席：就是那张。

斯：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主席：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 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主席：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35]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主席：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 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 law（法律），是喜欢那个 order（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主席：新宪法要写上。

所以我说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又很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主席：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

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36]，不行；树立瞿秋白[37]，不行；树立李立三[38]，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主席：不怎么样。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主席：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收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毛主席：你回美国去，我希望你作点社会调查研究。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资本家、各个阶层作调查，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情绪。去调查一

个工厂，我是说中等工厂，千把人的，用一个星期够了吧?

斯：够了。

毛主席：如果调查两个工厂也只有两个星期。调查一个农场，一个星期也够了吧?

斯：够了。

毛主席：调查两个农场也是两个星期。加起来四个星期，也只有一个月嘛。再调查两个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大学，半个月时间。

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的。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于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好。这是我几十年搞调查研究的经验。当个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谈话很不容易。谁跟你谈啊? 他们怕你调查他的秘密。跟工人、农民交朋友很不容易。你们这些人跟知识分子、小官僚、小资产阶级交朋友比较容易，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不容易。不信，你试试看嘛。如果你有决心，你就试试看嘛!

毛主席：你到处跑跑嘛，在美国、欧洲、中国之间到处跑跑。以后你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欧洲，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中国，到处都住住，四海为家嘛。

斯：不过我还得要工作呢。

毛主席：我看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欧洲就是工作。

斯：我会努力的，但是结果如何还难说。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的美国处在更大的动荡之中，主要是因为越南战争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为今天的青年人受到了比他们的上一辈更为良好的教育，国家的科学也在发展，而行政机构所执行的政策和

他们的言谈之间的差距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以至于大多数公众对他们所认定的行政机构失去了信任。

毛主席：就是不讲真话。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

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还是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评嘛。

斯：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

毛主席：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

斯：那是。

毛主席：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

斯：俄国到底要干什么？

毛主席：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主席：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大拇指比划），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主席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你看。

斯：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毛主席：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末是谁

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

后头柯西金[39]到北京，我见了他。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40]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

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斯：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41]

毛主席：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

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

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工人阶级好也好在这里。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斯：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来。

斯：粮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毛主席：过去叫南粮北调，现在各省市逐步在解决。

再一个就是北煤南运，说是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还有江苏的南部没有煤炭，所以要从北边运来。现在都有了。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有这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你自己去找嘛！结果到处去找，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去找，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

斯：我这次来，注意到有很大的变化。

毛主席：就是这个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 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

就是S形。

斯：有时候还要走O形，然后再设法冲破这个圈，重新开始。

毛主席：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注释

[1] 即埃德加·斯诺，美国作家、友好人士，同情中国革命、尊敬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访华。

[2] “五·一六”，原是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动小组织。他们利用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反动传单。这个反动组织后来很快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解决。

[3] 指斯诺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发表的《同周恩来的谈话》（国际部分）。

[4] 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他在《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明了生物的演变和人类的起源。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他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等著作中，提出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把太阳系的形成看成是物质按其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

[5] 摩根，今译摩尔根，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他在《古代社会》中第一次论述了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存在与发展的规律以及婚姻、家庭形态的历史演变等，并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三个时代。马克思对该书作过详细摘录和批语。恩格斯也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用其大量资料，阐述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赞誉他“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6] 尼克松，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一九七二年二月首次访问中国。访华期间就中美关系问题同中方举行谈判，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7] 麦克阿瑟，一九五〇年六月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侵朝战争，并极力主张进攻中国。一九五一年四月被解除一切军职，仅保留五星上将军衔。

[8] 杜鲁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总统。

[9] 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于八月一日在日内瓦举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复会。迄至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10] 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期间，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的这条王明路线，无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在政治、军事以及城市和农村工作中

实行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和策略；为了强制推行这条错误路线，在组织上以我为核心，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宗派主义手段，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遭受十分严重的损失。

[11] 艾奇逊，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国务卿，和杜鲁门一起制订了不承认中国和援助台湾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

[12] 指艾森豪威尔，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任美国总统。

[13] 肯尼迪，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当选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遇刺身亡。

[14] 尼克松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期间连任两届美国副总统。

[15] 华盛顿，一七七五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被推选为大陆军总司令。一七八三年迫使英国签订《巴黎和约》，正式承认美国独立。一七八九年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16] 毛泽东这句话中所说的年份有不准确的地方。一七七五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同年五月，北美十三个州参加的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对英国进行武装革命的“宣言”，把北美民兵整编为大陆军，六月即一致推选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

[17] 马歇尔，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任驻华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

[18] 西哈努克，一九六〇年当选为柬埔寨国家元首。一九七〇年朗诺发动政变后，西哈努克在北京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任民族统一阵线主席。

[19] 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20] 勃兰特，当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联邦德国政府总理。

[21] 中共中央文件上原文如此。

[22] 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党员只有五十多人。

[23]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24] 贝尔登，美国进步记者。一九三三年以海员的身分来到中国，九年后回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第二次访问中国，在华北解放区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后，写了《中国震撼世界》一书，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革命。

[25] 拉提摩尔，又译拉铁摩尔，美国东方学家。一九四一年七月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名义被派驻中国。一九四二年被召回国，任美国新闻处中国部主任。后任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一九五二年遭参议员麦卡锡弹劾。一九六三年赴英国，任利兹大学汉文教授。

[26] 麦卡锡，一九四六年起任美国参议员，以反共著名。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他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并利用其他机构，对许多人和组织机构进行所谓的“忠诚调查”，采取非法审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在美国国内制造恐怖。

[27] 《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一九六〇年底完成，一九六一年初开始上演。

[28] 指姚文元执笔写成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北京各大报纸开始都没有转载。《人民日报》十一月三十日才予以转载，并加了经周恩来修改的按语，强调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29] 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邓小平等人坚持派遣工作组，实行白色恐怖、干扰群众运动、转移斗争大方向。

[30]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两国决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确定两国将在三月一日互派大使。

[31] 指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中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印发了这个文件。

[32] 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原载一九三九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八十一至八十四期，同年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一九四九年经作者校阅并作了若干修改后，由解放社（人民出版社的前身）出修订第一版。一九六二年作者又校阅了一次，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将原来的两部分调整为九节，在《红旗》杂志第十五、十六期合刊上重新发表，并由人民出版社出修订第二版。

[33] 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

[34] 见本卷第 99 页。

[35] 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36] 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大革命失败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死在四川江津。

[37] 瞿秋白，见本卷《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注释[1]。

[38] 李立三，见本卷《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注释[1]。

[39] 柯西金，当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40]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41] 中共中央文件上原文如此。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

（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

*毛泽东同志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到外地巡视，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进行了多次重要谈话。本篇是中共中央整理印发的纪要稿，本篇之后的几篇是根据各类文献集和书籍中所载的毛泽东同志的详细谈话记录，与本篇中有些部分有重复之处。

毛主席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1]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2]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3]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4]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5]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6]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7]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

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8]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9]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10]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11]，想夺权，没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12]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13]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14]的斗争。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15]，还有李雪峰、郑维山[16]。

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17]。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18]，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19]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20]，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21]。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22]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23]，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

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24]，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25]。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26]，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谈[27]，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28]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毛主席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29]，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

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毛主席说，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30]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31]，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32]，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

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要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毛主席说，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

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33]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34]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

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35]，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

注释

[1] 陈独秀，见本卷《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注释[36]。
[2] 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3] 刘仁静，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后参加托派。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党。建国后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从事翻译工作。一九八七年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同年八月因车祸去世。 彭述之，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在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兼《向导》主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二七年五月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因与陈独秀等人结成“左派反对派”，进行反党的小组织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成为托洛茨基分子。
[4] 瞿秋白，见本卷《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注释[1]。
[5]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毛泽东就曾在瞿秋白等主持的八七会议上讲过“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从而在中央领导机关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十四日印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湖南省委却把它“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并说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决定撤销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
[6]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指出：应当为瞿秋白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7] 李立三，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8] 罗章龙，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
[9] 王明，见本卷《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注释[10]。
[10] 张国焘，见本卷《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注释[1]。
[11] 高岗，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原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见本卷《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注释[1]。
[12] 彭德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黄克诚，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张闻天，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周小舟，原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五九年八月，他们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定为

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13] 刘少奇，见本卷《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注释[29]。

[14] 指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揭发和批判了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在会上也受到了批评，挫败了林彪有计划有预谋地抢班夺权的阴谋。

[15] 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吴法宪，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邱会作，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中央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16] 李雪峰，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一政委。郑维山，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华北会议前期由他们共同主持。会议的最后一天，即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他们被宣布“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为他们平反。

[17] 周恩来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１．讨论修改宪法问题；２．国民经济计划问题；３．战备问题。

[18] 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

[19] 见本卷第 290-292 页。

[20] 指林彪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21] 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发言的记录。

[22] 陈伯达，见本卷《我的一点意见》注释[1]。

[23] 指陈伯达等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搜集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毛泽东在会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予以批驳。

[24] 即本卷第 47 页《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太上皇》和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同志《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军队要谨慎”指示情况报告的批语》。

[25] 指毛泽东同志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在周恩来同志关于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情况等问题的报告上的批语《关于批陈整风运动重点在批陈的批语》。

[26] 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这期简报登载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讨论林彪讲话的情况。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宣讲了经林彪审定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简报称林彪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大家衷心赞成“在宪法上，第二条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

[27] 指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一百四十三人也出席了会议。

[28] 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

[29] 指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

要》。

[30] 欧仁·鲍狄埃，法国无产阶级诗人，巴黎公社活动家，《国际歌》歌词作者。一八八七年十一月逝世。

[31] 指列宁一九一三年一月写的《欧仁·鲍狄埃》一文。

[32] 即《我的一点意见》。

[33] 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

[34] 彭，指彭真，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罗，指罗瑞卿，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陆，指陆定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杨，指杨尚昆，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打成“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彭真彻底平反的文件。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为罗瑞卿彻底平反。一九七九年六月八日，中共中央转发中组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陆定一平反。

[35] 指林彪的儿子林立果。

在武昌、长沙、南昌等地的谈话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七日-八月三十一日）

一 八月十七日与刘丰、刘建勋、王新、汪东兴的谈话

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

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 81 个人搞了个“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这个组织没搞多久，垮台了。以后变为托派了。其中有个叫刘仁静的，这个人比我年龄小，现在住在北京，他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去见了托洛茨基。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

毛又说：六届五中全会，是在江西瑞金开的，他们都到了中央苏区了。我是政治局委员，不让我参加会，让我当苏维埃主席，不让我在军队工作，让我去做群众工作。

毛说：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是周总理指挥的。

毛接着说：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王明错误的路线。王明夺权四年之久。上海的中央移到中央苏区去了，陆续跑过去了。先是周恩来，然后是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他们去的。到中央苏区，李维汉去得早，他那时是组织局长。然后是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懋功会合以后，张国焘搞政变，成立伪中央。全国胜利以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

毛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

（在座的人纷纷检讨自己犯了错误。）

毛接着说：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毛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毛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

毛接着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毛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

毛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

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毛继续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

毛接着说：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

养六十岁以下的人、三十岁以上的人。

二 八月二十五日与华国锋、汪东兴的谈话

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简述了党史，说：中国也怪，中国党没有分裂。陈独秀 81 个人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转为托派。有个刘仁静，他见过托洛茨基，此人比我年龄小，现住北京。罗章龙另立中央，没有成功。此人现在湖北当教授，是浏阳人，现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是犯路线错误。王明搞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即第四次、第五次全会。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推翻了王明的领导，张闻天负总责，实际上张闻天当召集人，我管事。正式管事是遵义后十年，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才当选主席。出了两本书，《两条路线斗争》、《六大以来》，他们才解除武装。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中央，也没有搞成。高、饶想夺权，没有夺成。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

毛又说：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

毛接着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六号简报时）毛说：这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在谈到解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的问题时）毛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毛还说：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千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千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

最后，毛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

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三 八月二十七日与华国锋、卜占亚、汪东兴的谈话摘要

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

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

毛接着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

（毛讲完这段话，带着几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目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

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

四 八月二十八日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的谈话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

毛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

毛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毛把话题转到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毛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

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毛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就不服气，要向中央写报告。我说不要写，开除有么事要紧。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代表了。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到后来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后，成立四军了，朱德同志当军长，陈毅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在闽西开会，叫我下台。后来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再有就是李立三搞了那么一阵子。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了权，搞了四年。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1935 年 1 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

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问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又说：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坑。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

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转向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莫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问韦说：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算第四。

（刘兴元做工作汇报）毛听完后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讲到延安整风时）毛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讲到打锦州，毛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

毛又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

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毛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毛沉思一会，把谈话转向“天才论”，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毛接着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

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

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进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毛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五 八月三十日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和汪东兴的谈话

（当谈到林彪一伙人时）毛说：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在谈到党的状况时）毛说：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

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是天天打仗，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 81 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样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又说：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

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

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1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毛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

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

人幸灾乐祸。

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谈到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毛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

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 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

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毛看了看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说：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毛接着谈起中苏关系）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又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拉是拉了他们一下。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毛最后说：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六 八月三十一日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的谈话

（毛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陈独秀搞分裂，有 81 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

毛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

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

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毛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

在杭州、上海、丰台等地的谈话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九月十二日）

一 九月三日在杭州与南萍、熊应堂、陈励耘、汪东兴的谈话

毛说：那份简报（指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毛又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在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时）毛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再次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又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毛再次讲到他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态度），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毛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毛又谈到军队问题）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谈及北京军区的情况）毛说：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三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毛再一次说：对林要保。

（同时，又批林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毛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二 与许世友、王洪文的谈话摘要

毛主席问许世友说：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许世友回答说：我去看农场了，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毛主席说：去那么远了呀。

毛主席批评许世友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

（许世友接着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毛主席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

（许世友接着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去游过苏北。）毛主席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

毛主席再次给许世友打招呼：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

毛主席回到谈话的主题上来，他说：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都解决了呀？

毛主席问了几个问题之后说：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耐心地等待嘛。

毛主席接着说：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

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

（许世友诚恳地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毛主席问他：我有什么指示呀？

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２４、２５、２６三天嘛！（许世友坚定地回答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

毛主席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许世友当时哈哈地笑了。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

毛主席说：谁说这个论“天才”的语录是中央搞的呀？当时我们发了语录没有呀？哪一个文件上说发了语录呀？哪一个文件上写有这几条语录呀？“天才”的语录是林彪一伙人内部搞的，别人都没有看过。

（王洪文接着说：六号简报，我们一看到就火了。）

毛主席问：你为什么一看到就火了呢？

（王洪文说：简报里有一些话有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在北京讨论宪法时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厉害。当时有人提议设国家主席，有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毛主席的意见，可是他们不听，还要坚持他们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毛主席问王洪文说：那你对简报的性质有什么看法？

毛主席说：这个简报现在还没有做结论，这个结论将来由中央来做。我认为是反革命简报，起码如你讲的是有错误的简报。为什么有错误的简报要在这个时

候发呢？为什么有的同志发了言，登简报，又不先让本人看呢？毛主席接着说：听了你们的意见，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捣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是搞分裂。我讲话一句顶一万句？在这个问题上，我看连一句也不顶。不是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三 九月十二日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汪东兴的谈话

（毛先问李德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李谈了阿党对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态度和意见）

毛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怕美帝从亚洲撤出来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帝拖住。他们（指美国）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要撤军。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

（接着，毛又谈起党的历次路线斗争），毛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渔吗？纲就是串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八·七”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81 人签名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说我们是坏人，红军是破坏分子，以后他们就搞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后头就是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1928 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的，李立三神气起来，搞了三个月，那时总理还未回来。李立三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李倒台是在三中全会。王明倒台是在遵义会议。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把总理封为调和主义，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不舒服，结果基

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五十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

（毛谈了历史上有人多次搞分裂，但都未成功，然后说：）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

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

（毛对李德生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

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

（毛对着汪东兴说）他沾了一点边，在一千多人的会议上作了几次检讨。

（汪说：正式地做检讨是三次。）

（毛在谈到汪东兴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做检讨时说）只有七千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五个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毛问）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

（纪登奎回答说：算！）

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

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谈话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八日）

一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小唐[1]呀，密斯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

周恩来：主席本来指示……[2]

毛泽东：那是老皇历喽，不做数喽。

周恩来：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3]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毛泽东：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4]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5]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周恩来：就让黄华[6]作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

毛泽东：黄华到加拿大当大使不到四个月，现在就调走，人家可能不高兴咧。

周恩来：做做工作，加拿大政府会理解的。

毛泽东：好，那就这么办。

毛泽东：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7]，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8]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

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佛朗哥[9]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四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十九个，非洲国家二十六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七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一百三十一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七十六，十七票弃权，反对票只有三十五。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周恩来解释说：在会场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

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0]

一九五○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11]跟伍修权[12]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

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

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

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就是这次同基辛格[13]谈公报[14]讲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点历史，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战争，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一九四五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

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的许多话可以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

还要讲些什么，请总理考虑。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势如破竹”是晋主司马炎的“三军总司令”杜预讲的，此人号称“左传癖”。他带兵占领武昌，准备进攻东吴的首都建业。一个“二杆子”参谋向他建议，现在长江涨水，等明年再打。杜预说：“今兵威大振，如破竹之势，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有着手处也。”果然一举成功，“三分天下归一统”。做文章就要“势如破竹”，才能说服人。

曹操是大军事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称赞他：“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同时也批评他打过败仗。怎么批评的？请“参座”讲讲。

（叶剑英：“困于南阳，险于乌巢，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

“几败北山”，说的是夏侯渊战死以后，曹操争夺汉中的事。《后出师表》三处提到夏侯渊，另外两处是“夏侯败亡”，“夏侯授首”。夏侯渊是曹操的一员大将，曹操封他为征西将军，担任汉中的“警备司令”。刘备攻打汉中，夏侯渊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定军山，命令张郃守住东围。刘备“引蛇出洞”，先打张郃，夏侯渊分兵一半亲自援助张郃，被黄忠砍了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15]的拿手戏。你们看看《魏书》的夏侯渊传。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二十三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五十四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十七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当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三十五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二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16]

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针对教条主义者讲的，至今我认为

这句话还是对的。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要偏。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人的认识总是赶不上这种变化，认识总是落后于实际。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了解了主要情况、本质情况，就可以作出判断，就应该下决心。我一向反对下车伊始，哇哩哇啦的人，那样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光想当先生，不愿当学生。有的人打过仗，有点功劳，或者自以为有点功劳，吃饭、拉屎、睡觉、做梦，都念念不忘他那点功劳。说他没有什么功劳，他就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是低级趣味。这几年，部队有些人的思想被林彪搞乱了。济南军区提出“反骄破满”，提得好，我就让全军学习。我最近常讲，军队要谨慎，这是有的放矢。今年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仗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过去我们说以苏联为首，因为它是老大哥，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必要的时候让它牵个头，开会的时候让它当主席.但是它要掌握领导权，搞父子党，父子国，这就完全错误了。美国总是要别的国家听它的，这就是搞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应该被打倒。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内政，绝对不

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在座的同志知道吗?

周恩来：还没有告诉他们，主席谈完后，我们就到大会堂把文件[17]读给他们听，并介绍有关情况。“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暗害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纲领。

毛泽东：等一会把这件东西念给他们听。要尽快全文印发到全国各个党支部。

周恩来：这里面尽是恶毒诽谤主席的谰言，怎么能印发?

毛泽东：怎么不能？一个字都不改，原原本本发下去，让所有的党员所有的群众都知道。

毛泽东：安全问题很重要，去了上上下下要住在一起。

毛泽东（对周恩来）：马上打电报给黄镇[18]的助手，让他转告基辛格，我们的代表团在美国期间，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安全。如果出了问题，唯美国政府是问。

注释

[1] 小唐，唐闻生，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出生，唐闻生和王海容是毛泽东晚年的重要翻译。参加本次会见的还有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荣。

[2]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秘密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告诉周恩来：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在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此事时，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3] 熊向晖，时任周恩来总理的助理。我党历史上著名的王牌间谍，原名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一九三七年，奉周恩来指示打入国民党胡宗南部，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一九四七年五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建国后从事外交工作。

[4] 乔老爷，指乔冠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老爷”一号其源于六十年代喜剧影片《乔老爷上轿》。

[5] 尼克松，时任美国总统。
[6] 黄华，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
[7] 林彪（一九〇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主席明确表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并组织人企图压服中央，犯了错误，被毛主席识破，对其进行了警告和批评，并等待其认错达一年之久（从一九七〇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不料，其趁毛泽东同志南巡之时，妄图谋杀毛主席，事情败露后，九月十三日夜，林立果、林彪和叶群驾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后，林立果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发现，因此中央认定，林彪叛国。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8] 指吴旭君，毛泽东的护士长，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二十一年，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日夜坚守在护理毛泽东同志的第一线，兼做部分国际问题秘书的工作。
[9]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四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西班牙政治家，军事家，法西斯主义独裁者，西班牙大元帅，西班牙长枪党党魁。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佛朗哥军队占领马德里，推翻共和政府，对西班牙进行了长达三十六年的独裁统治。
[10] 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十一月十五日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11] 指乔冠华。
[12] 伍修权，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赴会，在联合国讲台上慷慨陈词，严厉驳斥美国及其同伙对我国的种种诬蔑和诽谤，痛斥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尊严。
[13] 基辛格，时任美国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访华，七月十六日中美双方公布了基辛格访华的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密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公告发表后，在世界上引起了震动。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基辛格公开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工作，与中方共同草拟联合公报草案。
[14] 公报，指后来尼克松访华时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简称《上海公报》。
[15] 谭鑫培、谭富英，谭家是著名京剧世家，谭鑫培是谭富英的祖父，京剧史上第一个老生流派谭派创始人。谭富英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四大须生之一。
[16] 这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晚八时，毛泽东主席约见周恩来总理、姬鹏飞、乔冠华、符浩、熊向晖、陈楚、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唐闻生、章文晋及回国述职的驻法大使黄镇、驻苏大使刘新权时的谈话。
[17] 这个文件指《“五七一工程”纪要》，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林彪之子林立果连同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秘密所站密谋。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林彪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但是可能逐渐削弱。“文人力量”（张春桥、姚文元等）正在发展，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代替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二是林彪“被人抢班”，三是林彪“提前抢班”。

他们提出两个办法：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直接干掉毛泽东，但毛泽东影响大、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和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林立果确定计划名称为“五七一工程”计划。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于新野执笔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原稿后来被缴获。根据“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等人共策划了八种手法杀死毛泽东同志，“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静火同志注：国防科委统一规定的地空导弹兵器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该纪要还恶毒地辱骂毛泽东同志是“暴君”“独裁者”，并提出“打着 B—52 旗号打击 B—52 力量”（B—52 指毛泽东同志），并规定“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该纪要后来被原原本本地印发到县团级以上干部手中。

[18] 黄镇，历任印度尼西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法国首任大使。自一九七一年起，黄镇奉命秘密同美国展开外交沟通，负责与美国代表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联络工作。

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节录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周恩来：武汉检讨还没有写出来。）

（此时叶剑英进来了）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1]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

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周恩来：后来杨成武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是树他自己的。（周恩来：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搞了一个讲话更厉害了，简直说得不象话了。）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一些人不能够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把污水尽往自己身上刷，我说，你不要讲了。（周恩来：万人大会斗陈毅，外事口的一些外国专家也参加了，当时搞不清楚。斗完后要把陈毅抓走，大会堂的服务员不让抓走。问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抓？服务员说主席叫保我们就保。）斗他的时候，向前向后三鞠躬，上汽车后又推翻了，又不承认了，说是你们逼我讲的。

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叶剑英答：当时我也不清楚。）廖汉生为什么要抓？（周恩来：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杨

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

你们如果有时间，鲁迅的有一本书是值得看看的。《准风月谈》的后记里，有曹聚仁写的一篇《文艺座谈遥领记》。曾今可要开文艺座谈会，请了曹聚仁没去，报上登出来，他成了发起人。曹就问龙榆生，那天的会是怎么开的，龙说：就是吃点点心、喝喝茶。曹聚仁说："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啦！"这件事，可见那时斗争的复杂。现在，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我看不一定。今天你们吃了我的茶，就是我的人吗？不一定。总理、康老都喝过他们的茶嘛！吃了他的茶，就是他的人，不要党，不要中央了吗？

《我的一点意见》写好后，第二天早晨总理、康老去找林彪，看了以后，他说同意了。《我的一点意见》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有人说，我不当主席，老百姓通不过。我说：我不当主席有十几年了嘛。我这个人，同你们吹一吹是可以的，要我当国家主席，天天去迎接外宾，迎来送往，什么国书啊，那一套，无非是催我见上帝。（叶剑英：主席很忙，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写出来。）和大家吹一吹就是了。

那些人整叶剑英的黑材料，我都看过，他们是步步升级，先是炮轰，后是打倒。后来他们看形势打不倒了，也就不打了。"红造"并不都是"五・一六"。整理的黑材料，有一条国民党报上的消息，说红军长征了，叶在江西投降敌人。他是跟着长征了嘛，你们这些老同志都是长征的，哪有那个事呢？

红军的传统历来不能自己打自己。（指张国华[2]）你就是王佐[3]部队的一个兵。（周恩来：后来是司号长。）王佐这个人无论如何是有功劳的，而且还加入了党。就是舍不得那个山头，吃不了苦。王佐这个人被彭德怀杀了，这就不好

了嘛！那有共产党的部队打共产党的部队？五军团的季振同[4]也不该杀。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你把解方[5]这样的人杀了干什么？（周恩来：那个王实味[6]也可以不杀。）不杀，现在多好。国民党抓刘少奇[7]、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8]、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活证据嘛。

注释

[1] “二月逆流”，见本卷 57 页注释[19]。
[2] 张国华，时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3] 王佐，与袁文才共同领导井冈山的绿林武装。毛泽东进入井冈山后，对他们进行了改造，部队进行了整编，但袁王部队和地方永新县委存在着很深的误会和矛盾，加上当地长期存在的土客矛盾，一九三〇年二月，永新县委盗用毛泽东名义将袁王二人骗至永新县城，利用彭德怀的红五军将两人杀死，袁、王被杀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残部无路可走，向国民党保安团投降，之后带领保安团攻打井冈山，井冈山就此失陷。后中央红军多次攻打，均因地势险峻而不能得手，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从此直到全国解放都一直是白区了。全国解放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就派人来为袁文才和王佐平反。袁文才儿子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王寿生一起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开国大典。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上井冈山时，特地将袁文才烈士的妻子谢梅香接到井冈山宾馆，亲切地称她“袁文嫂子”，向她表示亲切慰问，并一起照了相。
[4] 季振同，原任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十四师师长、七十四旅旅长。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与赵博生、董振堂等发动了著名的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红军第五军团，任总指挥。一九三四年八月，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被误定为反革命分子，入狱监禁。十月，长征前夕，被杀于江西省瑞金县叶坪镇。
[5] 解方，曾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参与第一至五次战役的指挥，并作为朝中方面代表之一参加开城停战谈判，回国后历任中央军委军训部副部长，越南停战谈判顾问，南京军事学院科学研究部部长、副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后勤学院副院长等职。早年留学日本，原为东北军部下，曾任张学良副官，在文革中被查出西安事变前后参加了张学良秘密组织的东北革命军人同志会，在一九四六年曾与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东北军旧部四十二人联名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张学良回东北，被定为“东北叛党集团”成员，几乎被判死刑，后被毛泽东和周恩来制止。
[6] 王实味，作家，在延安写了杂文《野百合花》，恶毒攻击边区生活，后被国民党利用宣传我党的黑暗，被定为托派分子，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期间，中央机关撤出延安，行军途中，因国民党飞机炸毁了关押王实味的看守所，战争状态下被晋绥公安总局秘密处死。
[7] 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次全会公报，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一九六九年十月，在战备大疏散中被疏散到开封，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
[8] 陈伯达，见本卷《我的一点意见》注释[1]。

同尼克松的谈话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尼：主席真是饱读诗书！周总理说，你书看得比他多。

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个大难题。你说，一定要谈谈有关哲学的问题。

尼：我这么说，是因曾拜读主席的诗词及演说稿，而了解他是个专业哲学家（中方人士笑）。

基：我在哈佛教书时，都指定学生研读主席的文集。

毛：我那些文章不算什么。我写的东西了无新意。

尼：主席的文章震撼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我没能力改变世界。我能改变的只是北京附近几个地方。咱们的共同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赞成这个（说法）。他骂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篇演说。你看了吗?

尼：蒋介石骂主席是匪。那主席怎么骂蒋介石呢?

周：一般来说，我们称他们蒋介石集团。我们的报纸有时叫他蒋匪，我们也被回骂成匪，反正，我们是骂来骂去。

毛：其实，我们跟他的友谊比你们跟他的友谊历史还长。

尼：是的，我知道。

毛：这些问题不是我权职内该讨论的。应该与（周）总理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也就是说，在你选举时我是投你一票的。有位叫 Frank Coe 先生的美国人，他在贵国一片大乱之时，也就是你上次竞选时，曾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你会当选总统。我很喜欢那篇文章。但现在，他却反对（你）这次访问。

尼：主席说曾投我一票，那他是两恶相权取其轻。

毛：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共和党是右倾。（英国）希斯首相也是右倾。

尼：戴高乐也是。

毛：戴高乐是另外一个问题。大家也说，西德的基督民主党也是右倾。我比较乐见这些右派掌权。

尼：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至少是目前，左派说到的右派能做到。

基：总统先生，还有一点。左派的都亲苏联，不会鼓励（美国）朝（中华）人民共和国靠拢，而事实上也因此而对你批评。

毛：正是如此。有些人反对你。我国国内也有反动集团，反对我们与你接触。结果呢，他们跳上飞机逃往国外了。

周：这件事你或许清楚。

毛：放眼世界，美国的情报比较正确。其次是日本。苏联呢？他们最后总算跑去挖出尸体了（指林彪等人坠机案）。但他们也没说什么。

周：在外蒙古。

尼：最近的印度－巴基斯坦危机，我们也碰到类似的问题，美国左派严厉抨击我为何不与印度站在同一阵线，其实左派的理由有二：一、他们支持印度；二、他们支持苏联。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放眼大局，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不管他有多大）吞没他的邻国。此举虽让我付出政治代价（我并不后悔，因为这么做是对的），但我认为历史会证实这么做是对的。

毛：容我提个建议（只是建议），你可否少做点简报呢？（此时尼克森指著基

辛格博士，周恩来则笑笑），若把我们在此的谈话内容以及形式上的讨论向其他人简报，你认为好吗?

尼：毛主席尽可放心，我们在此的谈话内容以及我和周总理的讨论绝对保密，不会跨出这房门一步，这是最高层密谈的唯一方式。

毛：这就好。

尼：举例而言，我希望和周总理以及稍后和毛主席就台湾、越南、朝鲜等问题交换意见。

我也希望讨论以下敏感问题，包括日本前途、次大陆前途、印度未来角色、全球动态、美苏关系等。因为唯有我们著眼于世界全局以及影响全球的主力，我们才能对眼前迫切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

毛：以上那些烦人的问题我并不想介入太深，反倒是喜欢你的哲学讨论。

尼：举例来说，毛主席有一件有趣的现象你应该注意到了，大部分国家都同意我们今天的会面，但苏联有异议，日本则表达了他们的疑虑，印度也不赞同。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原因，并决定未来政策发展的方向，以便因应全球以及眼前南北韩、越南、当然还有台湾问题。

毛：是的，我同意。

尼：例如我们必须自问——只限在座的人，为何苏联在与贵国的边界集结的兵力多于在与西欧接壤的边界？我们也必须自问，日本的未来是什么？是要让日本保持中立、完全没有武装好呢（我知道我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抑或让日本与美国在某段时间内维持某种关系好呢？以哲学观点而论，我要强调的是，国际关系里无所谓好坏的选择。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那就是我们绝不可制造真空状态，因为真空随时会被别人递补，诚如周总理所言，美国已摩拳擦掌，苏联也摩拳擦

掌，问题是哪一方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危机？到底是美国侵略抑或苏联侵略？这些问题虽棘手，但我们有必要讨论。

毛：就目前而言，不管是来自美国的侵略抑或来自中国的侵略其实都是相当次要的问题，换句话说，侵略之类的话题可说根本不是重点，因为我们两国并未处于交战状态。贵国打算撤出若干部队回国，我国则未派兵出国，因此我们两国的现状十分奇怪。这是因为过去廿二年来，我们双方的想法从未透过谈判交流过，我们双方进行乒乓交流至今不到十个月，而贵国在华沙提出的建议迄今也不到两年。此外，我国在处理问题时，摆脱不了官僚机制。例如，贵国希望双方能在私人层次上交流，或是互开贸易大门，但这些提议全被我们官员搁在一旁，坚持旧立场，在未解决重大问题之前，根本没有次要问题出场的份。我本身也曾这么坚持过，后来我认为你是对的，接著我们开始打乒乓球，周总理说，这也是在尼克森总统上台后才有的。

巴基斯坦前总统介绍了尼克森总统给我们认识，当时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曾反对我们和贵国接触，他说应该比比詹森总统与尼克森总统孰优孰劣，但巴国总统雅亚说，这两人不能比，也无从比。他说，一个像流氓（他指詹森总统），我不知道他这印象是打哪儿来的，我们这边也不太喜欢和詹森总统打交道。贵国前几任总统，从杜鲁门到詹森，我们都不太满意。我们不是很满意杜鲁门与詹森。

从杜鲁门下台到詹森上台之间的八年，都由共和党总统执政，这期间你大概也还没想清楚。

周：重点是杜勒斯的政策。

毛：他（周恩来）之前也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个。

尼：但他们（指向周恩来与基辛格）握过手。（周笑笑）

毛：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博士?

基：毛主席，那段期间全球局势产生剧变，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以前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没什么两样，直到尼克森总统上台我们才了解中国所进行的革命本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有所不同。

尼：毛主席，我了解有一段期间，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和毛主席与周总理有很大的出入。现在我们能同聚一堂，主要是因为我们认清世界新局势，同时也认清一国内部的政治意识形态并非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对外与对双方的政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说，我们看法不同，而周总理与基辛格博士已就这些歧见交换意见。

同时我们也要说，审视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强权，我们知道中国不会威胁美国国土。我想你了解美国并无意染指中国，而中国也无意宰制美国，我们相信你也了解美国并无意称霸全世界。此外，或许你不相信，但我真的认为，中国或美国这两个大国均无意独霸全球，因为我们对这两个议题的态度一致，所以对彼此的疆界领域均不会构成威胁。

因此，虽然我们理念有所不同，但仍可以找到共同点，建构一个双方均可无后顾之忧地照自己路线发展的全球架构。其他国家我就不敢说了。

毛：我们也不会威胁日本或南韩。

尼：以及其他国家，我们也不会。

毛：（询问周恩来时间）你认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够多了吗?

尼：是的，散会前我想说的是，毛主席，我们知道你和周总理冒了很大的风险邀请我们来此，对我们而言，这也是很困难的决定，但是读了毛主席一些谈话后，我知道他是会把握机会的人，定会掌握时机、打铁趁热。

另外，我也有一些个人的感想要对周总理说。周总理，你并不了解我，由于你不了解我，所以你不该信任我。你会发现，我从不信口开河，说些我做不到的事，我总是做的比说的多。在这个基础上，我希望能和毛主席以及周总理开诚布公。

毛：（指著基辛格）“掌握时机，趁热打铁”，我想总的来说，像我这样的人说话像放炮（周噗嗤而笑），说些“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势力、建立社会主义”之类的话。

尼：像我，还有匪帮。

毛：但你或许不会被推翻，据说他（基辛格）也不会被推翻，若你们都被赶下台，我们就没朋友了。

尼：毛主席，你的经历我们大家可是众所周知，出身赤贫，一路攀爬到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最高位置。

我的背景就没有这么精采，我同样出身穷苦人家，一路爬到国家元首之位。历史结合我们两人，问题是各自抱持不同的哲学观、但都是脚踏实地，获人民爱戴的我们是否能达成突破，除了为中国与美国效劳之外，亦能在未来几年替全球效命？而这正是我们在此的原因。

毛：你所著的《六大危机》写得不错。

尼：他（毛）饱读诗书，学贯五车。

毛：我书读得太少了，所以对美国一知半解。我必须请你介绍几个老师给我，尤其是历史与地理老师。

尼：好，一定找全国最好的名师。

毛：这正是我对斯诺先生的评语，斯诺先生已在几年前过世了。

尼：真遗憾。

毛：没错。

双方能够好好交谈就不错了，即使未达成任何协议也无所谓，因为持续对峙对我们有何好处？谈判为何一定要有结果？若我们第一次失败，人们会说，为何我们无法第一次就成功？唯一的理由是我们走错路了，但若我们第二次成功了，他们又会怎么说呢？

谈拿破仑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日、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九月十二日）

*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会见法国外交部部长舒曼时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同志会见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时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毛泽东同志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谈话的一部分。

一

对于西方历史，我是比较熟悉你们法国。法国十八世纪末的大革命，砍了路易十六的头，欧洲的国家一起联合起来反对你们。当时出了个英雄——山岳党领袖罗伯斯庇尔，此人是个乡下的小律师。他依靠那个长裤党，就能够打败所有的敌人。后头拿破仑占领了差不多整个欧洲，他后来犯了错误，政策也不大对头了。第一不该去占西班牙，第二不该打俄国，又是冬天。他打莫斯科，不打彼得堡，没有一下子把沙皇抓住。

二

特拉奥雷：我们马里共和国的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天才，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

毛泽东：你把我吹得太高了。

特拉奥雷：法国人教导我，拿破仑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但我认为同毛主席对世界的贡献相比，拿破仑不及毛主席的三分之一。

毛泽东：拿破仑，无论怎么样，后人是对他表示尊敬的。你不要说我是天才，你说拿破仑好了。这个人相当聪明，他所以能创造法国的法典，就是因为他读过罗马法典。拿破仑晚年的政策不那么高明，一不该占领西班牙，引起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反对他；二不该去打俄国。

特拉奥雷：我说一个人是天才，就是指他的思想。

毛泽东：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

特拉奥雷：我看了你的军事和政治著作。

毛泽东：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作的总结。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请你少吹一点了，我的好朋友啊，你也不要强加于我。

三

法国人的历史，我们感兴趣，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法国人，把欧洲的封建制度扫得差不多了。几十年前我们在延安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苏联人，我问过他对于拿破仑的认识怎么样。他表示很尊敬，说拿破仑是了不起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拿破仑的前一段都是肯定的。就是他反对英国，封锁英国的货物的政策搞得不好，结果封锁不了，主要是棉布、白糖、咖啡这些物资。再呢，海军不该跟英国海军打。占领西班牙也不大妥呢，进攻俄国也是不妥呢。这个都是为了封锁。如果保存海军，拿破仑最后失败了，也可以跑到美国去。把三万法国人的军队放在埃及，也是不妥当的。

谈国际问题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同志的部分谈话。

西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想推德国向东，不使它向西。现在，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西德都想推动苏联向东，推苏向华，西方无战事就好。两个德国应该统一，搞两个干什么呢？无非是雅尔塔搞的。我讲过多次，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的。但现在要吃呢，要用文的，用武的难，过去可以，过去清朝、北洋军阀、蒋介石的时候都可以。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不过我也不大相信会打，但准备打。苏联原来搞威胁，威胁不灵，威胁不搞了，只搞演习。如果是真要打，就不搞演习。如果打游击我们就要准备，黄河以北它占不了好多，大城市我们也不放弃，在洞子里头照样打。如果俄国人真打中国，它就失败了。横直我们是打游击，不损失主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能吃下的就吃一口，至于你要打我，横竖我就两条腿走路。我的看法，苏联是声东击西，口里讲是整中国，实际上是向欧洲和地中海。有个英文刊物叫《新闻周刊》，有篇文章算了一笔账，说苏联是整欧洲的。它在欧洲那边包括在东欧驻扎的部队，有九十一个师，国内靠西边还有八十个师，对中国这边不过四十多个师。这种估计只当一种想法，你们外交部研究一下。我出点题目，究竟是声东击西，还是真正向东？准备它是要打。可以请一些人来，也可以派一些人出去，要搞些调查研究，情况弄得确实一些。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

我们外交部有条路线，中左路线，喜欢左派和中间派，就不喜欢右派。世界

上就是右派当权，你怎么办呢？而我呢，都喜欢，特别喜欢右派，尼克松一类人，我就说服我周围的这些人。

这次我们国内开了三百多人的会（指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他们都没有注意我的那几句话："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什么叫"跌了几跤之后"呢？包括开除党籍[1]，开除出政治局，赶出红军三四次，等等。我总是每一次就声明，要么就听我的，我就干下去，就要怎么怎么。要不然，我就滚蛋。你们再需要我来呢，那我就再来吧。外国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也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关于避孕，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人体的八大系统都要研究，包括男女关系这种事，要编成小册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

注释

[1] 1928 年 3 月，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井冈山根据地传达 1927 年 11 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将开除毛泽东同志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误传为"开除党籍"。

启用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启用邓小平的批示与谈话。毛泽东同志对犯错误者的“一看二帮”“惩前毖后”的态度，毫不动摇地贯彻了一生。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七二年启用之后，一九七五年末就发现他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没有改变，以《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发表为主要标志，全面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对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信的批语；本篇二、三、四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各军区负责人的谈话。

一

请总理[1]阅后，交汪主任[2]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3]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4]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5]。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6]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　泽　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二

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

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三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四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注释

[1] 总理，指周恩来。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3] 刘少奇，见本卷《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注释[29]。
[4] 邓，指邓小平，一九三二年冬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毛，指毛泽覃，一九三一年六月任永（丰）、吉（安）、太（和）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指谢唯俊，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帅师长。古，指古柏，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党团书记。他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从实际情况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意见，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作法。一九三三年三月起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遭受残酷斗争，受到撤职等处分。
[5] 张闻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一九三三年一月随同临时中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开始阶段，他直接参予了领导。后来他对这个问题多次作过检讨，并从中吸取了教训。
[6] 刘伯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委邓小平等一起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和冀南、太岳、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邓小平一起率领所属部队挺进大别山，参与指挥淮海、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

同基辛格的谈话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十一月十二日、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一

在座人士：中共党主席毛泽东、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传译唐闻生、传译沈若芸；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洛德。

毛（边走边说）：我看起来还不差，但老天已对我发出邀请。（转头朝洛德说话）你真年轻。

洛：我渐渐老了。

毛：在坐的要属我最老了。

周恩来：我是第二老的。

毛：当年英军有人反对你们国家独立。蒙哥马利元帅则是反对你们政策的人士之一。

基：是的。

毛：他也反对杜勒斯的政策。不过，他大概不会再反对你们了。当时，你们也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所以我们彼此是敌人（大笑）。

基：以前的敌人。

毛：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算是朋友。

基：这是我们的感想。

毛：也正是我说的。

基：我对周总理说过，我们还没跟其他国家会谈得像跟你们会谈时，这般的坦白和开放。

毛（对著摄影师说）：就这样了。（摄影师旋即退下）。

不过，我们别说些假话或要诡计。我们不会偷你的文件，你可以随意的放，测试一下。我们也不搞窃听。这些小把戏都没什么用。连一些大军演也没什么用。我曾对你们的记者斯诺说过，对重大事件而言，你们的中央情报局没什么帮助。

基：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

毛：因为，当你们下令时，譬如说，你们的总统下令，你需要关于某些问题的资讯，情报单位的报告却像雪片般飞来。我们也有情报局，情形也一样。他们做得不好（周恩来在一旁笑了），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林彪（周继续笑著）。同样的，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

毛：你工作做得不错。你飞遍全世界，你是燕子，还是鸽子？（大笑）越南问题应该算是大致解决了。

基：我们也是这么觉得。局势该有个朝平静发展的转换期。

毛：对的。

基：基本问题都解决了。

毛：我们的情形也一样（边说边比手势）。你们总统当时坐在这里时也说过，每个人都有依其需要行事的方法。这也导致了贵我两国的携手合作。

基：是的，我们都面对一样的危险。有时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是一样的。

毛：这样很好。只要大家的目标相同，就不会我伤害你，你伤害我。然后我们可以共同对付一个冒牌货。（大笑）当然，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批评你们，你们也会想批评我们。这照你们总统的说法是受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会说，共产党滚开，我们则会说，帝国主义份子滚开。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样的话，不

这样做的话不行。

基：我想我们双方都得忠于自己的原则。事实上，如果我们的话都一样，可能会把情况弄混。我对周总理说过，由于你们的原则，很奇怪的，对欧洲你们说话就可以说得比我们更强势。

毛：至于你们，在欧洲和日本方面，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彼此合作。有些事吵吵嘴没关系，但基本的合作还是需要的。

基：至于你我之间，就算有时彼此批评，我们还是会配合你们行动的，也绝不会参与任何旨在孤立你们的政策。至于日本和欧洲，我们同意在重要事务上应该和他们合作。欧洲现在的领导圈十分弱势。

毛（手指著基辛格）：法国的社会党正和共产党联手，苏联则希望法共夺得政权。我不喜欢法国共产党，就像我也不喜欢你们美国共产党。我喜欢你，但不喜欢你们的共产党。（大笑）。西方历史上，你们总是有套政策，譬如说，在两次大战中，都是你们压迫德国和俄国宣战。

基：但我们的政策可不是压迫俄国和中国打仗，因为中国的战事对我们来说，就和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一般危险。

毛：（在基辛格的发言被翻译前，毛先用中文回话，还一边数著手指头。翻译唐闻生先翻完基的话，然后再把毛的话翻成英文）。我想说的是，你们到底是不是打算让西德和苏联握手，和平相处，然后使苏联得以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都有这种想法，让苏联东进，好对抗我们和日本。或许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也可以用来对抗你们。

基：我们不赞成这种政策。我们较支持不追求这种政策的德国反对党。（毛泽东开始抽雪茄，并试著递雪茄给基辛格和洛德，洛德表示他不抽烟）

基：我们并未计划在未来四年大量裁减驻扎在欧洲的美军。（毛把脸转向周）

周：说到裁军，你的意思是最多裁百分之十到十五。

基：完全正确。

毛：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有多少？他们大都是飞弹部队吧。

周：大概在卅至卅五万间，包括地中海的驻军。

毛：这大概不包括海军在内。

基：不包括海军。在欧洲中部约有廿七万五千人，但这不含部署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

毛：你们部署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军队散布很广。你们在韩国有军队，我听说大约有三十万人。

基：大约四万。

毛：蒋介石那儿大约有八到九千人。

周：在台湾吧。

毛：听说日本还有两地驻军，四万人在琉球、二至三万人在日本本土。我不知道菲律宾有多少美军，但现在越南的美军只有一万多人。

基：但他们很快都会撤回。

毛：对，我听说你们在泰国有四万人。

基：对的。但主席你刚才说的大都是空军部队，所以恐怕不能光以人数衡量。

毛：你们也有地面部队，例如在南朝鲜。

基：我们在南朝鲜确有地面部队。

毛：你经过日本时，最好多花点时间和他们会谈。你只和他们谈一天，他们的面子很挂不住。

基：主席，我们希望此行的重点是北京的会谈。稍后我会单独再去一趟东京。

毛：很好。对他们说清楚些。你知道日本对苏联的感觉也不是很好。

基：他们有点爱恨交加。

毛：（比手势）一句话，这是日本田中首相告诉周总理的，苏联做的事就像看到有人要上吊，就立刻把人家脚下的椅子抽走。

基：是的。

毛：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未发一枪一弹就抢了一大片土地。（周恩来轻轻的笑了）他们抢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抢了一半的新疆和东北的满洲，还说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基：他们还夺走当地所有的工业。

毛：对呀。他们还抢走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毛转头和周讨论）库页岛位在千岛群岛南方，我得查查字典，看它的中文名叫什么。

基：日本被苏联的经济发展性所迷惑。

毛：（点头）他们希望从苏联那儿拿回些什么。

基：但我们将加强日本和美国关系，同时也希望和中国加强关系。

毛：我们认为，要是日本和苏联加强关系，不如和美国加强关系，这样会比较好些。

基：日本和苏联如果形成紧密政治关系是很危险的事。

毛：这在现实上，似乎不可能成真。

周：（对毛说）我们已经决定在双方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以维持黄华和白宫的联系。

毛：（对周说）重要性何在。

周：联络办事处将处理一般民众的交流事务。至于保密性强以及紧急事务则不包括在内，这将交由黄华大使的管道处理。

毛：黄华命苦（周大笑），他在你们那干得很好，现在赶回上海，背还扭伤。

基：他返回任所时，我们会给他找个医生。

毛：好啊。（周大笑）黄华好像在你们那比较安全，他一回到上海就摔跤。从你们总统观看中国杂技团演出开始，我想越南问题快解决了吧。还有谣传说，你也快摔跤了（笑声），对这件事，在场女士们可不太满意（笑声，尤其是女士们），有人说，如果博士垮了，我们也将没活干。

毛：中国和美国贸易量少得可怜，但逐渐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国是很穷的，我们没有甚么，女人倒是过剩。（笑声）

基：女人是没有配额或关税的。

毛：如果这样，我们可以给你几个，或者千把个。（笑声）

周：一定，而且是自决自愿。

毛：如果让她们到你们那，绝对是个灾难，这样倒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笑声）

基：我们和中国进行经贸不是只考虑商业利益。

毛：你要我们中国女人吗？我们可以给你一千万人。（在座的女士笑得特别厉害）

基：主席正在推销他的观点。

毛：这样做，我们可以让她们像洪水一样淹没你的国家，同时伤害你们的利益。我们的国家有太多的女人，她们会生孩子，而我们国家的孩子太多了。（笑）

基：这真是一个新奇的意见，我们会好好研究他。

毛:你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你的访问正是在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笑)

毛:中国人是非常排外的,例如,在你的国家你可以看到许多国家的人,但在中国你看到几个外国人?

周:非常少。

基:当然,你们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不像其他国家那么幸运。

毛:是的,那是有原因的,在百年前的义和团事件中,主要是八国联军,接著是日本,日本占领中国十三年,他们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土地;过去入侵的八国联军不但占领了中国土地,而且还向中国索要赔款。

基:是的,还有治外法权。

毛:在对日关系上,我们没有要求他们赔款以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而且要计算赔款非常困难,没有任何会计能够做到。只有以这种方法我们才能消除敌意,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要化解中日人民间的敌意比化解你我之间的敌意困难。

基:是的,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敌意,相反的,我们之间现在只有一个判断性问题。(毛表示同意)未来几年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很快就会开始运作。

毛:是吗?

基: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毛:你所谓的利益共同体是什么?是指台湾?

基:是指其他有这种意向的国家。

周:你是指苏联?

基：我是指苏联。

周：沈小姐了解你说的意思。

毛（看著翻译沈若云）：这个中国人的英文能力很好。（对周恩来说）她是谁?

周：她是沈若云。

毛：姑娘。（周恩来笑了）今天我说了一些无聊的话，为此，我必须向中国的妇女们致歉。

毛：我们的翻译实在太少了。

基：不过，我们遇到的翻译，他们都做得很称职。

毛：你遇到的翻译和我们现在的翻译现在只有二、三十岁，如果他们老了以后，就无法翻译像现在这么好了。

周：我们应该送一些人出国。

毛：我们应该送一些像这样高的小孩（用手比了一下）出国，年龄不要太大。

基：我们准备设立一些人员交换计划，让你们送学生到美国。

毛：一百个学生当中如果有十个人学好外语，那就非常成功，即使有十多个学生不想回国，例如一些女孩想留在美国，那也没关系，因为你们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么排外。过去，中国到外国却不肯学当地语言，（看著翻译唐闻生）她的祖父母就拒绝学英语。他们就是这么顽固。你知道中国人是非常顽固和保守。许多老一代华侨不肯说当地语言，但年轻一代好多了。

毛：（比个手势并指著他的书）假如苏联丢了炸弹并杀死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那将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像我一样的老人不会学英文，我们只会读中文，我大部分的书是中文，只有少数的字典是外文，其他大部分的书是中文。

基：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

毛：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

唐：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毛：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辞汇－纸老虎。

基：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笑）

毛：假如俄国攻击中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将采用游击战和持久战，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到的地方。（周恩来笑了）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很好啊。（笑）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啊。

基：不过，如果他们使用炸弹而不派兵呢？（笑）

毛：我们要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让他们猛攻一番，而他们将损失许多资源。他们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也是社会主义者，那么苏联进攻中国就是社会主义者攻击社会主义者。

基：假如他们攻击中国，我们肯定会基于我们的理由反对他们。

毛：但是你的人民并未觉醒，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将是一件好事。

基：欧洲想什么我无法判断，他们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基本上与此事无关。（毛此时请基和洛德喝茶）我们考虑的是假如苏联占领中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并造成我们的孤立。

毛：（笑）那会怎样？因为自从深陷越南后，你们遭遇这么多的困难，你想如果苏联深陷在中国，他们会感到舒服吗？

基：苏联？

唐：苏联。

毛：那时候你们可以让苏联深陷在中国，半年、一年、两年、三年或四年，戳

苏联的背后，那时候你们的口号将是寻求和平，你们将以和平之名瓦解社会主义帝国,也许你们将以作生意帮助他们,并向他们表示可以提供一切协助反对中国。

基：主席先生，我们了解彼此的意图实在非常重要，我们绝对不会联手攻击中国。

毛：（打断基的谈话）不，不是这样，你正在进行的目标是瓦解苏联。

基：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笑）

毛：（用两手作势）苏联的目标是占领欧亚两个大陆。

基：我们希望吓阻苏联的攻击，而不是击败他，我们希望阻止他。（周恩来看表）

毛：世事难料，我们宁愿事情如此发展，这样的发展对世界来说比较好。

基：哪种方式?

毛：那就是苏联进攻中国并且被击败，我们必须作最坏的考虑。

基：那是你的必然性推论。（周恩来笑）

毛：我们国家有许多妇女，她们不懂得如何作战。

唐：那不一定，有许多妇女特遣队。

毛：她们只是在演练，真的作战时，你将很快逃进地下庇护所。

唐：假如这几分钟的谈话公开，将引起半数中国人的公愤。

毛：那是中国一半的人口。

周：首先，它将无法通过外交部这一关。

毛：我们称今天的会议是秘密会议；（中方人笑）我们今天的会议要公开，还是保密?

基：那由你决定。假如你同意我打算将会议内容公开。

毛：你的意思如何？公开好还是保密好？

基：我想还是公开好。

毛：今天我们有关女人的用词应该销掉。（笑）

基：我们将从纪录中删除。（笑）当我回去后我们将开始研究这项提议。

毛：你知道，中国有一个陷害美国的阴谋，那就是送一千万名妇女到美国，藉著增加美国人口来伤害其利益。

基：在我的印象里，主席已经非常确定这个想法，那么我一定会在我的下一个记者会上使用它。（笑）

毛：对我来说无所谓，无论如何，老天已经送给我一封邀请函。

基：我真的发现主席今年气色比去年好。

毛：是的，我的情况比去年好。（毛在没人搀扶的情况下起身向美国访客道别）请代我向尼克森总统致意，同时也向尼克森夫人致意，很抱歉无法与她及罗杰国务卿见面。

基：我一定会转达。

周：新闻声明我们会在一个小时内送给你。

二

与会者：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外长姬鹏飞、副外长王海容、译员唐闻生及沈若云、国务卿基辛格、美国联络办事处主任卜大卫、国务院计划暨协调处主任洛德。

毛：各位讨论了些什么？

周：扩张主义。

基辛格：没错。

毛：谁在谈扩张，他吗？（指著基辛格）

周：他先开始，其他人也跟进。

基：关于均势，贵国外长不时批评我们，但我认为他了解真正的源头。

毛：但那种扩张主义是微不足道，你们不该怕他们。

基：我们并不怕他们，主席。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得采取像两周前那样强烈的措施。

毛：那些措施还不错。那时我们还无法说服埃及副总统夏菲。他来此地表示对美国没有信心。他说你们偏袒以色列。我说不必然。我说那些犹太人后裔并不是一条藤；譬如，我们跟恩格斯合作，而不与其他犹太资本主义者往来。

基：中东的问题是现在就要防范被苏联掌控。

毛：他们不可能掌控中东，因为虽然他们的野心很大，但能力却有限。以古巴为例，你一恐吓他们，他们就跑了。

基：后来我们又吓了他们一次，但我们没有声张。

毛：最近吗?

基：最近。他们出动好几艘潜艇，我们也出动好几艘军舰，后来他们就退了。我很怀疑这个国家会想跟我们建立关系。刚开始卡斯楚派代表团来接触，代表团负责人是洛德利圭兹。他率领六名拉丁美洲同胞来到中国，试图代表苏联与我们媾和。第二次他们试图透过罗马尼亚的西奥塞古谋和，他们试图说服我们不要继续在意识形态上搞斗争。

基：我记得他当时在这儿。

毛、周：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周：他第一次到中国。（英语）

毛：第二次柯锡金亲自来，那是一九六〇年。我向他宣布我们准备对他进行斗争一万年。（笑）

翻译：主席说要斗争一万年。

毛：我也向他明言，我们双方都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被你们（苏联）贴标签称作教条主义者，这是反马克思的。因此我说那我们也给你们冠个名称，叫“修正主义者”（笑）。所以我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次我对柯锡金让了步。我说我原先说这场斗争将进行一万年，看在他亲自来拜访我的分上，我就减一千年。（笑）你看我多慷慨。我一让步就是一千年。（周和毛商议）

还有一次，也是罗马尼亚的一位波德欧洛维斯基先生代表苏联来谈。这一次我又让步了一千年。（笑）你看，我的时限越来越短。

第五次罗马尼亚总统西奥塞古又来了－那是两年前－他再度提起这个问题，我说“这次不论你说什么，我不能再让步了”。（笑）

基：我们必须采用中国式战术。

毛：目前你们跟我们之间有些歧异。现在我讲话不太舒服，因为我掉了两颗牙。你们跟我们的活动也有点不同，那就是，我们向来以牙还牙。我们体察到柯锡金总理和我们达成的协议从来没有真正履行过的事实，那是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在北京机场的协议。

基：不论在车内或他处，我向周总理解释，我们的战术较为复杂，或许没那么大胆，但我们的战略一样。我们毫不怀疑谁是今日世界最主要的威胁。

毛：你们的作法是中国式的太极拳。（笑）我们做的是更有活力的太极拳。

周：直接出击。

基：的确，但是当挑战真正出现时，我们的反应跟你们一样。

毛：我相信，那就是为什么您最近到阿拉伯世界拜访做得很好。

基：主席正在学英文。

毛：为什么在你们的国内，你们对水门事件[1]那桩屁事那么在意？（当传译解释她不能照实翻译主席的“屁事”一语，因为那意即“放屁”时，中国那一方传出更多笑声。周总理问洛德先生是否知道中国字“屁”的意思，洛德先生回答“不知道”，周总理说他可以问他太太。中方解释那是一个形容这种情况的字眼。）这个事件本身是个很小的事，可是因而引起这么大的乱子。无论如何，我们不希望这样。

基：不过，主席先生，外交政策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外交政策会维持目前的方向，或者在危机情况下我们会采取的行动，都不会改变，我们过去的作为可当作证明。

毛：对。即使是在国内事务方面，我想就你和总统而言也没有很迫切的问题。

基：没有。对我而言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我跟这没有一点关系。就总统而言，他有办法处理好的。

毛：我所指的国内事务是你们的通货膨胀问题，物价上涨，失业增加，因为看起来失业人口已经因为美元相对稳定而减少，所以看起来应该没有大问题。为什么水门案会闹成这个样子？

基：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包括有很多老式的政治人物不喜欢总统，因为他采取的政策不是那么传统。也有很多知识份子变成无政府主义者，想要摧毁一切。

毛：例如雷斯顿（JAMAESRESTON）、艾萨浦（JOSEPHALSOP），现在都站出来反对尼克森总统。这个我无法理解。

基：我能够了解雷斯顿为什么会这样做，他只是跟著别人走，他总是反映流行的观点。至于艾萨浦，我想他只是暂时有些失常，他很快会回到原来的立场。

毛：你想他们会不会写写文章，比如说，试试大众的看法？

基：他们都以为是他们在统治这个国家。他们不时会轮流玩弄一下总统。（笑）如果我们要去管他们在做什么，主席先生，那我根本就不会来这里做第一次访问（笑）。任何重要的事他们都是反对的，但我们还是做了。

毛：对。大家都说美国人没有什么秘密。

基：真的是这样。

毛：我们想美国人可以好好的保守秘密。

基：基本上是这样没错，主席先生，不过你可以放心，只要我们把消息留在白宫里不放出去，我们讨论的东西就不会走漏。

毛：例如说，一件是古巴事件；一件是你到中国访问的事。另一个情况是最近你们跟苏联的往来。在这些事例里面，保密工作都做得蛮好的。

基：确实如此。我的办公室要保密的事项，都能够守得住。不过我们跟苏联之间的事没有什么秘密。跟苏联之间的事，我们一直都是有什么就跟你们说什么。我们跟苏联往来情况你们都是一清二楚。保证未来也是这样。

苏联喜欢制造一种印象，让人家觉得他们跟我们有共同统治世界的伟大计划，不过这只是用来欺骗其他国家而已。事情不是这样。我们没有那么笨。

毛：关于苏联，你们的说法老是跟我们一样。你们的见解似乎跟我们的大致相同，也就是苏联有可能会想要攻击中国。

基：这个，主席先生，我以前以为这种可能性只是理论上的。现在我觉得有一点实际的可能性，这个我说过，特别是跟你们总理和大使说过。我们想他们最想要做的是摧毁你们的核子武力。

毛：但是我们的核子武力只不过像苍蝇这么大（笑）。

基：不过他们担心的是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毛：我会说他们担心的是卅年后或五十年后。一个国家要在短时间内兴起是不可能的。

基：那么，我已在很多场合说过，上次也跟主席提过，我们相信如果终将会有这样的事，对每个人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决心自己独力去防范这样的事，就算跟中国没有做任何安排也一样。

毛：我们现在来讨论讨论台湾问题。美国跟我们的关系的问题，应当和我们与台湾之间关系的问题分开来处理。

基：原则上……

毛：只要你们跟台湾切断外交关系，就有可能来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这跟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至于我们跟台湾之间的问题，就相当的复杂。我不相信会有和平解决方案。（对外长说）你相信吗?

基：我相信吗？他问的是外长。

毛：我是问他（外长）。（周总理说了些话没有翻译到）。

他们（译注：指的是台湾）是一批反革命份子，怎么可能会跟我们合作？我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台湾，再过一百年再去管他。对世事不要太急。有什么需要著急的呢？那只不过是个千把万人口的岛屿罢了。

周：他们现在有一千六百万人。

毛：至于你们跟我们的关系，我想不需要用一百年的时间来处理。

基：我相信是这样。我们应该会快得多。

毛：不过这是你们必须决定的事情。我们不会去催你们。如果你们觉得有需要，我们就来做。如果你们觉得现在还不行，那我们也可以缓一点。

基：从我们的立场来说，我们希望能够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

的困难是我们不能立刻就切断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有几个理由，而这些理由全部都跟我们国内情势有关。我跟总理说过，我们希望在一九七六年之前，或者在一九七六年期间完成这个程序。所以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找到某种方法，让我们得以建立外交关系，这个作用是当作我们加强关系的象征，因为在技术层面来说，连络办事处用处非常大。

毛：这是可以的。

基：什么可以?

毛：（在翻译之前说了一些话）可以照现在的做法来做，因为现在你们还需要台湾。

基：这不是需不需要台湾的问题，而是现实上可不可行的问题。

毛：都一样（大笑）。我们现在对香港也不急（大笑）。我们甚至不会去碰澳门。如果我们真的想去碰澳门，最多也只会碰一点点。因为它是葡萄牙从明朝就开始紧紧掌控的地方（大笑）。赫鲁晓夫也骂过我为什么我们连香港和澳门都不要。而且我也跟日本说过我们不只同意他们统治北方四岛，而且还包括历史上苏联从中国划给他们的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基：主席，我觉得外交关系的问题是这个。在台湾问题上，我相信我们对各自坚持的立场都很清楚。所以我们有的问题是……而且连络办公室同时也做了非常有用的事。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都认为，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认为应该象征性地显示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各方面都是正常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该找个方法来实现它，不过并不是非要不可。

毛：我们已经和苏联与印度建交，不过关系并不太好。而且与它们的关系甚至还没有我们与你们的关系好。所以这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基：我完全同意主席的讲法，也同意我们必须彼此了解，我相信我们对彼此都有实质的了解。

毛：我们的连络办事处主任已经跟你们说过大原则，也提过当年乔治·华盛顿反抗英国的故事。

基：对，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对我作过精彩的演说，我也从总理那里听过。

毛：那套说法可以不用提了。我们现在面对著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一直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建国运动，一方面我们必须对美国在当地阻止苏联的做法表示欢迎，以免苏联控制中东地区。我们的黄大使提过我们对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不过他不了解美国阻止苏联势力的重要性。

基：嗯，我那时的说法让他很惊讶，而他重复说明了联合国的立场（大笑）。而且我了解你们公开地采取了某些立场，这并不违反我们共同的立场。不过实际上我们会进一步解决中东问题，但我们也想显示这并不是因为受到苏联的压力才这样做的。所以，每当苏俄施加压力时，我们就必须将这个争议中的好处分清楚，然后当我们赢过他们时，我们也很可能是朝同样的方向在前进。我们不是反对阿拉伯国家的主张，我们只是反对它们是藉著苏联的压力达成的。

毛：没错。

基：而且那就是我们现在的策略。

毛：赫鲁晓夫说我们像是好斗的公鸡。

基：他一九五九年到这里访问时，不太成功。

毛：我们在一九五九年决裂。他们一九五八年想要控制中国海岸和中国海港时，我们开始失和。我和他们，他们的大使讨论的时候，我差一点拍桌子，我骂了他一顿。（笑）他向莫斯科报告后，赫鲁晓夫就来了。当时，赫鲁晓夫提出联合舰

队的构想，就是苏联和中国共组一个联合海军舰队。这是他提出的建议。那时候，他十分自大，因为他见过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有了点所谓的“大卫营精神”。他在北京向我炫耀，说他认识美国总统，提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时还说了两个英文字，说他是“我的朋友”（my friend）。（问卜大卫大使：你知道吗？）

卜：不，我从不知道这回事。

毛：还有一些消息。从此以后，赫鲁晓夫没有再来过。但他曾到过海参崴，他是从中国到海参崴的。

周：他在那里发表了一篇反中国的演讲。

毛：现在的苏联领袖没有一个曾到海参崴那么远的东边。柯锡金自己说过，他对西伯利亚的事情不太清楚。（中方查看时间）

周：已经两个半小时了。

毛：我还想和你谈另外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好像谈得太久了。超过两个半钟头。我们占了原本为别的活动安排的时间。（注：他指的是卜大卫大使的接待会。）我想讨论的问题是，我很怀疑，如果民主党掌权，他们将会采行孤立主义政策。

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主席先生。我认为目前的知识份子和一些民主党人，可能有走向孤立主义的趋势。不过，客观的现实将迫使他们了解，除了我们当前的政策外，没有其他选择。目前来看，在他们了解这点以前会产生多大伤害，还有，他们是否将继续同样错综复杂的策略，我不知道。但我认为，他们将沿袭现今的做法。（最后一句话没有翻译。）

毛：那你似乎和我是同一类。我们好像多少都有点疑心。

基：我是怀疑，我对某些领袖也有些疑问。但我相信局势的迫切需要将迫使我

们回到我们目前正奉行的政策。不过，主席先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利用这段我们全都还在位且都了解这情势的时候，尽量巩固关系，不再让其他政策有机可趁。

毛：这个主要从一点上就可以证明，就是从欧洲撤军的主张。

基：是的。

毛：这是帮苏联的忙了。

基：我们将不会在我们的政府内执行。只有二种情形可能：军队从欧洲撤退，如遇挑战，也不太愿意极为残暴、极为火速的解决。

毛：你所说的“粗暴”意思是指可能开战。

基：如果有必要，但……

毛：我不喜欢你向我要外交手段。

基：如果有必要，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将发动战争，他们会退缩回去。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很怕我们。

毛：因为我也认为最好不要打战。我也不喜欢战争。虽然人家都认为我是个战争贩子。（笑）如果你们和苏联开战，我也认为不太好。如果你们准备打，最好使用传统武器，把核子武器留著当备用，不要碰它们。

基：我们绝对不会发动战争。

毛：那好。我听说你们提出这种说法是想先争取时间。

基：我们是希望争取时间，但我们也希望处于一种地位，就是如果苏联攻击我们讨论的任何重要地区，我们要能反击。这是我们必须准备好的情况。

毛：完全正确。至于苏联，他们欺弱怕强（他笑著指向王小姐和唐小姐）。你不要因为王小姐或唐小姐比较软弱，想欺负她们。

基：主席先生，依我的经验，她们并不十分软弱。她们也不按照主席的劝告行事。（笑）

毛：她（唐小姐）是美国人，而她（王小姐）是俄国间谍。（笑）

三

与会者：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主席、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乔冠华—外交部长、黄镇—大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华盛顿联络办公室主任、王海容—外交部副部长、唐闻生—副司长，美国及大洋洲事务司，兼通译者、章含之—美洲及大洋洲事务司副司长、基辛格博士—美国国务卿，暨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助理、布什，大使—美国驻北京联络办公室主任、洛德—国务院政策企划参谋主任。

毛：你知道我浑身都是病。我很快就会上天堂了。

基：不会的。

毛：快了。我已经收到上帝的邀请函了。

基：我希望你还要很长一段日子才会接受邀请。

毛：我接受博士（医生，一语双关）的嘱咐。

基：多谢。（美国）总统非常希望能够访问中国，也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和毛主席见面。

毛：我们诚挚地邀请他来访。

基：我们非常重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毛：是蛮重要的，但没那么重要。（用手指作手势）。你们是这个（两只手指中间空间比较大），我们是这个（两只手指中间空间比较小）；你们有原子弹，我们没有。

基：是的，但是主席过去常说，军事力量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 毛：副总理邓小平说过，小米加步枪。

基：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

毛：是的。

基：你用英文说，也写下来了。能不能把这给我?

毛：好。（他把他写下的便条递给基辛格）。

基：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我说到，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毛：不。（把两只手指握得很近）。所以你们和他起了争执。（指著副总理邓小平）

基：目标是一样的，只是方法有意见。

毛：昨天，你们和邓副总理争执的时候，你说到，美国对中国无所求，中国对美国也无所求。我的看法是，这种说法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错的。小问题是台湾，大问题是全世界。（开始咳嗽，护士趋前帮助他）要是无论哪一边对另外一边都无所求，你们干嘛要到北京来，我们又为什么要接待你和贵国总统?

基：我们到北京来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也是因为我们认为你们对世界情势的看法比我们打过交道的任何国家都要清楚，而我们和贵国若干观点一致……相当多。

毛：那样靠不住。那些话不可靠。那些话不可靠，是因为根据你们的优先顺序，最重要的是苏联，第二是欧洲，其次是日本。

基：那并不正确。

毛：我的看法就是这样。（他用手指头数）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你看，五个（举起他的五只手指头）。

基：那并不正确。

毛：所以我们有争议。

基：我们是有争议。苏联对我们是重大威胁，但不是最高优先。

毛：这样说不对。它是个超级强权。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强权（用手指头扳数）。我们从前往后数（数著自己的手指头）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我们排最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瞧。

基：我知道我几乎从不曾和毛主席意见不合，但他这一点并不正确，因为这只不过是我们优先顺序的问题而已。

毛：（拍他的两个肩膀）我们认为你们做的是从我们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这些肩膀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你瞧，我们排第五。我们是小拇指。

基：我们在莫斯科什么都得不到。

毛：但是你能在中国取得台湾。

基：我们能在中国取得台湾?

毛：但是你们现在有中国的台湾。

基：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会解决这件事情。

毛：在一百年内。

基：上次我到这儿毛主席是这样说的。

毛：的确。

基：更少。我不认为需要一百年。

毛：最好它是在你们手里头。要是现在你把它送回给我，我也不要，因为现在它要不得。现在那儿有非常多的反革命份子。一百年的话，我们会要它（用手做手势）我们将会为得到它而打仗。

基：不是一百年。

毛：（用手做手势，计数）很难讲。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实在难说得很。（指著天花板）等到我上天堂去见上帝，我要告诉他，现在让台湾由美国

代管还比较好。

基：他听到这话从毛主席嘴里说出来，肯定大吃一惊。

毛：不，因为上帝（过去）保佑你，而不是我们。上帝不喜欢我们，（摇晃著他的手）因为我是个好战的军阀，同时也是个共产党。那就是为什么上帝不喜欢我。（指著三个美国人说）他喜欢你、你还有你。

基：我从来没有这个荣幸遇到上帝，所以，我对这点实在不敢讲。

毛：我敢讲。我已经八十二岁了。（朝著基辛格国务卿）你现在几岁啦？大概五十岁吧？

基：五十一了。

毛：（指著副总理邓小平）他已经七十一。（摇著他的手）我们都死了以后，我、他（指邓）、周恩来和叶剑英，你们还都活著。瞧？我们老家伙不会做。我们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基：我想就主席稍早提到我们相对的优先顺序这件事情再谈一谈。

毛：没问题。

基：苏联是超强，难免要优先，我们经常要应付它。但在策略上我们要遏阻苏联扩张，所以中共对我们是策略优先。不过我们不希望利用中国当跳板，因为是死路。

毛：你们已经跳到那儿了，你们也不需要我们的肩膀了。

基：没有，这只是战术性阶段。总统会向您证实。

毛：也请代向贵国总统问好。

基：我会照办。

毛：我们欢迎他来访，你有什么办法帮我治治我现在这说话不清的毛病？

基：您的意思我们都懂。

毛：（指著头）这儿不错，我能吃、能睡；（拍拍膝盖），这儿不灵光；不疼，可是走路没力气。我肺也有问题。总的说来，我身子不太好。

基：见到您总是很高兴。

毛：你知道我是外宾的样板。

基：毛主席，我看了我们两年前的对话纪录，我认为它是最深入的国际事务纪录之一，我们对它非常重视。

毛：但有些事我们必须等待观察，我做的一些评估还有待客观的情势来推动。

基：我认为毛主席当时的基本评估到目前为止从情势发展看来都证明是正确的，基本上我们都赞同。因为尼克森总统的辞职我们经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不得不作一些调整。

毛：我认为那是可以的，调整说得过去。

基：它很重要，不过现在这些都过去了。

毛：欧洲现在太软弱了。

基：我同意，欧洲的确太过软弱。

毛：他们怕苏联。

基：他们担心苏联跟国内的情势。

毛：日本在搞霸权。

基：日本还不准备搞霸权。

这还需要领导阶层的再一次改变。不过日本仍具有争取霸权的潜力。

毛：是的。

基：我认为下一代的领袖，我的学生中曾根，他是我在担任教授时的学生，那

一代会比较倾向使用日本的力量。

基：我们支持德国的统一，可是现在这样的情况可以防卫苏联的军事行动。不过美国是支持德国统一的。

毛：我们同意这一点，你们和我们。

基：我们并不担心一个统一的德国，不过在此之前苏联在欧洲的势力必须有所减弱。

毛：除非和苏联打一仗，否则苏联的势力不会减弱。

基：是的，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然而在水门事件期间，我们无法这么做。这也是我们要调整的原因。

毛：其实并没有必要这样处理水门事件。

基：这是没有理由，没有理由的。（唐表示有些不解。）根本是毫无藉口采取这样的态度。这只不过是一件小事，然而却因为一群非常短视的人，而演变成一场国家与国际的悲剧。尼克森总统是一个好总统（毛同意地点头），我还常与他联络。

毛：请代我向尼克森先生致意。

基：我回去后会打电话给他。

毛：那么请首先代我向福特总统致意，其次再代我向尼克森先生致意。

基：是我的荣幸。

毛：你太忙了。

基：您认为我太常旅行了?

毛：我是说你太忙了，而且看来你不忙也不行。你不得不忙。当风雨来袭时，燕子就忙了。

基：我得花几天的工夫才能了解其中含意。

毛：这个世界并不平静，而暴风雨－风和雨－来了。随著风雨的来临，燕子也开始忙碌了。

唐：他（毛）问我英文的“燕子”怎么说，“sparrow”（麻雀）又是什么。我说这是两种鸟。

基：是的，但是我希望我们对于暴风雨的影响力，要比燕子对风雨多一些。

毛：或许可能延后风雨到来的时间，但是很难阻止风雨的到来。

基：不过重要的是当其来临时，能够具有最佳的地位面对，而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同意您的看法，风雨正在行进之中，或是可能到来，而我们希望能以最佳的地位面对，不是躲避，而是克服。

毛：就像敦克尔克（注：二次大战英国自欧陆的敦克尔克撤退其部队）？

基：我们可不会那样。

毛：那可不一定。你可以看出你们现在不会那个样子。

基：我们将来也不会这个样子。

毛：那不一定。纽约时报一名军事记者在八月时出了一本这样的书。

基：谁?

唐：（在与中方其他官员讨论后）我们查到以后再告诉你。

毛：你认为目前在欧洲的卅万美军能够抵挡苏联的攻击吗?

基：欧洲的弱点不在我们的军队，而是欧洲本身的军队。我认为以核子武器可以抵挡他们的攻击。

毛：那位记者不相信美国会使用核武。

基：纽约时报过去十年来一直在讨论美国遭到击败的事情。假如西欧遭到攻击，

我们当然会使用核武。我们在欧洲有七千枚核武，而那些绝不会任人掳获的。这还只是在欧洲。我们在美国更多。

毛：但是有一批为数不少的美国人不相信你们会使用核武。他们不相信美国会为欧洲牺牲。

基：主席先生，我们的国家才经历一段艰辛的路途，部分是因为中南半岛，部分是因为水门事件，而有许多失败主义者因此浮现。但是您若是观察我们过去五年来的作为，我们总是直接面对苏联，而苏联总是退让。我向您保证，我们的总统也会如此，如果苏联攻击欧洲，我们一定会使用核武。而苏联绝对不能不相信，否则太危险了。

毛：你对核武有信心。你对你自己的军队却没有信心。

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的军队数量不如苏联。这是事实。而最重要的一项事实是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愿意建立大规模的军队。如果他们愿意，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必须订定一个符合现实的策略。

毛：敦克尔克的策略也非完全不可取。

基：主席先生，我们最终势必要对相互间的声明具有起码的信心。　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不会有敦克尔克策略。而如果遭到攻击，一旦我们起而抵挡，在我们动员之后，我们确信会赢得与苏联的战争。

毛：(比著手势)我们采取的是敦克尔克策略，就是我们允许他们占领北京、天津、武汉以及上海，而透过这样的战术，我们将成为胜利的一方，敌人将会遭到击败。世界大战，第一次与第二次，都是这样进行的，而后来也都打赢了。

基：我认为如果苏联对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发动大规模攻击，美国都会立刻介入。我也相信美国绝不会在没有打一场核战的情况下撤出欧洲。

毛：这儿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你的可能性，另一个是纽约时报的。而高华德参议员六月三日在参议院的演说也谈到这一点。

基：他说了些什么?

唐：我们会送你一份副本。是六月三日在参议院的外交政策辩论。 基：可是有什么重点?

毛：他不相信欧洲。

基：您必须了解，主席先生，这是大选前一年，而许多议论都是说给国内听的。纽约时报廿年来有其一定的份量，不过错的比率也不低。

毛：人家说纽约时报是由一个犹太人家族所拥有。

基：是的。

毛：华盛顿邮报也是如此。

基：华盛顿邮报现在已不是了。(他问布什大使，后者指出葛兰姆夫人是犹太人，她是梅尔先生的女儿。)您说得没错。

毛：经营者都是犹太人。这位大使(看著布什)在北京处境艰困。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布：我今晚能来这儿，真是荣幸。我认为您很忙，没有时间接见联络办事处主任。

毛：我不忙，因为我不用去管所有例行性的事务。我只看国际新闻。 基：可是主席对于美国所写的东西，知道的比我还多。我不知道纽约时报记者写的那部书，还有高华德参议员的演说。

毛：你没有时间。你太忙了。(看著洛德)洛德先生，你现在升官了。

洛：是的，主席先生。

毛：（向布什及洛德）你们俩都升官了。

基：他（布什）还没有。他在一九八○年将会升。

毛：他能当总统。

基：要在一九八○年。

毛：你们不晓得我的脾气。我喜欢人们骂我（提高声调并用手拍打椅子）。你们一定会说毛主席是个老官僚，这样的话，我会快一点与你们见面。而且会急著想见到你们。如果你们不骂我的话，我就不会见你们，宁愿睡大头觉。

基：这对我们很为难，特别是叫你为官僚。

毛：我批准（用手重击他的椅子），外国人都在我面前拍桌子。骂我的话，我只会感高兴。

基：我们会考虑看看，但这对我们来讲还是很不自然。如果我们称主席是官僚的话，那一定是出自策略上的权谋。

毛：但我的确是个官僚，而且还是个军阀。这是苏联给我冠上的名号，官僚也是他们给我的。

基：但我没有看到最近有苏联的访客来此。

毛：他们每天都在骂我，每天。

基：但苏联对中国的评价与我们不同。

毛：（在基辛格的话还没翻译完前）因此，我接受这两个称号，军阀与官僚，再荣幸不过。而且你们也说过我是个战争贩子及侵略者。

基：我?

毛：在联合国的美国。联合国通过一项美国支持的决议，宣称中国侵略朝鲜。

基：那是廿五年前的事了。

毛：没错，所以它和你没直接的关系。那是杜鲁门时代的事。

基：是的。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的想法已经改变了。

毛：（摸摸头顶）但决议还没取消。我仍然戴著侵略者的帽子。我仍然把这视为无上的荣誉。好极了，非常好。

基：那么我们不该更改联合国决议了？

毛：不，不应该这样做。我们从来都没有提出那样的要求。我们宁愿戴上这顶荣誉的帽子。蒋介石说，我们是侵略中国，我们无法否认。我们确实侵略了中国，也侵略了朝鲜。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声明公诸于世，或者是在你对记者发布消息的时候透露？我要说的是，苏联封我为“军阀和官僚”，美国则封我为“战争贩子和侵略者”。

基：我想，我会帮你把这些话公开。不过，我没办法让历史正确地评价。

毛：我已经在你面前公开这些话。我也对许多来访的外宾说过，包括欧洲人在内。你们到底有没有言论自由？

基：当然有。

毛：我也有言论自由，我放的炮超过了他们放的炮。

基：这个我已经注意到了。

唐：你已经注意到……

基：主席的炮。

毛：请代我问候贵国国防部长。

基：我会的。

毛：我很不满意他去访问日本竟然不来北京。我们要邀请他来这里，让苏联人瞧瞧，但是你们太小器了。你们美国人非常有钱，可是这点你们实在是太小器了。

基：当敝国总统来这儿的时候，我们可以讨论这点。

毛：带他一起来。贵国总统来的时候，可以带一个文官和一个军人一起来。

基：您是指我（文官）和斯勒辛格（军人）？

毛：是的。但是我不会干涉你们的内部事务。你们派谁来由你们自己决定。

基：好的，他不会跟总统一起来。也许以后再来。

毛：我们希望邀请他参观我国东北、蒙古和新疆。他也许不会去，你大概也没有这个勇气。

基：我会去。

毛：（朝著布什看）他去过了。

基：我一定会去。

毛：好。

基：我们已经试著向你建议，我们已经准备好就这些当中的一部分问题提供建议或是协助。

毛：就军事的部分，我们现在不讨论。这类事情应该等到战争开打了再说。

基：是。但是你应该晓得，我们应该预作准备。

毛：所以，会议可以结束了吗?

基：是的。

注释

[1] 在 1972 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1972 年 6 月 17 日，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James W. McCord, Jr.）为首的 5 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由于此事，尼克松于 1974 年 8 月 8 日宣布将于次日辞职，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因丑闻而辞职的总统。

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张春桥同志、王洪文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你们两位是负责起草十大报告和修改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大概你们也知道吧？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1]，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对于越南问题，有人说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就说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注释

[1] 毛泽东同志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阅外交部六月二十八日编印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刊登的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基本看法》一文。该文分析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所表现出的特点是“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毛泽东同志认为此文的观点是错误的。

共产党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算共产党？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时谈话的一部分。

毛泽东：中国跟你们非洲国家差不多，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压迫我们。现在苏联，我们也说它是帝国主义，因为他也压迫我们。

周恩来：我们叫它社会帝国主义，因为列宁说过，披着社会主义外衣，实际上是帝国主义。

毛：我们希望你们非洲国家和地区一个个统统独立。第二，团结起来，逐步，急了也不行，逐步统一起来。还有拉丁美洲、亚洲——日本除外的一切国家——我们也是这么希望。日本为什么除外呢？它不属于所谓的第三世界。

毛：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大使馆在非洲各国犯过错误没有，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新殖民主义。如果中国人在你们国家，一切非洲独立国家，在那里称王称霸，自以为了不起，那么这种态度就是不对的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叫新殖民主义，我不大清楚。

周：就是象美帝国主义那样，没有殖民地，但有特权，实际上苏联也是，即不是象老殖民主义那样直接统治。

毛：我对扎伊尔的总统说，那个时候，我们恨不得把你们统统推翻。我们是支持革命的，是支持革命人民的，可是这些人不争气，推不倒你啊，那也没有办法啊，只有跟你打交道。他说我这个话是实话。因为共产党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算共产党？！我说，你（指恩古瓦比）也要采取这种态度，就是要站

在各国人民方面。

恩：是这样。

毛：总而言之，应该偏向代表多数人的政府。如果偏向代表少数的人，那就不大妥了。

有时候在外交政策上也不得不搞。譬如美帝国主义，他们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所以叫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跟它往来，因为现在那个左派好是好，但是没有权力，中间派也没有权力，就是这个右派，反共最厉害的，尼克松，他有权力。

毛：现在这个世界，不要相信是平安无事。

周：天下大乱，毛主席常说是大乱。

毛：现在的局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这个山雨要来，还没有来呢。可是风来了，而且风很急啊！不晓得你们非洲人感觉怎么样?

恩：我们要保持警惕，因为现在有表面和平，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大家都谈“安全”，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所以我们对世界和平持怀疑态度。

毛：我们根本不相信，什么“和平”啊，“安全”啊。

同沙菲的谈话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谈话的一部分。

我们过去叫 CHIN（秦），加一个 A，变为 CHINA（中国）。秦始皇在中国是有名的，就是第一个皇帝。中国历来分两派，讲秦始皇好的是一派，讲秦始皇坏的是一派。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个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卖军火，这不是列宁主义，我们从来不出卖军火的。我看你们自己搞，自己重新来制造武器。外国想控制你们，不让你们自己生产。

他们（指美、苏）不一致。一致是表面的、骗人的，也能骗一些人就是了，而不一致是本质的、根本的。你们对美国要采取分化政策。我们受过八国联军的苦，特别是受日本的苦，但是现在我们跟日本搞得比较好。其次是美国和苏联，受他们两家的苦。现在跟美国又比较好一点，比较接近一点，跟苏联还僵着。我们两国人民，以及第三世界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总是要团结的。

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问题谈话要点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的建议，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和二十一日又对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等问题，作了一系列指示。

十二月十二日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

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我主张找各大军区的人，司令员来。议什么事，要议军。

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呢。

毛泽东提议，陈锡联同志当北京军区司令，李德生同志到沈阳军区去；杨得志同志跟曾思玉同志对调；许世友同志跟丁盛同志对调；韩先楚同志跟皮定均同志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他们都刚去，不要动。

毛泽东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你们还要工作呢，还要保持晚节。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牛长角干什么呢，无非是斗嘛。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你（指叶剑英）把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吧，参加议军。

十二月十三日

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十二月十四日

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一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1]就会批你（指陈锡联），那也不要紧。辽宁“八三一”、“辽联”是两个小团体，彼此要照顾一下，不要偏了。“辽联”、“八三一”，不要批呢。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

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包括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不然，“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不大好呢。要开一个军长、政委，师长、政委见面的会吧。不认识一下呢，也不大好吧。比如东北吧，要他（指陈锡联）在场介绍他（指李德生）。比如华北，要他（指李德生）在场介绍他（指陈锝联）。还有政治委员。

他们（指各大军区司令员）到了，开门见山，讲互相对调，不要吞吞吐吐。对共产党员不要吞吞吐吐。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吞吞吐吐呢？就是直说。

十二月十五日

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大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

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起梗子，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比如那个“八三一”、“辽联”，他不要贴你的大字报？你那个出气的人、你不喜欢的那个人都走了，你还贴大字报吗？

我们还有一位李司令，到了没有呢？司令常来常往嘛！如果到那边不顺手，我们也可以商量一下。（李德生说：一定顺手！）靠不住。你不从坏处着想，单从好处着想。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

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象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中国人有那么多，有那么几万，几十万坏人，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

我们这个党不要杀人，包括反革命。保存活证据，不要杀。犯点错误呢，改掉就好。

毛泽东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

人家的导弹打几千公里，一个氢弹就把北京消灭了，不过他有个大使馆在这里，也要消灭呢。我估计，他不会打北京。美国打日本，选了两个小城市打，一个广岛，一个长崎，东京、大阪这样的大城市，他不打。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这时，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毛泽东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选妃子遍及全国，某一个省就选了三百人，这也是共产党干的事呵？！

毛泽东说，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杨得志同志带一个旅到延安，我才认识他。他是要抓逃兵的。我说逃兵不要抓，他不喜欢在你那里，让他走了算了，如果要抓，请他吃一顿猪肉，因为他不满意嘛。捆绑不能成夫妻嘛，捆绑能够革命嘛?

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那就要当老百姓。那个乡村里头，工厂里头批起来也厉害。

动不动就说人家“三反分子”、“五一六”[2]。甚至福建李庆霖[3]的那一封信，我看了相当好呵，有人说那里头有刺，就是要有刺呢！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辽宁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4]，也有人发议论，说是不对的。后头不是在人民日报登了吗？也说是不对的。

我看，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要他们考。他们总是看不起学生。现在好多人又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最后，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不要相信那些屁话！我们在旧社会，国民党的报纸那么多，广播电台天天吹，又没有把我们就变成国民党了嘛。我们还是共产党。现在贴两张大字报，不要紧呢。

总是两面的。你们说了什么四川不行，有些不听话，不听调。这也是常事，养着嘛！有一个能办事的就好了嘛。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这个会差不多了吧。明天一天就“聋子

放炮竹”[5]了。

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第四回里边有一张“护官符”，那上面说：“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

你（指许世友）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6]

你能够看懂《红楼梦》吗？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少文。

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慢慢来，就会顺手。

还有什么话讲啊？明天开一个大会就散了啰。（周恩来说：还要起草一个命令，鼓励大家一下。）噢，这个好。你们带个头。底下的政委、参谋长、总部、省军区、军、军分区，还有什么人武部，人也很多。这个问题不要紧。

世界上总是这样的（把两只手合起来），总有两面。有廉洁必有贪污，有贪污必有廉洁。只有廉洁，没有贪污，也不行啊，那就只有一只手。这个手（举左手）是廉洁，这个手（举右手）是贪污。是对立统一。

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苏联现在跟我们又在拉关系。最近有个什么文化部的招待会上，他们跟我们驻苏联武官处的人谈话。我们的条件，主要是两条：一要撤兵。撤到赫鲁晓夫时候那样。二要承认错误，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

你陈司令（指陈锡联），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位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

这时，周恩来提议唱个歌，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

注释

[1] 参阅本卷《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注释[9]。
[2] 参阅本卷《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注释[2]。
[3] 参阅本卷第 57 页注释[26]、[27]。
[4] 张铁生，1950 年生，辽宁兴城人。在 1973 年高考的物理化学考试中，他大部分考题不会回答，但他在卷子背面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谈到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而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最终他的考试成绩语文 38 分，数学 61 分，物理化学 6 分。1973 年 7 月 19 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1975 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1976 年 10 月后被撤销所担任的党内外职务，并被开除党籍。1983 年被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1991 年 10 月刑满获释。
[5] 这是《红楼梦》第五十四回中王熙凤讲的一句歇后语，意思是"散了"。
[6] 《晋书·刘元海传》中刘元海说："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毛泽东同志说，"鄙"字改为"恨"字。随、陆、绛、灌分别为汉朝的随何、陆贾、周勃、灌婴。

同卡翁达、布迈丁谈话内容的通报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

一、毛主席对卡翁达[1]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又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对布迈丁[2]也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二、当布迈丁问到美苏是否达成某种协议和进一步问到战争问题时，毛主席说，协议可能有，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我看会打仗。总而言之，将来总有一天会要打的。争夺的结果最后可能会武力解决，暂时还不会。现在都在讲和平。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

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世界战争，我们要打，第三世界要打世界战争，也不是这些富国的人民想要打世界大战，这种东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想到希特勒几乎统一了欧洲，又失败了。谁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又产生了十月革命。

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尾把日本、后来又把蒋介石赶走了。

至于打不打原子武器，可能打，也可能不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对日本打过，但是后头在朝鲜战争，就没有打。在越南战争，也没有打。在中东，以色列也好，埃及也好，美国人跟俄国人也没有援助他们原子武器。

布迈丁说，我们国家太小了，没有办法对付大国。毛主席说，你们不小，你们把法国人赶走了，越南人也把美国问题解决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把美国军队赶到南边去了。现在美国到处霸了地方，它要保护这些地方，力量就分散。苏联要对付的地方也多，欧洲、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中东、南亚、中国、日本、美国，太平洋的美国。它的事情也不好办呢。

布迈丁问，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态度如何？毛主席说，准备打仗！准备它们（美苏）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的和平。

三、毛主席对卡翁达说，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你呢，我们希望也是要帮助人民。我劝你对人民要好啊！没有人民就会垮台。当卡翁达谈到赞支持世界的反帝反殖斗争和在国内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时，毛主席说，你现在不能当共产党，你当共产党，人家就都反对你，但是你可以看一点马克思的书。

四、谈到中国的成就和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时，毛主席对布迈丁说，中国成就有一点，但是不大。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有时候工作方法比较好，有时候不大好。如果片面地介绍中国，说怎么好，那是不妥的。当然，说中国是一片黑暗，也是不对的。光明面是主要的，但是有时候有黑暗这一面。我们下面的工作人员就爱吹他的成绩，而不爱把自己的错误讲出来，所以你们要注意。别国大体也是如此，总是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缺点。

当卡翁达赞扬我援赞工程人员时，毛主席说，我们是共产党啊，应该好一点！我们的人也犯了一些错误呢。要教育。共产党内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有一些人看不起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人民，所以应该教育。我委托你教育中国的工程人员，还有尼雷尔[3]总统，也应该这样做。在你们那里工作的，世界上的人作了坏事，不管哪个国家的都应该教育、处分或者把他们赶回来。不然那些人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帮助你们修了铁路，了不起呀。

五、同布迈丁谈话时，毛主席指出，地中海是密切关系欧洲的。欧洲安全，阿拉伯世界不安全，地中海问题不解决，那怎么行呢？几十个国家怎么能取得一致？单是欧洲就有三十几个国家。如果是听两个大国——美国跟苏联，这也不行吧。

六、毛主席还对卡翁达说，非洲最好统一起来。南部非洲难啊！中间和北方的慢慢地统一起来。并且说，你们应该发展人口。中国人口太多。非洲人还不够。

注释

[1] 卡翁达，时任赞比亚总统。
[2] 布迈丁，时任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
[3] 尼雷尔，当时任坦桑尼亚总统。

同尼雷尔谈话主要内容的通报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一、当尼雷尔提到美苏不是为和平而努力时，毛主席说：和平是暂时的，将来就难说了。并说：总而言之，所谓裁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说要裁军，结果谈出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大战后又说要裁军，又是几年了，没有一个裁的。但是他们双方都说他们要搞和平，而且是长久的和平，或者是一代人的和平。一代人嘛，大概是半个世纪，五十年吧。何不讲两代人呢？因为这一讲，他的武器就没有销路了。大国都靠出卖武器赚钱。总而言之，我们对“持久和平”这样的口号要看一看呢。大概一段时间可以，太长了不行，因为社会制度没改变。总而言之，这个全世界是不安定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讲和平，就是因为这样讲对他们比较有利。他们又利用各国人民怕打核战争的心理状况，所以有许多人接受和平的口号。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都讲和平，结果讲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现在又讲和平，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战争来吧。

二、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超级大国）现在有点怕第三世界。尼说，如果第三世界没有中国，他们就不会怕。毛主席说，也怕呢。尼又说，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就成了纸老虎。毛主席说，那不能这么讲！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

三、毛主席问到：整个非洲的事情怎么样了？尼雷尔回答的过程中，毛主席插话说：比过去都要好些。就是讲北部和中部非洲。当尼雷尔谈及他们在南部非洲正在努力赢得独立时，毛主席说，我跟你们意见一致，就是不喜欢南非白人政权控制非洲人民。并说，（南部非洲）将来总是要起变化的。非洲的变化已经够快的了。

四、尼雷尔说，中国现在对非洲的帮助是很多的。毛主席说，帮助很小。当尼称赞中国医疗队时，毛主席说，应该主要是帮忙教会你们的医生。搞铁路的也应该主要是教会你们勘察、各种建设、修路、桥梁。各种技术人员都这样，我们将来一走，你们就完全可以自己管理了。如果不教，那就不好哩。

毛主席说，听说我们的人在你们那里做了一些坏事。并问：给了赔偿没有啊？有些犯错误的也撤回了吧。人多了，我们教育又不严，势必将来也还要出一些问题。你们发现有什么错误，就告诉我们的大使。尼称赞中国人员在坦桑人对他们不好时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从不发牢骚。

毛主席说，不能怪你们。这个不能发牢骚，发牢骚是错误的。尼谈及他的母亲向我人员送活羊和鸡蛋时，毛主席说，收人家礼物不大好吧。以后成为风气不大好。

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毛主席问希思[1]，尼克松水门事件[2]能过关吗？希思认为尼可以幸存下来。毛主席说，那个水门事件我们不懂，为什么闹得这么大。何必呢？没意思。借题发挥。希思问水门事件是否使中国建立同美的关系及执行对美、对尼克松的政策更困难？毛主席说，倒不。希思问中美关系今后如何发展，尼克松访华[3]后中美关系似乎停滞了。毛主席说，那不要紧，还是比较好的。你可不可以劝一下尼克松，帮他一个忙，叫他渡过水门难关？

在谈到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4]时，毛主席又说，美国人呢，就是手伸得太长了。你看，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台湾、东南亚、南亚、伊朗、土耳其、中东、地中海、欧洲。美国人骂了我们多少年，二十多年。希思开玩笑地说，中国对美国帝国主义要当心！毛主席说，但是我们比较对美国人放心。

二、毛主席问希思，你们欧洲那个安全会议[5]哪一年搞成功啊？当希说如果问这个会议什么时候完蛋倒更容易回答些时，毛主席说，对，我们的意见一致。这个欧安会完蛋了，他们（美苏）两家真正的和解也就搞不成了。

当希思谈到苏联下了很大决心并有强大的组织来增强其实力时，毛主席反问，难道苏联就没有困难吗？并说，我看他们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当希思再次强调苏军实力并问及我是否认为苏联对中国不构成威胁时，毛主席说，我们准备它来。但是它来了，它就垮台了呢！它只有那么几个兵，你们欧洲人那么怕！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俄国这一股祸水流向中国。你们的老前辈张伯伦[6]，包括达拉第[7]，就是推德

国向东。

希思问中、苏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毛主席说，由意识形态引起的边界问题。中苏争吵要从五四年开始算起，因为五五年赫鲁晓夫[8]就找阿登纳[9]说，中国不得了了。希说，阿登纳总认为苏联会企图接管欧洲。毛主席说，欧洲、亚洲、非洲，但是它力不从心。丢了埃及。在我们这里影响更小呢。也有些影响，林彪[10]就是他们的人呢。

希思说，虽然苏联同甘地夫人[11]订了一个条约，但他们在印度也没有多大影响。毛主席说，我也这么看。你们的外交部长霍姆先生劝我们要跟印度搞好，他的意思是要把印度从苏联那边挖过来。

当希思说一个强大的欧洲很重要，可以使俄国发愁时，毛主席说，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并且说，我们看欧洲、亚洲，包括日本，都不要吵架。要吵呢，可以，不要大吵。希问我对日本比较放心吗？毛主席点头并说对。

希又问我是否相信日本人的和平意图。毛主席说，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将来很难说。但是我们不怕你们欧洲。

三、毛主席说，英国能够跟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还是希思办的呢，所以我称你为首相先生。当谈到因为希思不是现任首相所以我未安排他在机场检阅仪仗队时，毛主席说，我看要。不怕得罪威尔逊[12]。（对希）我是投你的票的！

当希思谈到可能英国在技术方面能向我提供我所需的帮助时，毛主席说，你们帮助我们，我们高兴。希表示始终乐于帮助，毛主席说，好，很好。

毛主席对希思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13]。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

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指在座的年青同志[14]）的事情了。

注释

[1] 希思，时为英国保守党领袖、前首相。

[2]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美国共和党内为尼克松筹划竞选连任总统的一些人，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置窃听器。尼克松连任总统后不久此事被揭发。一九七四年七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根据收集到的证据通过弹劾尼克松的条款。八月尼克松被迫辞职。

[3] 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并在上海同中国方面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4] 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十二个侵朝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傀儡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5] 指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参加的有三十一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土耳其、塞浦路斯和加拿大。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苏联通过波兰外长在第十九届联大会议上建议召开“欧安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下旬到一九七三年六月初，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筹备会议。正式会议自一九七三年七月开始，分三个阶段进行，先是外长会议，接着专家会议，最后首脑会议，至一九七五年八月结束。会后签署了“最后文件”，内容分四个部分（也叫四个篮子）：欧洲安全问题；经济、科学、技术和环境方面的合作；人员、思想和文化交流；续会问题。文件内容空泛，没有约束力。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四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欧安会”后续会议。

[6] 指亚瑟・涅维尔・张伯伦，英国保守党领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任英国首相。一九三八年九月，代表英国政府同法国、德国、意大利政府首脑签订《慕尼黑协定》，采取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张伯伦下台。

[7] 指爱德华・达拉第，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〇年任法国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在此期间，执行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一九三八年九月，代表法国政府签订《慕尼黑协定》。一九四〇年德国侵占法国后被监禁，一九四五年获释。

[8] 赫鲁晓夫，一九五五年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9] 阿登纳，一九五五年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10] 林彪，见本卷《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谈话》注释[7]。

[11] 即英迪拉・甘地，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七年任印度政府总理。

[12] 指詹姆斯・哈罗德・威尔逊，英国工党领袖。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六年任英国首相。

[13] 香港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一八四〇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在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一八五六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六〇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一八九八年英国又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二百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九十九年，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期满。中国人民一直反对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个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解决台湾

和香港问题的构想。同时，随着一九九七年的日益临近，英国方面不断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英两国政府开始举行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谈判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八二年九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至一九八三年六月，双方主要就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会谈。第二阶段从一九八三年七月至一九八四年九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具体实质性问题进行了二十二轮会谈。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双方就全部问题达成协议，并于九月二十六日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至此，为时两年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圆满结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宣告成立。

[14] 在场者中有时年 71 岁的邓小平。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听取周恩来同志、王洪文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与周恩来同志单独长谈，其中讲到理论问题。本篇是这次谈话的要点整理稿。

毛主席在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说，这次谈两个问题，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

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1]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2]。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3]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注释

[1] 春桥，即张春桥，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文元，即姚文元，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2] 《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同志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3] 林彪，见本卷《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谈话》注释[7]。

关于国际问题几次谈话的要点

（一九七四年）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七四年会见外宾时关于国际问题几次谈话的要点。

毛主席在几次会见外宾时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比较过去很不安宁，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包括中国在内。前不久出了林彪[1]的事。林彪是我们党内的一霸。

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头几年，不讲和平，不要说要缓和紧张，而现在大讲特讲！没有病，就不要看医生。有病，他就要看医生。现在地球害病，所以要讲缓和紧张，缓和国际紧张，要讲和平。现在给地球治病。我是持怀疑态度。国际会议这么多，美国这个国务卿[2]到处跑，相当怪！黄昏的时候，燕子忙，飞得低，雨要下了！

我是不赞成所谓永久和平的。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美国人就跟我讲，争取时间。我也觉得这是个严肃问题，现在全世界人民考虑的问题。

当外宾谈到发生战争是世界性大灾难时，毛主席说，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是不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

我看，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

毛主席说，未来总是光明的。要经过斗争。不斗啊，人家不听你的话！

毛主席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

注释

[1] 林彪，见本卷《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谈话》注释[7]。
[2] 指基辛格。

越讲缓和越备战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在长沙听取周恩来同志等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时讲话的节录。

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要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要有所准备。要弄清苏联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如果勃列日涅夫[1]要来谈，应该怎样？（周恩来说：如他真想来谈，可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毛泽东点头。）

注释

[1] 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

*这篇谈话是一篇重要的著作。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本篇著作被华国锋等同志采取断章取义、添油加醋的手法，成为全面打倒“四人帮”的工具。但是从原文来看，毛泽东同志的口气和语境显然不是华国锋同志所理解的那样。

（在与周恩来握手时，周说：快一年没有见到主席了，想念主席。）毛问：怎么样？还好吗？（周说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问候了。）

（在与叶剑英握手时）说：老帅呀。

（在与邓小平握手时）说：小平呀。

（在与陈锡联握手时）说：你要挂帅呀。

（在与纪登奎同志握手）纪说：最近刚见过主席一次了。

（在与吴德握手时）说：吴德有德呀。

（在与陈永贵握手时）说：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不要住在钓鱼台。

（在与吴桂贤握手时），吴说：主席好，我是吴桂贤。

毛说：**我不认识你啊。**

吴说：**我六四年见过毛主席，国庆节参加观礼的时候。**

毛说：**不知道。**

吴说：**延安儿女问候你。**

毛问：**你是延安人哪？**（周恩来：她是河南人，陕西西安的纺织女工。到延安去看了。）

（在与苏振华握手时）说：管海军靠你呀，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

只有这样大（比小指）。（苏说：现在大了一点了，现在这么大（用无名指作比）。）

（在与谢静宜握手时）说：你当了大官了，要谨慎呀。

（谢答：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

毛说：试试看吧，不行就（作手势）搞不好就卷铺盖卷。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1]，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2]，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3]，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办了一个大学，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唐），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周恩来）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邓是你（指小平），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

人（除邓以外）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指邓），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那时还不认识他，好象不认识（张春桥说：见过一面），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候是邓拓管的吧?（张春桥说：是吴冷西。）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来学说。巴克来是英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看一看。

（江青说：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嗯。那是谁?

（张玉凤：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4]，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象张闻天[5]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罢工的时候，还没有修这条铁路，二〇年、二一年、二二年，这三年我是在湖南搞工人运动，粤汉、安源煤矿，湖南一些工厂，株洲、萍乡、粤汉路、株萍路、安源煤矿、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没有锡。

“无锡锡山山无锡，平湖湖水水平湖。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

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孙权要搬家，老百姓说，宁饮扬州水，不食武昌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他（指叶剑英）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6]，曹是曹里怀[7]，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毛要叶剑英念了一首辛弃疾的诗）

南乡子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此人（指叶）有些文化。“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看不起吴法宪。黄吴李邱不是曹刘，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吴法宪不行。

注释

[1] 应是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
[2] 指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
[3] 指上海第一机床厂批“ 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

[4]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皆见本卷《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注释[1]。罗章龙，见本卷《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注释[8]。 王明、张国焘，皆见本卷《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注释[1]。

[5] 张闻天，见本卷《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注释[12]。

[6] 刘震，见本卷《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注释[22]。

[7] 曹里怀（1909-1998），原名曹李槐，字植三，号树邦。一九二八年参加湘南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军训部部长，空军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关于文史著作和历史人物的谈话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听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读古代文史著作时的部分谈话。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每一部史书，都是由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评论，要一分为二。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秦的暴政，完全是正义的。

现在没有书我们搞一部吧，选他五百首诗，五百首词，三百首曲，三十篇赋。

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

关于《水浒》的评论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水浒》的谈话。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谈话中，联系实际，批判了宋江的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指出了晁盖革命路线的正确性，表达了他对党内修正主义一贯的慎防、警示心态。这篇谈话发出后，全国开展了评《水浒》的斗争。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主席重要指示

（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

*这是毛远新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重要谈话，整理而成的重要文献。不夸张地说，这篇毛泽东同志一生著述的收官之作，在我国和世界共产主义理论史上都有不可比拟的意义。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同志回顾、总结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再次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性，并且发觉、批判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思想，分析了这种错误思想的社会原因，指导意义不言而喻。

清华大学刘冰[1]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2]。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3]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4]，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

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

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5]、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6]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7]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8]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9]的《论孔丘》，冯天瑜[10]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11]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12]，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

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注释

[1] 刘冰，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2] 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一九七八年八月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一九八三年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小谢，指谢静宜，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一九七六年十月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七年八月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因坦白认罪较好，被免予起诉。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九七五年三月起，受毛泽东同志的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4]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一九七五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提出的一个修正主义的指导方针。当年五月二十九日，他在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的代表时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要搞反修防修，一条是还是安定团结为好，一条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此后，他又在其他会议和场合讲过类似的话。这个方针违背毛泽东同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断，是他修正主义路线的开端。
[5] 周荣鑫，当时任教育部部长。
[6] 劳联，简称“美国劳工联合会”，是美国熟练工人的行业工会联合组织。成立于 1886 年。产联，全称“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是美国按产业原则建立的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是美国老牌的工会组织，也是最大的工会组织。它的影响力已经足以左右一次总统选举。在劳联－产联的历史上，其大部分时间是在执行一条反动的劳工外交路线。它策划并参与推翻一些国家民主选出的政府、伙同一些独裁者反对进步的劳工运动并支持反动的劳工运动去反对进步的政府。这些都是举世公认的抹煞不掉的事实。
[7] 蒯大富，文化大革命初期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分配到宁夏三〇四厂工作。一九七〇年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一九七三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工作。 聂元梓，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曾贴出由她领衔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后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九大后不久，与北大教师一起到江西北大分校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初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隔离审查。一九七三年审查结束后，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一九七五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工作。
[8] 杨荣国，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9] 冯友兰，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0] 冯天瑜，当时是武汉师范学院教师。
[11] 郭老，指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12] 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他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可他在主席作古之后的行为说明了一切。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时的一段谈话。

我还要见他，President Nixon（尼克松总统），欢迎他。

中国有些成绩，总的来说是落后的。过了十年，你们再来看。

（当戴维说感到最新的是中国的精神发展时）Struggle（斗争）！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不和平。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可怕，我们不杀人。国民党过去的党、政、军、特人员，战争中俘虏的，现在都把他们赦免了，给他们公民权。

（戴维：从你们的革命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灵魂是不能拯救的。）帮助人家改正错误。比如批评十个人的错误，八个人批对了，有个人没有错误，搞错了，批评他们了，以后取消，说他们没有错误，恢复名誉。

同华国锋谈话时写的几句话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六月二十五日）

*本篇一、二、三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谈话时写的三句话。本篇四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同华国锋同志谈话时写的一句话。毛泽东同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党和国家的重担交给了华国锋同志。

一

慢慢来，不要着急。

二

照过去方针办。

三

你办事，我放心。

四

国内问题要注意。

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同志 1976 年 6 月 25 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与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同志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同志极为概括地总结了自己的一生，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作为他一生干的两件大事之一。本篇一引自《毛泽东年谱》第六卷，本篇二的出处存在问题，但流传极广，在此一并录入。详见《第七卷后记》。

一

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第七卷后记

亲爱的同志们：

我怀着无限的感慨和崇敬之情写下这篇文字。《毛泽东选集》第七卷（润之赤旗版）胜利编成了。我从二〇一八年一月开始筹备选编本书，经过一个多月的编辑，形成了本书初稿。这部二十八万多字的革命著作，收录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一九六六年一月-一九七六年六月的讲话、谈话、文章、批示等一百零七篇主要著作。这些著作集中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是毛泽东同志晚年思想的集中体现。

一九六〇年代的中期，毛泽东同志在与国际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在加固党、反对机会主义和错误倾向的斗争过程中，极为深刻地认识到了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彻底打掉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党内资产阶级”，预防修正主义复辟的极端重要性。

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著作，我们不难感到，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态度，是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照妖镜。

一、学习本卷著作的体会

本卷著作主要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国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国际的“三个世界”和反帝、反修理论。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本卷的一系列著作作了纲领性的阐述。实际上，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就初步形成了这种思想，以“九评”公开信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集中论述为标志。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这一理论完

全形成，并得到了实践和发展。而毛主席这一时期的著作自然就更加深刻地阐明了这一伟大理论。如《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中，毛泽东同志在回顾了德国党和苏联党在伟大导师逝世后迅速变修的事实后，深刻指出：“**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毛泽东同志以七十三岁的高龄，赌上自己一生的全部威望，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奋起向重新成为人民身上大山的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开展轰轰烈烈的斗争。当时的党内，几乎没有几个人清醒认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一些党内资产阶级分子和官僚主义者阶级分子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保全自己“**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的“**大官们的利益**”，“**后退了，反对革命了**”，成为了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声势浩大、在我国甚至世界历史上都不可思议的伟大演习，是毛泽东同志留给后代人民的经验财富、镇妖宝剑。

理论到实践的转化，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主要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这卷著作中，多次提到抵制错误的领导，反对“驯服工具论”，撤工作组，充分、真正地发动群众，而不是刘少奇、邓小平那种叶公好龙、投鼠忌器、居心叵测的办法。本卷 107 篇著作中，39 次提到了反对“武斗”，甚至有专门制止武斗的两篇单篇著作。诚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三年，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做法和较乱的现象，可是，不对引起武斗和混乱的原因进行分析，反而一股脑儿把责任推给毛泽东同志，这是极端不尊重历史的无耻行为。“**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

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比如象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这些人的子弟。”毛泽东同志这样的论述，在本卷中有多处。看看煽动武斗、搞派性、闹乱子的究竟是谁吧！

毛泽东同志对待同志“一看二帮”、“治病救人”的无产阶级路线在本卷著作中也得到体现。1967 年，“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对林彪一伙人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坚决批评，这就是“二月逆流”。这也使这些老干部受到了批判和冲击。但是即使是在林彪集团未垮台的一九六九年，毛泽东同志就指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同年与谢富治谈话时又指出：“**二月逆流几个干将，我就恨不起来。…他们是公开搞的，不是阴谋。**”。到了林彪集团垮台之后，毛泽东同志更是明确指出，“二月逆流”“**根本没有这个事**”“**再不要讲了**”。本卷著作中，毛泽东同志 137 次提到“团结”，16 次提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到了文革的最后时分，毛泽东同志更是反复强调团结。几乎是有个机会就讲，作一次谈话就讲、反反复复地讲。针对江青等同志不懂策略、不讲团结的行为，毛泽东同志苦口婆心，一再劝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一教导中，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同志对待同志悉心教诲、语重心长的风格。可见，在本卷著作中，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得到了伟大的体现。

其次，毛泽东同志的国际理论，在本卷著作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阐述。首先，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继续坚持了对国际上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坚决斗争态度，针对苏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现实，毛泽东同志继续坚持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并且对于冷

战阴云下的世界局势，提出了“**越讲缓和越备战**”“**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共产党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叫共产党？**”等一系列重要论断。第二，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三个世界”重要理论，至今仍是指导我国和世界很多地方分析、研究国际局势的方针。基于这种理论，中国坚持了永不称霸、永远站在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方面的立场。但是，我们看到，如今的中国对世界局势却采取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态度，对美帝国主义为中心的现代战争严重威胁采取苟合求安、敢怒不敢言的错误立场，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但不支持，反而有时苟同帝国主义的制裁。这些立场，实践已经、即将反复证明是不对的，靠不住的。

二、关于几篇著作的编排问题

本卷中多篇著作的注释借用了革命友人静火同志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七卷的注释，在此向静火同志表示感谢和致敬。

本书中的所有著作，都有确实可靠的文献来源，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文革指示谈话汇编》、《毛泽东年谱》等。本书中一些著作来自《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等书籍。所以，对于文献的真实性方面，同志们是不必担心的。

本书中《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一篇，是毛泽东同志生前最后一次重要谈话。根据《年谱》、叶剑英 1977 年的讲话、毛泽东同志身边人员的回忆等资料，有一点可以确定：毛泽东同志是作出过“一生做了两件事”这一论断的。但是内容众说纷纭。《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一篇的第一部分，转引自 1977 年 3 月 22 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第二部分，没有任何确实可信的文献资料证据，但是在人民群众中流传极为广泛，在很多书刊和网站登

载流传，以至于《毛泽东年谱》中用脚注的形式刊载，并指出“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然而由于流传广泛，我最终决定采取分一、二篇的方式，与叶剑英回忆的谈话记录一并刊载。还望同志们周知。

正如大家所读到的那样，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理论和实践，具有相当大的国内和世界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和极重要的地位。日本著名毛泽东研究者竹内实在编辑完《毛泽东集•补卷》一共二十卷后，感慨地说：“毛泽东著作是开启世界美好未来的钥匙。”我深以为然。每一个关心我国人民、关心我国前途的正义之士，都不要忘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理论。

这部书的初稿完成之时，恰恰是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学生和战士，伟大领导者周恩来同志的一百二十周年华诞。谨以此书向伟大领导者致以崇高的敬礼！

意见交流渠道
邮箱：lwj20120704@163.com
知乎：@润旗之赤
网易云音乐：@润之赤旗
百度贴吧：@小胖鹅 home

润之赤旗

二零一八年三月六日谨识

（封底）